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双月刊·2026 年第 2 期(第 37 卷)

学 报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任：黄龙杰

副主任：何文钜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鸿 方素梅 刘菊香 许立坤 李小宁 杨保筠 杨绪强
沈桂萍 张淑瑛 张献生 郑 好 祝远娟 覃彩銮 谢茂松
廖国一 潘宏纹

广 西 社 会 主 义 学 院 主 办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 报

双月刊

(1996 年创刊)

第 37 卷 第 2 期

2026 年 4 月 18 日出版

主管、主办单位: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主 编:何文钜

副 主 编:杨绪强

编辑部主任:杨绪强

地 址:南宁市西乡塘区新村大道6号

邮政编码:530007

电子信箱:GXSYXB@163.com

访问网址:<http://www.gxsy.org>

电 话:0771-2381657,3891622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033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250/D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 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印刷单位:广西明园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10.00 元

目

学习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十五五”时期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共同富裕:内在逻辑、价值
意蕴和实践进路

..... 邓喜道,彭可心(5)

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若干思考

..... 孙宝林(13)

特别策划·统一战线工作评价体系研究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研究

..... 张建军,李 丹(21)

基于 CIPP 模型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
体系建构研究

..... 段少帅,张 永(29)

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 冯 昕,谷佳璐(39)

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构建:逻辑、框架与应用

..... 侯水平(4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逻辑、挑战与路径

..... 姚 薇(56)

次

统战理论与实践

从危机到共识:论西安事变中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

..... 何 玲(63)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下沉—整合—协同”体系的初步探索

——基于四川省基层统战工作的案例研究

..... 何 画,王江燕(70)

政党制度研究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初探

..... 梁晓宇,吴有海(80)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从“天下一家”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历史
进路

..... 唐圣电,秦江明,汪守军(89)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以新疆为例

..... 彭无情,苏 晶(96)

从广西语言兼用模式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 刘秋妍(106)

本期执行编辑:杨绪强

封面设计:梁新建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Bimonthly

(Founded in 1996)

Vol.37 No.2

Published on Apr. 18, 2026

Administrator & Sponsor: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or & Publisher: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Editor-in-Chief: HE Wen-ju
Deputy Editor-in-Chief: YANG Xu-qiang
Editorial Director: YANG Xu-qiang
Addr.: No.6 Xincun Ave., Xixiangtang Dist.,
Nanning Ci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P.C.: 530007

E-mail: GXSYXB@163.com

URL: <http://www.gxsy.org>

Tel: (0771)2381657, 3891622

ISSN1009-0339

CN45-1250/D

Distribution Range: China

Distributor: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Printing Unit: Guangxi Mingyuan Fenghuang
Printing Co., Ltd

Price: ¥10.00



英文翻译:陆姝彤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Main Contents

Leading Common Prosperity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Six Uphold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ternal Logic,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DENG Xi-dao, PENG Ke-xin(5)
Reflections on Advancing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SUN Bao-lin(13)
A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Primary-Level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New Era	ZHANG Jian-jun, LI Dan(21)
A Study on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Education o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CIPP Model	DUAN Shao-shuai, ZHANG Yong(29)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Inter-Ethnic Embedded Communities	FENG Xin, GU Jia-lu(39)
Constructing a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Introducing Law into Venues for Religious Activities: Logic,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HOU Shui-ping(49)
Empowering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Logic,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YAO Wei(56)
From Crisis to Consensus: On the Powerful Role of the United Front as an Important Magic Weapon in the Xi’an Incident	HE Ling(63)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Sinking – Integration – Coordination” System for Primary-Level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f Primary-Level United Front Work in Sichuan Province	HE Hua, WANG Jiang-yan(70)
A Preliminary Study on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LIANG Xiao-yu, WU You-hai(80)
From “All Under Heaven as One Family” to “the Chinese Nation”: The Historical Path of Develop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ANG Sheng-dian, QIN Jiang-ming, WANG Shou-jun(89)
Practical Paths for Tourism to Promote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Xinjiang	PENG Wu-qing, SU Jing(96)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angxi’s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Language-Use Patterns	LIU Qiu-yan(106)

·学习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十五五”时期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共同富裕： 内在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

邓喜道, 彭可心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原则。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共同富裕的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要求的守正创新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升华,也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六个坚持”原则为“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明确了根本保证和价值立场,指明了基本路径和动力来源,提供了重要依托和安全屏障。必须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全过程,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以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技术基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以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以高水平安全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关键词:“六个坚持”原则;共同富裕;内在逻辑;价值意蕴;实践进路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01

[中图分类号]F124.7;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05-08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建议》明确,“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原则,即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1]。“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其主要任务也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收稿日期:2026-01-11

作者简介:邓喜道,男,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文明理论、环境伦理学;彭可心,女,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原则。当前,正确理解和把握“十五五”时期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十五五”时期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十五五”时期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共同富裕的命题,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要求的守正创新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升华,也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要求的守正创新

1.马克思主义强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守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2],且“决不拿原则做交易”^[3]。坚守原则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主要体现为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始终恪守。“十五五”时期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自觉。一是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坚持人民至上,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价值取向,锚定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根本目的。二是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致力于推动形成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二者共同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和制度依托。三是运用了科学社会主义处理复杂社会关系的辩证思维方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顺应了社会主义发展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的现实需要。

2.实现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必须立足这一原则,对共同富裕施以有力引领。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私有制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内在痼疾,强调必须通过变革资产阶级私有制来实现共同富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促使“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这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必定会产生,“除非在此之前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4]83-84}。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彻底消除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根源。也只有到这时,社会生产才能“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5]。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始终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系统阐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高度重视和科学把握。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升华

1.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6]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发展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历经一个漫长曲折、充满复杂斗争的历史过程,而且需要我们依据实际情况将之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加以接续推进。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制定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体细化为切实可行的阶段步骤,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和人民生活改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取得长足进展。与此同时,回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分别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十四五”规划建议,不难发现,这两份文件都对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作出了明确界定。可以说,“十五五”时期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进而引领共同富裕,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传承赓续。

2.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矢志不渝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就要求始终把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位置。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7]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8]。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紧密结合、协同发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越是深入,我们就越不能懈怠,越要在“六个坚持”原则引领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三)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

习近平强调:“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9]“十五五”时期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一程,“六个坚持”原则构成了引领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了行动纲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将确保这一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始终沿着正确政治轨道稳步前行,以党的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凝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磅礴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共同富裕真正体现为全体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际提升;坚持高质量发展旨在巩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将在不断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过程中,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旨在破除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要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主要针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进行

原则规定,通过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提升效率、激发活力,通过法治保障、公共服务和再分配调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确保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实践行稳致远,在保障粮食、能源、金融、产业链等关键领域安全的前提下,为共同富裕的持续推进创造和谐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

质言之,“六个坚持”原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它系统回答了“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不仅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昭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只有深刻领悟和全面贯彻“六个坚持”原则,才能在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过程中,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全体人民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二、“十五五”时期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为“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明确了根本保证和价值立场

“六个坚持”原则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置于首要位置,突出宣示了“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注定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复杂系统工程,必然涉及发展格局的深刻调整、利益关系的深度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层优化,必然需要直面纷繁复杂的风险挑战。在此情形下,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共同富裕事业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轨道稳步前行;才能下好全国一盘棋,以协调发展促

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推动城市反哺乡村、东部带动西部,通过集中力量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现状,精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才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强大的战略定力、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持续的政策韧性,克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因此,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内容,将成为确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航向不偏、初心不渝的根本保证,有力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广。

“六个坚持”原则中的“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求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来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决行动。马克思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320}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离开人民群众的力量,社会历史的一切进步也就无从谈起,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也就只能沦为一番空想。《建议》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原则之一,旨在充分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全体人民的意愿、智慧和力量,确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一以贯之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惟其如此,方能使全体党员干部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让亿万群众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主动参与者、积极推动者和成果共享者,方能将宏伟蓝图逐步转化为生动实践,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推动全体人民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二)为“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基本路径和动力来源

1.坚持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路径。习近平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0]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

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1] 当前,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中国式现代化鲜明主题,将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夯实物质根基。实现共同富裕,前提是富裕,核心是共同,故而既要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又要有合理的收入分配,这必然要求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12]。只有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才能持续壮大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通过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有效缩小区域城乡间发展差距,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使共同富裕从理想愿景逐步变为现实图景。“十五五”时期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题,并将之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开辟可行路径。

2.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为“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动力来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生产力的增长,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建立在一定生产力的物质根基之上,而生产力的增长又必须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为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实现共同富裕注入不竭的制度活力和强劲发展动能。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其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13]。加之,“十五五”时期又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关键时期更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推动落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系列改革举措,着力构建有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激发全体人民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动力保障。

(三)为“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依托和安全屏障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具有重要依托作用。如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以高质量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必然需要市场和政府在其中发挥各自作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域的核心因素,既深刻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实践行为和宏观经济发展绩效的提升,又紧密关系经济发展成果在社会成员间的均衡分配与分享,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4]。所以说,在“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能离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致力于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唯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优势互补、动态平衡、协同发力,才能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安全屏障作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互为支撑、不可偏废。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中,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安定团结不仅是共同富裕的前提保障,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一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重要原则。没有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各领域安全的托底,发展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共享机制也将难以持续,共同富裕更是无从谈起。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外部环境等领域的重大风险,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另一方面,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支撑。显而易见,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固化是侵蚀民族凝聚力、破坏社会稳定性的的重要因素。必须

从源头上纾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认同、巩固执政根基,以高效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三、“十五五”时期以“六个坚持”原则引领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急不得,也等不得,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5]面向“十五五”,应在“六个坚持”原则引领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一)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全过程

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复杂系统工程。促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整体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是意义非凡的历史壮举,必须有坚强有力的领导作为保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6]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要求我们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全过程。一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党上下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将党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重大政策和改革举措逐一落到实处。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掣肘,形成统一指挥、协同推进的强大社会合力。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统筹处理好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确保其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轨道稳步前行。二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在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要持续推进党建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领当地农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切实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确保农村地区共同富裕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让乡村生态更美、产业更兴、百姓更富。在城镇地区,基层党组织要着力深化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精准关爱帮扶困难群体。基层党组织要成为宣传党的主张、执行党的决定、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将党中央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决策部署变为千家万户可知可感的民生实事,充分激发全体人民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筑牢共同富裕的社会根基。

(二)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就是要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一是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着力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再分配中,要强化政策调节力度与精准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在第三次分配中,要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市场主体及高收入群体履行社会责任。二是要着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应将更多财政资源向社会民生领域倾斜,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托育等领域的投入,推动优质资源向农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的困难群众延伸覆盖。时刻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更加注重农村地区居民生活质量改善,让农民群众在改革发展过程中获得可感可及的实惠。通过系统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普惠性和公平性,不断缩小区域、城乡、群体间在基本民生保障和发展机会上的差距。三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共同富裕必须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才能实现。因此,一方面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求。完善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在制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时充分听取民意、汇聚民智,让全体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中

推进共同富裕。

(三)以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是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仅要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进行超前布局,更要通过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层面上持续创造社会财富,夯实共同富裕的必要物质技术基础。二是要以加强人的全面发展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以“八大体系”为基本框架,系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着力加大对农村、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提升全民就业创业能力、创新创造能力和适应产业升级能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三是要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间的差距。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这既能有效减轻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有效增进人民群众切身福祉和提升抗风险能力,又能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流动,从根本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创造稳定包容的社会环境。四是要以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以此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从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四)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关键在于通过系统性、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变革,破除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公平分配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是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抓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破除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特别是要用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一招,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体制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向农村流动,助力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城乡双向流动,以健全统一规范的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价值,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倾斜,真正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更高水平上做大“蛋糕”。二是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筑牢共建共治共享基础。要拓宽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灵活运用数字技术精准发力,提升治理响应能力,在化解矛盾、促进公平、保障权益的过程中充分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广泛社会合力。三是以强化产权制度与公平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创造力。要完善各类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合法权益,通过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等举措,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以此稳定社会预期、鼓励创新创业,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五)以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

习近平强调,做好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17]。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持续做大“蛋糕”赋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各类隐性壁垒,保障不同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要强化产权保护和合同履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全社会创造潜力。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战略引导、市场规范与公平保障中

的关键作用,以分好“蛋糕”赋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政府要引导资源向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集中力量弥补市场机制在公共品供给、收入分配调节等方面的缺位。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秩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并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六)以高水平安全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习近平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15]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题中之义。“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保驾护航。一是必须筑牢经济安全屏障,坚守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要确保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自主可控,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等领域潜在风险,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要健全经济安全预警和防控体系,增强重要民生物资的保障能力,以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行稳致远创造安全可靠的经济运行环境。二是必须健全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体系,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与时俱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强化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自然灾害防治等工作,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要重视乡村社会稳定对于国家安全稳定的压舱石作用,着力推进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建设,切实提高乡村社会风险治理能力。要定期对农村道路交通、燃气、消防、自建房等重点领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并完善相关灾害预警机制。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高效推进应急处突工作,让农民在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充满安全感。三是必须

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加强网络安全,凝聚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要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依法打击虚假有害信息,提高全社会对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认同感,为“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凝心聚力。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1).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9.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6.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0.
- [6]习近平.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J].求是,2025(12):4-12.
-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5.
-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5.
- [9]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J].求知,2022(2):4-10.
- [10]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 [12]赖德胜.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6):10-16.
- [13]肖凯.“三个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问题导向[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24(5):23-28.
- [14]李楠,王继晨.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4):101-105+112.

[15]习近平.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J].新长征,2022(10):4-7.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6.

[17]习近平.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J].奋斗,2025(5):4-7.

责任编辑:祝远娟

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若干思考

孙宝林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不仅关系到党的理论创新,也关系到爱国统一战线事业的健康发展。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时代和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者肩负的一项重要历史责任。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应着力加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的研究,着力加强爱国统一战线基础理论、根本职能及其自身变化的研究。要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把政党、政府和社会力量统筹起来、把理论探索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把专家学者与工作人员协调起来、把民族性与国际性统合起来,形成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合力。

关键词: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论研究;体系化;学理化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02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13-08

习近平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1]2024 年 11 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2]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体系化、学理化又是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面临的突出短板。习近平的重要论述阐明了推进体系化、学理化不仅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

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爱国统一战线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彰显,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显得尤为迫切。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以理论上的清醒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既是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完成自身使命的需要。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不仅关系到党的理论创新,也关系到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爱国统一战线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概括和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

收稿日期:2026-03-21

作者简介:孙宝林,男,北京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代化的历史进程,为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而奋斗,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3]。《建议》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实现途径。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法宝。因此,必须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不断深化对爱国统一战线发展规律的认识,统筹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协调发展。

(一)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坚定爱国统一战线制度自信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指出:“我们有符合国情的一套理论、一套制度,同时我们也抱着开放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基本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反对党,不是三权鼎立、多党轮流坐庄,我国法治体系要跟这个制度相配套。”^[4]爱国统一战线既是我们党领导的政治联盟,也是一项具有制度化特征的重要政治制度。爱国统一战线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构建的,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制度建设实践探索中逐步定型的,其核心功能、工作原则及运行机制已通过《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文件实现规范化、体系化,并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爱国统一战线坚持自信、自立、自强,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得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指导。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体系化、

学理化是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从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统一战线至今,一百多年来统一战线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爱国统一战线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伟大创造,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显著的优越性。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既是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重大时代课题,也是坚定爱国统一战线制度自信的现实需要。

(二)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关系到统一战线干部队伍建设

统一战线干部队伍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统一战线干部队伍建设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首先,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可以帮助统一战线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要使统一战线干部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确保党的意志和主张贯彻到统一战线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就必须不断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建设。其次,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能够提高统一战线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通过推进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带动广大干部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规律、明确前进方向、掌握科学工作方法,能够从整体上提高统一战线干部的政治素养和鉴别能力。再次,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有助于提高统一战线干部的履职本领。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统一战线干部把增进共识作为重要职责。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能够使统一战线干部进一步加强理论武装,帮助他们自觉承担起思想政治引领和增进共识的重大政治责任。总之,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有助于建设一支勤奋学习、政治过硬、作风民主、求真务实、廉洁自律、团结奉献、开拓创新的统一战线干部队伍。

(三)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关系到爱国统一战线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实践是理论的检验。理论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和政策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和指导工作实践。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重要成功经验。新时代新征程,在爱国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必然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科学阐释这些新情况,破解这些新问题,既是对实践探索能力的检验,也是对理论创新能力的检验。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要确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始终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必须对发展中的重大实践课题作出系统的科学解答。只有体系化、学理化的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才能指导爱国统一战线事业不断守正创新、健康发展。

近年来,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工作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相对于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对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要求而言,还存在若干短板和弱项,如研究的前瞻性、系统性和协调性有待加强,缺少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理论研究尚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态,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还处在摸索阶段,理论指导实践的效能亟待提高等。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创新性思维的缺乏。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9]总体而言,我国在世界媒体市场的发声与自身的大国地位不相匹配。据统计,中国在当今世界媒体市场上话语权的份额较少,其中美国占43%,欧盟占34%,日本占10%,韩国占5%,中国仅占不到4%^[9]。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所肩负的新使命,要求理论研究必须观照现实,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突

破口,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和利用好国外优秀学术资源的基础上,总结提炼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原理,不断提高学术原创力,在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同时,提升其世界传播影响力。

二、坚持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正确方向

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是理论性很强的政治工作,理论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推进这项工作必须要有高标准的政治站位、高标准的科学要求、高标准的学术尺度,确保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正确方向。

(一)坚持用正确的政治方向统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指政党在政治活动中所坚持的根本目标和前进道路,直接关系其生存发展及事业兴衰。正确的政治方向具体包括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其核心内容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爱国统一战线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根本保证。爱国统一战线事业是党的事业,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我们既要自觉坚持党对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在爱国统一战线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又要全面履行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职能。这既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最大的政治责任,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政治要求。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必须自觉地肩负起这一重要政治责任,服从于这个根本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仅直接关系到统一战线发展的性质和前途,也直接关系到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成败。我们不仅要正确的政治方向统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全过程,而且要紧密结合“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民主党派史”“中共党

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深入阐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从而以正确的政治方向统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建设。

(二)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和指导性。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分析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明确提出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工作重点、原则要求和方式方法,突出强调了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根本遵循。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深刻领悟“十二个必须”的核心要义,加强对爱国统一战线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实践运用。例如,党遵循统一战线“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规律,创造性地提出“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把协调一致性和多样性作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爱国统一战线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又如“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宗教工作领域的重要举措;再如“必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方针在我国非公有制领域的创新性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要全面阐释上述党的创新理论在实践运用中的重大意义,从历史沿革、中外比较和实践成效等维度深入剖析,从理论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科学合理的答案。

(三)把扎根中国大地作为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承、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7]262-263}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特质。也就是说,爱国统一战线是立足中国实际,由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实践发展演变而来,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及其发展进程必须从本国的文化传统、国情实际、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

一是爱国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而且是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的论断^[8]。据此,党的二大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并探索实践了这一主张。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三三制”政权,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建国,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我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

二是爱国统一战线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共存”“协和共生”“协和万邦”等思想,通过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激活实现了升华,成为“协商发展、合作共赢”统一战线工作原则的重要文化根脉。毛泽东提出的“商量政府”^[9]、邓小平提出的“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10]、习近平提出的“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7]269},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商民主精神的生动写照。因此,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要以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历史文化,以爱国统一战线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爱国统一战线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创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创立的统一战线的自主知识体系,才是行得通、立得稳、真管用的知识体系。

三、准确把握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着力点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原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局。因此,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时代赋予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历史使命。

(一)加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统一战线工作要始终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重要原则,通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要胸怀“国之大者”,勇担时代重任,把抢占理论制高点和打赢理论攻坚战作为紧迫的工作任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126]。同时,爱国统一战线还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服务等要求。爱国统一战线必须把握自身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大现实责任,扎实做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的工作。深化爱国统一战线履职尽责研究,关键是要着力做实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着力抓好统战工作领域改革措施落地,着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着力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等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二)加强爱国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13]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对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

性问题作出科学系统的阐释。二是要进一步深化爱国统一战线制度优越性研究。通过深化制度建设的中外比较研究,从理论上深刻阐述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设置的政治优势。爱国统一战线制度优越性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政党层面,还要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进行全面认识和系统分析,进一步彰显优势、坚定信心、凝聚共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统一战线是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125]。这是中央文件对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明确规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把“重要法宝”提升为“强大法宝”,虽然只有两字之差,含义却极其深远。理论研究者要从基础理论方面对“重要法宝”和“强大法宝”进行综合性研究和系统性阐释,为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加强爱国统一战线职能研究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职能有多个方面,如爱国统一战线是实现广泛团结、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是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是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安排人事、合作共事、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途径,是联络友谊、沟通感情、促进“和平统一”的桥梁纽带。爱国统一战线各项职能内在统一于凝心聚力,这是爱国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主题的根本要求。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对凝心聚力的内涵与外延、基本要求、实现路径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是强化凝心聚力的方法论研究。在爱国统一战线根本职能问题上,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理论上“不懂”为何要凝心聚力,在实践上“不会”去凝心聚力。鉴于此,加强凝心聚力的理论研究,着力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数字统战”理论框架,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社交网络是如何改变统战组织凝心聚力内在机理;二是从

顶层设计上健全凝心聚力的体制机制、完善凝心聚力的制度体系;三是在搞清楚凝心聚力逻辑理路的基础上,提出整体提升凝心聚力效能的务实举措。

(四)加强爱国统一战线自身变化研究

1.坚持守正创新。没有守正就没有继承,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在改革的实践中坚持守正,是爱国统一战线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2.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推进爱国统一战线自身改革的现实要求。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爱国统一战线自身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阶级联盟转变为政治共同体。现今的爱国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还涵盖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港澳台同胞等群体。

二是法宝内涵的变化。形势的发展赋予法宝新的时代内涵。我国是法治社会,爱国统一战线不是法外之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发挥强大法宝作用。只有法治规范健全,才能发挥出强大的法宝功能。依法治国要求爱国统一战线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要依法有据,每一项举措的实施都要有法可依。

三是拓展国际化研究视野。要全面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的优势和价值,就必须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全球范围。通过比较研究,全面把握爱国统一战线在国际上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以及与其他政治制度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不仅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理论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能提升我国在世界民主体系中的话语权。一方面,全球治理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全球治理更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四、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形成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合力

习近平提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7]36},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和学理化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发展目标。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研究课题。此项研究必然要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既需要对爱国统一战线进行宏观的概括,也需要对其微观领域进行具体分析。如此看来,就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而言,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都难以胜任。因此,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实施跨学科研究是完成任务的重要保证和有效措施。

(一)要把政党、政府、社会三方的力量统筹起来

以往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大多局限于政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爱国统一战线成员遍布于政党、政府和社会各个领域,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涉及政党、政府和社会的各个部门。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形成,意味着爱国统一战线不仅要在政党领域中展开,也要在政府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展开。在政府和社会领域开展统战工作,是基于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和战略意义提出的,旨在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确保党和人民事业健康发展。在政府领域开展统战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和提升治理效能,而且直接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在社会领域开展统战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应对复杂形势和促进社会和谐,也直接关系到推动社会进步。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以大统战工作格局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既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也是爱国统一战线自身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仅限于政党领域的力量难以胜任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任,必须构建政党领域、政府领域和社会领域“三位一体”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这样才能完成此项重要任务。

(二)要把理论探讨和社会调查研究结合起来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必须把理论探讨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不断推进爱国统一战线

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毛泽东曾经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14]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楚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弄清楚基层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研究加以解决。”^[15]调查研究主要是针对既定的研究课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对收集到的现实社会数据和资料进行整合分析和理论概括,为构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和制定政策提供经验材料与数据支撑。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17]484}理论探讨与调查研究的关系体现为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互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学理化和体系化的核心机制。通过开展调查研究,系统地收集第一手资料,揭示现实矛盾和问题,可以为理论探讨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在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中,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紧迫问题作为理论探讨的攻关课题。实践已经证明,把理论探讨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是理论建设的最佳路径。

(三)要把领导、专家和具体工作人员协调起来

领导、专家和具体工作人员相结合能够有效整合多方资源,提升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实效性。领导负责方向把控和政策制定,以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综合规划和统筹理论研究的全过程,确保理论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专家提供专业知识和创新方案,一方面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研究经验行使理论研究的自主权和学术话语权,确保理论研究符合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还可以发挥学术带头人作用,做好研究团队的传帮带工作。具体工作人员通过参加集体讨论的方式充分发表意见,避免理论研究脱离基层实际;在参与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过程中养成学理论、重研究的良好作风,在胜任本职工作的同时成为理论工作的行家。三者结合的优越性在于既避免了理论研究脱离实际、提升了工作效率,又深化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是各级

统战部门和社会主义学院的理论研究工作内容,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做好统筹规划工作。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具体工作人员三结合的研究机制,把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全过程建立在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基础之上,确保三方能够协调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达成共同的目标。

(四)要把民族性与国际性统合起来

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要有国际视野,从人类发展的大潮流、世界变化的大格局中审视和研究爱国统一战线问题。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无疑要以本国的国情为根据、以相关资料和数据为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爱国统一战线既蕴含自身发展规律的特殊性,又体现了世界统战组织发展规律的普遍性。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就是要讲清楚其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广泛的影响力,才能被世界各国理论界理解和认同。国际性是科学理论的本质属性,理论研究要顺应这一规律。其一,要开展不同政治体制下的统战组织比较研究,分析在民主政体、混合政体等不同政体背景下统战组织的运行逻辑和政治整合机制的异同,通晓不同政治体制下统战组织的特点和专长,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胸怀,积极吸收国外有益的民主思想资源、理论范式和科学方法,助力构建爱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其二,在与国外政党及统战组织交流合作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向国外政党及统战组织介绍中国爱国统一战线取得辉煌成就的制度因素,不断创新对外宣介传播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方法,着力提升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让国外受众乐于接受、易于接受。其三,要做好“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指出:“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17]280}一方面,要分批次安排理论研究者到国外开展交流合作,与国外统战组织的专家学者组成研究团队、共同攻关。另一方面,要举办统战理论高端论坛,把外国专家学者请进来分享国外统战组织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通过取长补短,扎实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体系化、学

理化。

总之,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理论工作者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政策、举措更加符合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不断谱写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爱国统一战线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3-07-02(1).
- [2]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24-11-30(1).
- [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69-74.
- [4]习近平.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J].新长征,2024(4):4-13.
- [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 [6]冷淞.新形势下媒体国际传播与话语权竞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3.
- [7]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5.
-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8.
-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8.
- [1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12]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21.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3.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9.

[1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强调 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 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N].人民日报,2024-12-28(1).

责任编辑:刘菊香

·特别策划·统一战线工作评价体系研究·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研究

张建军, 李 丹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400074)

摘 要:基层统战工作是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当前,基层统战工作面临评价体系科学性不足、系统性不强、评价考核方式单一等问题,影响了基层统战工作效能的发挥。需从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构建科学评价标准与特色评价指标、优化评价流程、强化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推动基层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03

[中图分类号]D613;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21-08

引言

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广泛凝聚共识。”^[1]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2]。基层统一战线是党的统一战线的根基,涵盖区县、乡镇、社区、机关学校、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等领域,涉及面广、受众群体多。新时代以来基层统战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对深入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意义重大。统战工作评价是引导基层统战工作方向、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工具,对于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压实统战工作责任、推进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优

化完善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有助于全面准确把握基层统战各领域重点和难点工作,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在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强大法宝作用,是新时代推动基层统战工作创新的必然要求。

一、构建完善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构建完善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是新时代赋予统战工作的重要使命,既是加强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织密“大统战”工作网络的制度保障,也是破解基层统战工作碎片化难题、提升协同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更是推动基层统战工作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迈进的核心抓手。

收稿日期:2025-11-06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2024-GMD-057)。

作者简介:张建军,男,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李丹,女,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文化。

(一)是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之需

习近平指出:“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也是统战工作行稳致远的根本政治保证^[4]。在基层这一统战工作的前沿阵地,科学构建统战工作评价体系,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必然要求,也是打通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最后一公里”的具体体现,有利于推动统一战线力量与基层工作更为精准地契合,将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精准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统战工作评价体系有助于基层党组织将统战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把党的领导贯穿统战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切实增强做好统战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整合基层各类统战资源,打破部门、领域之间的壁垒,推动各部门、各单位在统战工作中协同配合,履行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推动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基层落地生根,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二)是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升基层统战工作效能之需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多个层次延伸,具有点多、面广、线长等特点。基层统战工作对象来源于社会各领域、各基层单位,具有成分多样性、层次差异性、关系松散性和归属流动性的特点^[5]。由于基层情况千差万别且资源禀赋各有不同,基层统战工作强调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但尚未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和规范。因此,结合基层实际构建科学合理的统战工作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将统战工作的原则、方法、流程等转化为工作实践的标准和规范,又为基层统战工作者提供明确的操作指南,激发基层统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完善的统战评价体系也能够明确基层各部门在统战工作中的职责与任务。通过对基层统战工作的目标设定、任务分解、过程管理、结果评估等环节进行全面评价,有助于推动基层统战工作从分散化、碎片化向系统化、整

体化转变,有效提升基层统战工作的整体效能,形成责任清晰、激励有效的统战工作格局,推动统战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三)是提升统战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服务社会治理之需

推进统战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必然要求^[6]。优化完善基层统战工作评价指标体系是落实新时代统战工作部署的内在要求。构建能够准确反映客观实际和内在要求的基层统战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将纷繁复杂、难以量化的基层统战工作转化为可以度量、计算和比较的量化数据,有利于客观、全面地分析统战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和实施效果,为提高统战工作水平提供现实依据;有利于统战工作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形成规范管理、良性运行的工作系统。同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统战工作可以为基层治理提供有力支撑,这也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根本方针的实践化表达。完善的工作评价体系能够引导基层统战工作更好地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同时发挥统一战线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为基层治理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和智力支撑,助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当前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的特征

基层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最前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广大群众福祉^[7]。为进一步强化基层统战工作成效,一些地区积极探索基层统战工作评价科学化路径,呈现出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指标差异化、评价方式过程化等特征。

(一)评价主体多元化:构建联动格局,凝聚多方合力

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主体是指对基层统战工作成效进行考核、评议、监督的组织、群体与个人。基层统战工作点多面广,涉及主体多,既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要发挥各方优势^[8]。各地尝试引入多维度评价主体,通过整合党政力量、基层单元、统战对象等多元主体,逐步改变以往“上级考下级”的单向评价模式,形成“核心引领、多方参与、协同发力”的评价新格局。四川省泸州市构建组织、基

层、社会“三维”评价模式,将统战成员单位、统战团体、党外代表人士纳入基层评价,引入第三方机构与网络调查开展社会评价,打破单一组织评价局限,有效保障了多元主体话语权,推动形成了多方联动、协同参与的统战工作新格局。重庆市渝北区(今两江新区)龙山街道创新构建“1+U”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评价模式,将民营企业满意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区治理程度、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等统战工作具体指标纳入网格化考核体系,有效激发了各评价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再如,湖南邵阳市建立了市县两级“统战工作领导小组述职评议制度”,采用“一述一评”方式,由市委书记主持会议,27个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12个县(市、区)的主要负责人现场述职,全面汇报统战工作履职情况,并接受现场民主测评。述职考核结果直接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绩效考核体系,有效推动了基层统战工作主体责任的落实。

(二)评价指标差异化:坚持分类施策,实现精准考评

针对基层统战工作长期存在的“软指标多、硬约束少”问题,多地摒弃“一刀切”考核模式,普遍采用“共性指标+个性指标+负面清单”的差异化设置模式,结合不同地区、领域、层级工作特点,精准设定考核内容与权重,确保考核贴合实际、科学有效。为落实精准考评要求,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创新优化考核机制,构建起“分类别+差异化+精细化”的特色考核体系,将州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全面纳入全州综合绩效考评范围,对各县(市)党委统战部和成员单位进行差异化综合考核,采取“区分职责类别、实化载体措施、细化评分细则”的方式,精准匹配各考评对象的工作实际,确保考评科学合理、贴合实效。山西省夏县坚持把成效清单作为重要抓手,推动“软指标”转化为“硬措施”,建立统战工作问题整改台账、统战成员意见建议台账、宗教工作值勤台账“三本台账”,实现统战工作全过程跟踪管理。同时,当地构建“分类别+差异化+精细化”考核体系,依据各村统战工作任务与职责分工,将统战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年终考核,以考核为抓手倒逼相

关责任人扛牢统战工作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细化工作举措,推动村级统战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地、见行见效,切实提升基层统战工作规范化、精准化水平。

(三)评价方式动态化:强化动态管控,注重全程问效

为克服传统评价中过度依赖查阅书面材料、听取汇报以及重结果轻过程、重痕迹轻实效的弊端,多地逐步探索从“年终算总账”的静态考核,转向“日常调度+中期评估+年终考核”的全过程动态评价模式,突出过程管理、跟踪督办与实时问效,通过全周期、多维度、立体化的考评方式,推动统战工作由“年底突击”向“常态抓实”转变,以实际成效验证工作成果。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在统战工作考评中积极探索实践,创新实施“三类两考”工作机制,突出过程管理与科学评价相统一,并采取日常督办、年中考评(占30%)与述职评议、年度考核(占70%)有机结合的方式,强化全过程跟踪督导,对各部门各单位统战工作开展全面精准评价。同时,突出实绩导向,重点考评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发挥、长效机制建设和实际工作成效,推动统战工作提质增效。四川省遂宁市创新运用“听、看、查、访、谈、述、调”七字工作法,按季度对各项指标任务推进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并记录,通过逐项对单核查、多方印证,建立工作落实清单、问题清单,构建起“过程管理、动态评定”的跟踪考核与纪实体系,做到常态化监测和全过程把控,有效避免了年终考核“雾里看花”、凭印象打分的问题,实现考准考实工作实绩、精准绘制干部履职画像。

三、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各地区在推动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大力推进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指标差异化、评价方式动态化建设,有力推动了基层统战工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与基层统战工作实际适配度不足,评价体系的科学性有待提升

科学性强调统战工作评价体系的构建要基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评价指标的选取和设计等都应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并能准确反映基层工作的客观

规律和内在要求,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就基层实际来看,部分地区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仍存在科学性不足的问题,导致评价结果难以客观反映基层统战工作实际。

1.评价指标设计重形式轻实效,未紧扣基层统战工作核心目标。重庆市Z区Y街道虽然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纳入评价体系,但评价指标过度集中于“召开会议次数”“台账记录是否完整规范”等形式化指标上,对“信教群众对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涉及宗教因素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成功率”等反映工作实效的核心指标缺乏足够关注和评价。

2.评价标准笼统模糊,主观性强且缺乏延续性。部分地区评价标准设定过于笼统,无法准确反映基层统战工作的特点和需求。例如,有的评价标准缺乏具体的衡量指标,导致评价过程主观性强,影响评价结果的公正性;有的单位在评价基层统战工作创新时,仅以是否采用了新的工作方式为标准,而忽视了创新举措的实际效果和可持续性;有的在评价工作成效时,过于注重短期成果,对长期基础性工作重视不足^[9];有的地方评价指标一年一变化,致使基层无所适从;有的地方评价指标多年不变,严重滞后,不符合基层实际情况。

3.评价体系适配性不足,存在“一刀切”现象。有的评价体系在区域差异化及工作领域针对性等方面的适配性不够高,搞“一刀切”“照搬照抄”,致使指标体系在基层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有的单位存在直接照搬上级评价指标的问题,未结合本地实际对评价指标进行调整和完善,导致评价指标与地方统战工作实际需求不匹配。例如,部分地区统战工作考核指标的差异化特征尚不突出,未能充分体现不同考核对象的工作侧重点与实际差异,在考核中难以形成有效区分度,无法精准衡量不同地区的工作成效与创新亮点^[10]。

4.数字化技术运用较为滞后,无法有效适应数智化时代管理服务的新要求。当前,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提升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已成为必然趋势,但部分地方统战工作评价在数字化手段运用上存在明显滞后性。省级统战部门普遍建有专门网站

或新媒体平台,而县级统战部门在数字化平台建设上严重不足,统战信息专栏的常态化更新明显不足,无法有效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掌握基层统战工作各项核心指标的完成情况,多依赖人工统计和纸质台账检查,导致评价过程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且效率低下,无法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调整优化。

(二)评价体系的系统性不强,整体推动作用发挥受限

在统战工作中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用系统的观点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11],但现有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性不强,存在评价指标漂浮、指导作用不明显、引导基层干部高质量完成工作目标的导向性不明显等问题。

1.评价体系目标定位模糊,评价导向偏离核心要义。有的单位考核指标整体偏原则化,缺乏系统化的指标体系支撑,考评工作重心过度集中于行政痕迹管理,而对思想引领实效、社会资源整合效能等关注不足。这种评价导向的偏差,导致基层统战工作陷入“台账政绩”的窠臼,削弱了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的独特作用。

2.评价维度较为单一,难以全面反映工作整体质量。当前,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更多侧重于对工作成果的考核,而对基层统战工作过程、工作机制建设以及工作创新等具体内容关注不足,导致评价无法全面反映工作的整体质量。例如,部分地区在统战工作评价指标设置时,“举办民族团结活动次数”“发放宣传资料份数”等日常工作指标权重过高,而对“化解涉民族因素矛盾纠纷实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等关键维度权重偏低,致使个别基层单位出现存在涉民族因素纠纷但依旧在考核中取得高分的情况。

3.统战工作评价的工作力量整合不够到位。统战工作涉及面广,其评价本应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信息共享、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但是,统战部门内部、统战系统与其他部门(如组织部门、纪检部门、工商联等)在评价信息共享、结果互认、协同运用方面依然存在壁垒。不同领域的统战工作评价往往各自

为政,没有考虑到统战工作的综合性特点,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基层统战工作的运行状态和发展趋势,难以发挥评价体系对基层统战工作的整体推动作用。

(三)评价考核方式较为单一,结果运用效能不足

当前基层统战工作评价方式仍然较为单一,存在评价考核缺乏多方参与、方法单一,评价结果运用不足等问题,导致工作评价体系的导向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1.评价主体单一,多元参与不足。“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12]基层统战工作评价的主体应涵盖统战系统单位、统战干部及统战成员等多个维度,以多元参与提升评价体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价主体往往局限于统战工作领域的领导与干部,统战工作对象作为“当事人”和“受益人”在评价体系中缺位。如个别单位在设置年度统战工作考核时,评价主体仅有区委统战部干部和部分乡镇分管领导,统战成员、普通群众、服务对象等被排除在外,不清楚自己提出的意见是否被采纳。

2.评价方法简单化,难以发挥评价考核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的诊断功能。基层统战工作评价应当更多体现在日常工作之中,应当将对具体事项落实情况的动态跟踪,对工作对象真实感受的深度把握,对长期性和隐性工作成效的研判作为评价统战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的重要方式。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依靠看台账、听汇报、查现场等传统手段开展评价的路径依赖较为明显。这种“平时冷、评时热”的工作方式难以反映基层统战工作的真实状态。

3.结果运用弱化,评价的激励和督促作用发挥不充分。点多面广既是统一战线的特点,也是统战工作的难点,涉及党政多个部门,工作较为复杂、繁琐^[13]。基层统战工作评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评用脱钩”“只评不用”的现象在个别地方依然存在。统战专项经费分配、阵地建设项目安排等与评价结果关联度较低,仍存在依据“常规惯例”进行安排的现象,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干部奖惩、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挂钩不紧密,评价的激励效果和督促作用尚未充

分发挥出来,未能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闭环。

四、进一步优化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的建议

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优化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仍需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好统战工作责任制,明确评价目标导向,结合地方实际构建科学评价标准,形成有地方特色的评价指标,制定规范严谨的评价流程,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推动基层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明确评价目标导向

统战工作评价目标导向的科学性与精准性,直接关系到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实际成效。明确评价目标导向,需从三个维度系统发力,确保评价工作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又能精准服务实践需求。

1.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前提。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1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凝聚合力的根本保证,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统战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构建完善统战工作评价体系,要推动基层统战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在乡镇(街道)层面大力推行“一乡(镇、街)一专员”模式,配备专职统战委员,确保其将主要精力用于统战工作。加强村(社区)统战联络员的选配和培训,大力实施“党外干部培养选拔蹲苗计划”,建立健全党外后备干部人才库。落实经费保障标准化,将基层统战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

2.紧紧围绕统战工作的核心任务制定目标。统一战线涉及方方面面,而方方面面都有统战工作^[15]。新时代统战工作涉及多党合作、民族宗教、非公经济等多个领域,不同阶段核心任务各异。制定评价目标时,需深入研究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区实际和工作特点,精准提炼核心任务,确定评价目标,形成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的指标体系。另外,制定的指标要突出可量化性和可操作性。

3.评价应注重实效性和针对性。只有基层统战工作扎实有效,党的执政地位才能更加稳固^[16]。统战工作评价要以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发展为目标。评价指标需贴合实际需求,避免设置空泛、难以衡量的内

容,确保结果真实反映工作成效与问题。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依据工作重点和难点优化评价标准,增强时效性。

(二)结合地方实际构建科学评价标准,确保评价准确公正

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是保障统战工作评价客观公正、有效发挥导向作用的核心要素。构建评价标准需立足统战工作实际,从指标内容、权重比例、衡量方法三个维度进行系统设计,确保评价体系既能全面反映工作成效,又能精准区分工作差异,切实提升评价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1.优化指标内容体系。以业绩为根基,将推动统战工作的实际成效作为核心评价标尺,构建分层分类的指标体系。在纵向维度上,按照工作层级划分宏观战略执行、中观组织协调、微观任务落实三类指标,分别对应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情况、地方党委统筹推进成效、基层单位具体工作成果;在横向维度上,依据统战工作领域特点,细化多党合作效能、民族团结进步、非公有制经济服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凝聚等专项指标。

2.精准设定权重比例。权重比例的科学分配是平衡不同指标重要性,凸显评价侧重点的关键。要根据党中央对统战工作的战略部署和地方发展需求,动态调整各指标权重。对于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方针政策等根本性任务,赋予较高权重,强化政治引领的核心地位;针对阶段性重点工作,适当提高相关指标权重,引导工作资源聚焦。建立权重动态评估机制,定期结合政策变化、工作重心转移等因素,组织专家学者、统战干部、服务对象代表开展研讨,确保权重设置始终契合实际工作需求。

3.深化数字赋能评价手段,提升科学性和时效性。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网络统战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域^[7]。要积极开发智能化评价工具,大力推进数据融合分析应用,构建智能化的评价体系,推动统战工作评价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切实提升评价的可操作性与准确性。加快数据信息化建设,由市级层面统筹或指导区县加快建设覆盖

全面、动态更新的统战工作对象基础信息数据库,涵盖各类统战成员的基本信息、特长优势、诉求动态及参与活动记录等。

(三)坚持实地调研与动态优化,打造彰显地方特色的评价体系

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总任务和中心工作的变化,再加上地区存在的客观差异,构建统战工作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具有针对性^[18]。在构建统战工作评价体系时,设置具有地方特色的指标是增强评价针对性、推动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调研、结合实际与动态优化,可以让评价指标精准贴合地方实际,充分激发统战工作活力,助力打造具有鲜明地域标识的统战工作新格局。

1.深入调研地方情况,深度挖掘地方资源与需求。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需深入开展重大理论问题和各领域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19]。全面系统的调研是精准把握地方统战特色的基础。要组建由统战干部、地方史志专家、统战专家学者和基层工作者等构成的调研团队,采用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多元方式,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文化底蕴、经济产业结构、社会人口构成等信息。

2.将地方特色与统战工作特点紧密结合。地方特色与统战工作特性的深度融合,能让指标更具实践指导意义。在民族地区,应将传统节庆活动中的统战元素融入情况、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培养中的党外人才挖掘情况等作为特色指标;在民营经济发达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聚集的地区,重点关注网络人士参与地方数字经济建设、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成效。在宗教事务管理任务较重的地方,设置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地方实践创新案例数量、宗教领域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等指标,使评价体系既能体现地方特色,又能有效服务统战工作重点。

3.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地方发展与统战工作形势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动态调整机制是确保特色指标持续有效的关键。要设立年度评估周期,定期收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动态、统战工作政策新要求以及基层实践反馈等信息。邀请地方政府部门、高校智库、统战成员代表等参与研讨,根据地方产业升级、

社会治理创新、民族关系变化等情况及时更新指标内容。

(四)制定规范严谨的评价流程,保障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评价流程与方法的严谨性和公正性是确保评价结果准确性的关键。因此,需要规范评价程序,制定详细的评价流程,确保评价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可追溯性,增强评价的公信力和说服力。

1.构建“述评改用”全链条闭环机制。借鉴邵阳市经验,由县(区)委书记主持年度统战工作述职评议会,乡镇(街道)及部门负责人现场述职,邀请统战成员代表参与测评,压实工作主体责任;对评价发现的问题,要建立整改清单,明确责任主体、措施及时限,实行台账销号管理。借鉴重庆市荣昌区推行的季度“政党协商调研成果反馈会”模式,确保整改“件件有回音”;将评价结果与领导班子考核、干部任用、资源配置等挂钩,对连续落后单位的负责人进行约谈或组织调整,形成“以评促改”的良性循环。

2.规范评价全流程操作标准。要细化评价准备、实施、反馈各环节规范。在准备阶段,成立由统战部门牵头,联合组织部门、第三方机构组成的专业评价小组,制定涵盖评价目标、指标、方法的详细方案;在实施阶段,严格规范数据采集活动,通过实地走访、资料核查、系统抓取等多渠道采集数据,并进行交叉验证;在结果反馈阶段,形成包含成绩、问题及建议的完整报告,建立可追溯的评价档案,接受社会监督,增强公信力。

3.引入多元化评价主体和科学方法。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20]。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整体工作合力^[21]。打破单一主体局限,引入“上级部门评、社区群众议、专家学者审”三方协同模式,广泛吸纳统战对象、专家学者、第三方机构参与评价。例如,成都武侯区组建由党外代表人士、非公经济人士等组成的“观察评议团”,通过问卷、访谈、网络评议等方式收集意见,弥补内部评价的局限,提升评价客观性与全面性。

(五)强化评价结果应用,推动基层工作持续改进

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结果导向^[22]。评价结果的应用与转化是评价体系优化的重要环节,要将评价结果作为改进统战工作方法和手段的重要参考,鼓励基层统战部门积极探索创新。

1.建立多维反馈与共享机制。建立健全评价结果即时反馈制度,通过书面通报、专题会议等形式,向被评价单位全面反馈工作成效与问题短板,同步抄送组织部门备案。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评价结果共享平台,通过定期发布评价报告、召开经验交流会等方式,促进基层单位间的工作经验互鉴,增强统战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2.构建考核激励与问责体系。将评价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建立与资源分配、干部任用挂钩的激励机制。对评价优秀的单位,在工作经费、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倾斜;对表现突出个人,在培训机会、评优评先、干部选拔等方面优先考虑。对评价结果不佳的单位,采取约谈提醒、通报批评等措施;对问题严重的单位,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责任,形成“奖优罚劣”的鲜明导向。

3.实施问题整改闭环管理。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建立“责任主体、整改措施、完成时限”的台账管理机制,实行销号制度。将整改情况纳入下一轮评价重点内容,开展“回头看”跟踪问效,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建立整改成效评估机制,通过第三方评估、统战对象评议等方式,检验整改质量,防止问题反弹。

4.推动评价体系动态优化。定期对评价体系进行复盘评估,结合基层实践反馈、政策形势变化和上级工作要求,动态调整优化指标设置、评价方法和权重分配。建立评价体系更新机制,通过专家论证、基层调研等方式,及时吸纳创新实践经验,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适应性,为基层统战工作提供精准导向。

结语

基层统战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党的基层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基层统战工作面临的对象更复杂、

任务更具体、要求更精准,这对评价体系的科学性、适配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统战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基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夯实基层统战工作根基,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基层统战支撑。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9-11-02(1).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3]习近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J].求是,2024(2):4-7.
- [4]本报评论员.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2-08-03(1).
- [5]武强.新时期基层统战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18(3):33-35.
- [6]中共中央统战部.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4(2):23-28.
- [7]夯实“三大基础”筑牢基层统战工作根基[N].新华日报,2024-12-01(7).
- [8]田向利.夯实统战工作基层基础[N].人民日报,2021-04-12(9).
- [9]朱宝龙.关于健全和完善基层统战工作考核机制的思考[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4):39-44.
- [10]常州市委统战部联合课题组,韩九云,汤杨杨,等.大统战工作格局视角下统战考核实践研究[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22(2):22-28.
- [11]林怀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阐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9):23-31.
- [1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08-609.
- [13]王洋洋,李晋玲.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基层统战工作研究[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2):36-41.
- [14]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57.
- [15]艾明江.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和完善[J].理论视野,2025(1):40-46.
- [16]程艳林,朱英海,庞燕.努力搞好新时期党的基层统战工作:来自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的调查与思考[J].中州学刊,2015(6):19-22.
- [17]侯勇,柯增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8(2):1-15.
- [18]张彩云.构建统战工作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23(2):21-27.
- [19]中共中央统战部.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J].求是,2025(5):32-38.
- [20]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人民日报,2022-07-31(1).
- [21]徐锋.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N].光明日报,2025-12-10(6).
- [22]林华山,王京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基于“两个结合”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9(2):13-24.

责任编辑:刘菊香

基于CIPP模型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建构研究

段少帅,张 永

(长安大学,陕西西安 710054)

摘 要: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团结。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是提升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效的关键。本研究以CIPP模型为框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德尔菲法及层次分析法,构建包含背景、输入、过程、成果4项一级指标、13项二级指标及47项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并确定各指标权重。研究表明,过程评价权重最高,凸显教育实施与互动体验的关键作用;成果评价次之,强调以学生实际获得为核心的价值导向;输入评价与背景评价则为教育持续开展提供必要保障。研究从理论层面实现了CIPP模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中的本土化调适,在方法上融合质性建构与量化赋权,所形成的指标体系兼具系统性、导向性与可操作性,可为高校相关教育的诊断、优化与评估提供工具参照,助力推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深化”与“有感认同”转型。

关键词: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CIPP模型;层次分析法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04

[中图分类号]D633;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29-10

高校作为立德树人与思想引领的主阵地,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成效,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习近平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在此聚焦”^[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2023年,教育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指导意见》,对各级各类学校系统推进此项教育工作的作出全面部署,凸显了其在国家战略与人才培养中

收稿日期:2026-03-11

基金资助: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长安大学)2025年学生工作研究重点课题(SCKT2025001);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郑州大学)2023年度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专项开放课题重点项目(ZZUKFZD202301);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江西师范大学)2024年度重点项目(JXSD2024ZD002);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陕西师范大学)2021年度开放课题(21KT05)。

作者简介:段少帅,男,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讲师,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示范中心(长安大学)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评价;张永,男,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地位。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显著,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目标体系化融入、过程精细化管理、成效科学化评估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政策解读、价值阐释、实践路径与课程建设等方面,但对教育质量的系统性测评的探讨相对不足。尽管有研究关注现状、困境及路径,但针对其质量内涵、过程机制与长效评价模型的系统性研究仍相对匮乏,尤其缺乏一套可操作、全过程、多主体的评价工具来规范这一工作。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3],为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指明了方向。因此,构建一套符合教育规律、贯穿全过程、兼具诊断、导向与激励功能的科学评价体系,对于推动此项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深化”和“有感认同”转变,确保国家重大战略在高校落地见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CIPP模型以其鲜明的决策导向、过程关切与改进理念,为摆脱上述评价困境提供了适切的理论框架。该模型强调评价不应仅限于最终结果的检验,更应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全周期,为教育决策的制定、实施与优化提供持续反馈。其系统性的四维结构——背景评价审视教育目标与环境的适切性,输入评价考察资源条件与方案可行性,过程评价关注教育实施与互动质量,成果评价衡量目标达成与综合影响——恰好能够全面回应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目标定位、资源保障、教学实施与成效内化等方面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需求。基于此,本研究依托CIPP模型的理论优势与系统方法,尝试构建一套适用于高校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实现教育的精准诊断、过程优化与成效提升提供科学的工具参照,助力高校更好地担当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

一、基于CIPP模型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的理论框架

(一)CIPP模型与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的内涵意蕴

CIPP模型是由美国教育评价专家斯塔弗尔比

姆在批判以泰勒模式为代表的行为目标评价范式的基础上提出的教育评价理论框架。该模型强调评价不应局限于对最终结果的测量,而应立足于教育活动的实际需求与目标,对涉及的各要素及其环境进行系统考察与判断,其根本目的在于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从而促进教育活动的持续改进与优化^[4]。该模型将评价活动解构为四个逻辑递进且循环互动的维度,背景评价旨在诊断教育目标与社会、组织及学习者需求的契合度;输入评价聚焦于评估为实现目标所配置的资源、方案与条件的可行性;过程评价关注教育方案在实施中的执行质量、互动状态与动态调适;成果评价则全面衡量目标的短期达成度与长期综合影响。这一“诊断—设计—实施—反思”的循环体系,适用于对具有战略性、复杂性与生成性特征的教育实践进行全过程、增值性评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核心举措之一^[5]。它是指在高等学校场域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师生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强化“五个认同”的系统性教育实践活动。首先,在性质上,它是一项战略性思想政治教育。高校作为人才培养、思想孕育和传承创新的高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阵地^[6]。这项教育绝非一般的知识传授或技能培养,而是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其次,在目标上,它追求认知、情感与行为的深度统一。它不仅要求师生系统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源流、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更重在激发内在的情感共鸣与归属意识,最终引导师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维护民族团结、参与国家建设的自觉行动,实现从理性认知到价值认同再到践行的升华。再次,在内容上,它强调整体性与融合性。它并非独立增设的课程,而是有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思政、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各环节。它要求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育活动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资源,

在专业教育中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最后,在过程上,它注重主体互动与生态营造。这项教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基于平等尊重、双向交流的互动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与校园环境、社会氛围、媒体传播等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生态系统建设过程。它强调通过浸润式、体验式、参与式的方法,营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环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7]。

CIPP 模型的系统性、过程性与改进导向,与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内在逻辑及评价需求高度契合,为其评价体系建构提供了适切的理论框架。这种契合性体现在四个维度的深度对应之中。首先,背景评价对应教育的战略锚定与生态适配需求,通过审视学校顶层设计、制度环境与社会期望的一致性,确保教育正确定位与持续发展。其次,输入评价对应教育的资源保障与方案规划需求,通过系统评估师资队伍、课程体系、经费机制等支撑条件的质量与效能,为教育有效实施奠定基础。再次,过程评价对应教育的互动生成与质量调控需求,通过对课堂教学、实践环节、文化氛围等实施过程进行动态监测与反馈,精准把握价值引领从“知识传递”到“认同生成”的关键点。这是教育成效生成的核心环节。最后,成果评价对应教育的成效检验与价值印证需求,通过综合考察学生的认知提升、情感归属、行为转化以及所产生的社会辐射效应,科学评估教育目标的实质内化程度与长远影响。

因此,将 CIPP 模型应用于此项教育评价,并非简单的工具移植,而是一次旨在实现评价范式转型的理论调适。它推动评价重心从孤立的“结果证明”转向贯通的“过程改进”,从静态的“任务考核”转向动态的“效能提升”。本研究以此为框架,旨在构建一个能够深度融合诊断、导向、激励与优化功能的评价体系,从而为高校精准诊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施现状、持续优化其实施过程、有效提升其育人实效提供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践操作性的科学工具与管理参照。

(二)基于 CIPP 模型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内容

在此背景下,基于当前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与深化需求,CIPP 模型以其系统完整的逻辑框架和持续改进的价值取向,展现出对高等教育领域复杂育人工程特有的解释力与指导力。该模型所蕴含的背景诊断、资源优化、过程监控与成效反思的循环逻辑,恰好回应了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对系统性设计、过程性调控与成果性印证的综合评价需求。本研究以 CIPP 模型为理论框架,依据其背景、输入、过程与成果四个评价维度,将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划分为环境基础评价、资源配置评价、过程行动评价与成果绩效评价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8]。其中,环境基础是前提,资源配置是保障,过程行动是核心,成果绩效是关键,四者环环相扣、动态关联,有机融合了诊断性、形成性与总结性评价的功能,共同指向一个具有动态监测、增值评价与发展导向特征的教育评价系统(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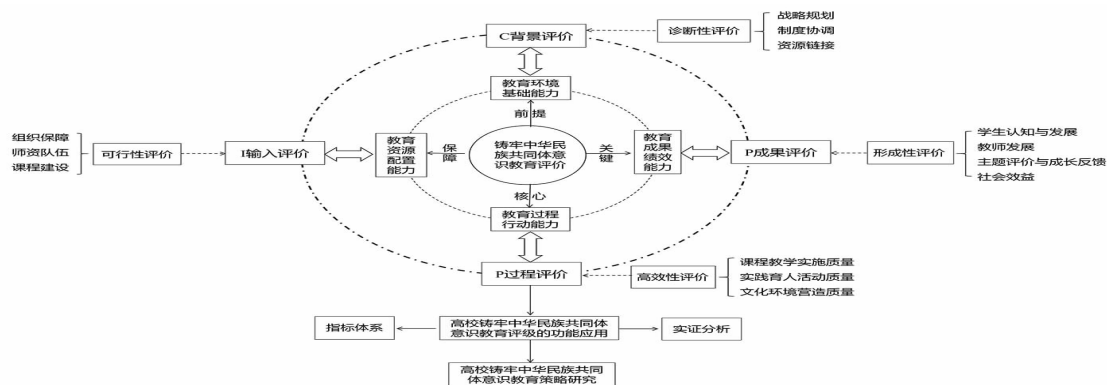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 CIPP 模型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理论模型

首先,是基于背景C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环境基础能力评价。环境基础能力评价旨在对教育实施的战略背景与目标定位进行诊断性评估,是保障教育方向正确性与持续性的前提。本研究将环境基础能力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战略规划、制度协同与资源链接。其中,“战略规划”聚焦学校顶层设计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明确性与系统性;“制度协同”关注相关教育要求在学校既有制度体系中的嵌入度与协同性;“资源链接”则评估学校与外部政策环境及社会资源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能力。这三个二级指标共同构成对环境基础能力的多层面考察,为后续教育实施提供方向引导与条件诊断。

其次,是基于输入I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配置能力评价。资源配置能力评价旨在对保障教育实施所需的基础条件与支持体系进行可行性评估,重点关注为达成教育目标而投入的各项资源的合理性与充分性。本部分主要从“组织保障”“师资队伍”与“课程建设”三个维度展开。其中,“组织保障”侧重评估工作机制健全程度、制度激励强度及跨部门协同效能;“师资队伍”聚焦于教师的学科背景、培训覆盖、教研参与及育人能力建设;“课程建设”则考察课程体系设置、教学资源开发、校企合作及经费保障等要素。通过对上述维度的系统考察,本研究可有效评估教育资源投入的结构与质量,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计划的可行性提供依据。

再次,是基于过程P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行动能力评价。过程行动能力评价聚焦于教育实施过程中的行动质量与执行效能,旨在通过持续监测与反馈,确保教育方案得以有效落实并动态优化。本评价围绕“课程教学实施质量”“实践育人活动质量”及“文化环境营造质量”三个关键维度展开。“课程教学实施质量”关注课堂教学的互动性、学生参与度、内容融合性与技术应用效果;“实践育人活动质量”侧重于教育及社会实践活动的频次、深度与组织形式;“文化环境营造质量”则考察校园文化载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规范、网络平台叙事及师生跨文化交往等。通过对上述过程的系统评价,本研究可及时识别实施偏差,促进教育过程从“单向传输”

向“双向建构”转化,切实提升过程行动的有效性。

最后,是基于成果评价P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绩效能力评价。成果绩效能力评价是对教育目标实现程度与综合影响的系统性评估,旨在通过总结性与发展性相结合的判断,为教育决策的调整与深化提供证据支持。该评价主要依据“学生认知与发展”“教师发展”“主体评价与成长反馈”“社会效益”四个维度展开。“学生认知与发展”关注学生在知识掌握、价值认同、行为意愿与跨文化实践等方面的表现;“教师发展”侧重于教师在教研项目、科研成果、教学创新等方面的专业成长;“主体评价与成长反馈”考察学生、教师及毕业生对教育成效的主观感知与回溯性评价;“社会效益”则关注教育成果在服务基层、辐射社会、形成示范等方面产生的外部影响。通过多维度、多主体的成效评估,可全面检视教育的实际产出,推动教育实践从“任务完成”向“效能提升”迭代,为持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于CIPP模型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体系是对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成效进行评估的关键工具。本研究基于前期对政策文本与学术文献的系统分析,采用专家访谈与半开放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指标拟定工作:首先,通过上述方式进行指标的初步征集与框架构想。其次,采用德尔菲法进行指标筛选与修正,通过两轮专家函询达成共识,确保指标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随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赋权,体现各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两种方法结合,既凝聚专家智慧,又实现指标权重的量化确定,增强了评价体系的可靠性与可操作性。

(一)指标初拟

本研究构建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在结构上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子准则层和方案层四个层级(如图2所示)。基于各项指标的功能属性与来源差异,本研究筛选与确立过程遵循多源融合、上下结合的原则。首先,依据CIPP模

型所强调的“决策导向”及其对诊断性、形成性与终结性评价的整合特性,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思路,确立以“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成果评价”为内容的一级指标(准则层)。该设计旨在体现评价的系统性、动态性与可持续性,并确保指标框架能够全面覆盖教育从规划到成效的全过程。其次,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共同体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等为理论支撑,参照《关于加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指导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的要求,同时借鉴国内外有关民族团结教育、价值观教育评价

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构建与之相应的二级指标,以增强指标体系的学理性、政策契合度与时代性^[9]。最后,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学术文献、政策文本,结合课题组前期在部分高校开展的实地调研、师生访谈所获得的质性资料,对教育实践中的关键环节、典型行为与成效表现进行提炼与归纳,初步形成涵盖教育环境、资源投入、过程实施与成果表现等全要素的三级指标池。

通过上述步骤,研究构建出包含 4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与 47 个三级指标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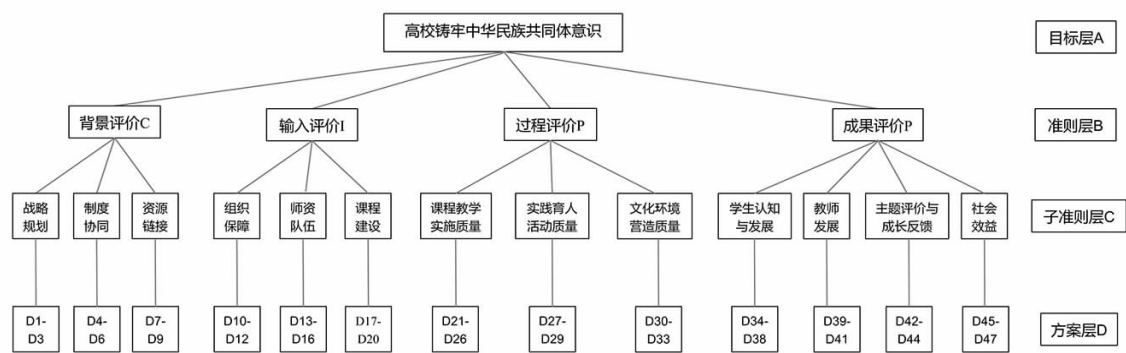


图2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层次结构模型

(二) 指标筛选与修正

为提升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权威性,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对初步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多轮专家函询,以收集意见、优化指标。研究共选取了来自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位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造诣或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其中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学者6人,思想政治教育及课程教学论专家5人,高校主管学生工作或民族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5人,另有长期从事一线学生工作的优秀辅导员4人。所有专家均具有高级职称或十年以上相关实务经验,涵盖东中西部高校,兼顾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确保了意见的多样性与均衡性。

依据德尔菲法的标准流程,研究编制了《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专家咨询问卷》,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匿名函询。专家需对各项指标的重要性、可操作性与表述清晰度进行五级评分,提出修改或增删建议。研究共进行两轮函询,第一轮专家积极系数为100%,第二轮为90%,均高于70%

的临界标准。专家权威程度(Cr)通过专家对问题的熟悉程度(Cs)和判断依据(Ca)综合计算,平均Cr值为0.91,大于0.80,表明函询结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可信度。

1. 第一轮指标修正。首轮函询结果显示,专家对4项一级指标的认同度高度一致,通过率为100%。对13项二级指标和47项三级指标,整体认同度也较高,但部分指标在具体表述、归属逻辑及可操作性上收到了修订建议。主要问题集中于:部分三级指标语义存在交叉或重复(如“教育宣传情况”与“教育活动频次”)、部分指标表述较为笼统(如“资源链接”下的若干指标),另有少数指标脱离高校实际运行脉络。

根据专家反馈,本轮共对12项三级指标进行了修订。例如,为提升过程评价的针对性,将“学生对思政课教师授课方式满意度”进一步明确为“教师授课满意度”;为突出文化环境的浸润作用,在“文化环境营造质量”中增加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

性与艺术性”等相关表述;为避免评价维度重叠,对“实践育人活动质量”下的部分指标进行了归并与优化。经本轮修订,指标体系仍保持为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47个三级指标,但指标表述更加清晰、层次更为分明。

2.第二轮指标修正与确定。在整合第一轮意见并修订后,研究进行了第二轮函询。统计分析显示,专家意见协调性良好,肯德尔和谐系数(W)为0.325($p<0.01$)。所有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均值(M)均在4.2以上(最高5分),标准差(SD)均小于0.5,变异系数(CV)均小于0.25,表明专家意见趋于高度集中与一致。少数专家对调整后的部分指标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基于第二轮反馈,研究进行了最终微调:例如,将“历史叙事融通模块比例”的表述进一步明确为“课程中设置旨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与地方/民族叙事相融通的教学模块比例”;将“社会效益”中“毕业生践行事迹”的说明进一步具体化,强调应体现在基层、民族地区、国际舞台等场域。两轮函询后,专家意见达成共识,未再提出实质性修改意见。

至此,通过两轮德尔菲专家函询,专家意见协调性良好,各指标重要性评分均值较高、变异系数整体较低,表明专家群体对修订后的指标体系已达成高度共识。最终,本研究确立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47个三级指标的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为后续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奠定了内容基础。

(三)指标赋权

由于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采用德尔菲法确定,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凝聚专家共识。层次分析法同样依赖于领域专家对指标间相对重要性的专业判断,两者在方法论根源上具有一致性,能够确保从指标构建到权重确定的逻辑连贯性。此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蕴含丰富的价值判断与政策导向,其权重应充分反映国家战略导向与教育规律认知,而层次分析法正是系统化整合专家价值判断的有效工具。因此,本次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权重的计算。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建构层次结构模型。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分

析原理,将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分解为目标层、准则层、子准则层和方案层,其中目标层为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准则层为4个主指标,子准则层为13个分指标,方案层为47个三级子指标。

第二,构建判断矩阵。针对层析层次结构模型,分别对每一层次构建判断矩阵A。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本次研究邀请了15位相关人员填写了问卷,其中包括民族学研究者5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4人、高校行政管理人员3人和辅导员3人。问卷采用两两比较的形式由专家独立对准则层、子准则层和方案层的相对重要度进行评判,采用Saaty“1—9”标度逐层对每两个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对比打分^[10]:九等级分别赋值为9、7、5、3、1、1/3、1/5、1/7、1/9,分别代表指标i和指标j之间绝对重要、非常重要、比较重要、重要一些和相同重要,而赋值8、6、4、2、1/2、1/4、1/6、1/8则代表指标i和指标j介于上述相邻重要值之间。

$$A = (a_{ij})_{n \times n} = \begin{bmatrix} a_{11} & a_{12} & \cdots & a_{1n} \\ a_{21} & a_{22} & \cdots & a_{2n}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a_{n1} & a_{n2} & \cdots & a_{nn} \end{bmatrix} \quad (1)$$

a_{ij} 表示的是第i个指标与第j个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第三,层次单排序。按照公式(2)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从而得出每一层级各个指标对于上一层级指标的重要性次序权值。

$$\begin{cases} b_{ij} = \frac{a_{ij}}{\sum_{i=1}^n a_{ij}} \\ V_i = \sum_{j=1}^n b_{ij} \\ \lambda_{\max} = \sum_{i=1}^n \frac{(AW)_i}{nW_i} \\ W_i = \frac{V_i}{\sum_{i=1}^n V_i} \\ AW = \lambda_{\max} W \end{cases} \quad (i, j=1, 2, 3, \dots, n) \quad (2)$$

其中, $\lambda_{\max}$ 为判断矩阵的特征值;

W 为特征向量;

a_{ij} 和 b_{ij} 为评价指标。

第四,一致性检验。为避免指标重要性之间出现逻辑性错误,在建构好判断矩阵后,还需要进一步对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比率(CR)计算公式见公式(3)。只有当 $CR < 0.1$ 时才表明判断矩阵 A 通过一致性检验^[11]。

$$\begin{cases} CI = \frac{\lambda_{\max} - n}{n - 1} \\ CR = \frac{CI}{RI} \end{cases} \quad (3)$$

其中, n 为判断矩阵的阶数;

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

首先通过几何平均得到每层指标的最终判断矩阵,再运用 SPSSAU 进行计算。结果显示所有判断矩阵的 CR 值介于 0.001—0.082 之间,均小于 0.1,说明专家打分结果具有内部一致性,结果可信有效。

三、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分析

本研究基于 CIPP 模型的理论框架与德尔菲法的专家共识,构建了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多层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通过对专家判断矩阵的计算与一致性检验,研究获得了各层级指标的权重及三级指标的综合权重(表 1)。通过对权重结果的深度解读,本研究得出以下关键发现:

首先,一级指标权重结构体现过程导向与系统逻辑。4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由高至低依次为过程评价(0.3135)> 成果评价(0.2754)> 输入评价(0.2438)> 背景评价(0.1673)。这一权重格局既符合 CIPP 模型的系统性逻辑,也反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重在过程实施与实效达成的双重特征。其中,过程评价占据最高权重,突出强调了教育实施环节的关键作用,表明富有感染力、互动性与启发性的教育过程是价值内化与学生认同塑造的核心路径。成果评价的较高权重,则彰显了“立德树人”与“成效导向”的评价理念,推动评价从“教育供给”向“学生获得”延伸,体现了该项教育的最终价值必须落脚于学生的认知提升、行为改变与认同深化。输入评价与背

景评价作为支撑性条件,共同构成了教育实践的资源基础与战略环境,其权重分布说明有效的资源保障、机制构建与顶层设计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

其次,关键三级指标解析揭示了评价体系的核心关切。对三级指标综合权重的深入剖析,有助于透视该评价体系所关注的重点环节与实操导向。在所有指标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频次”(0.0407)、“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机制建立及完善程度”(0.0342)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次数”(0.0336)等指标的综合权重位列前茅。这表明,实践育人活动的开展频次与深度、学校内部工作机制的健全程度,是当前评价体系关注的重心,也反映了专家对教育落地机制与实践载体的高度重视。同时,“教师主持或主要参与相关教学改革项目的数量与层级”(0.031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在绩效考核、教师评聘、资源分配中的权重与体现”(0.0308)等输入与成果类指标权重也较为突出,说明教育改革的推进力度、制度激励的强度对教育持续发展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此外,“学生对思政课教师授课满意度”(0.0272)、“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跨历史视角比较与讨论的设计与效果”(0.0257)等高权重过程指标,则强调了课堂教学质量与学生参与体验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最后,指标体系的结构性意蕴构建了动态闭环的改进系统。本次建构的指标体系并非静态的测量清单,其内在权重结构整体勾勒出一个“战略规划—资源保障—过程实施—成效评估—持续改进”的动态闭环管理系统。背景评价作为战略引导层,重在诊断需求与明确方向;输入评价作为条件保障层,重在评估资源配置与机制建设的有效性;过程评价作为教育实施层,聚焦教学、实践与文化氛围的全过程质量;成果评价作为成效检验层,全面衡量教育的认知、行为、社会影响等多维度的成效。这四个层级环环相扣,其权重分布既明确了各环节的相对重要性,也体现了过程与结果并重、条件与成效关联的系统思维。因此,该指

标体系不仅提供了可操作的评价工具,更构建了一个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从“有形覆盖”迈向服务于教育质量持续提升的管理框架,有助于推动高“有效实施”与“有感认同”的新阶段。

表 1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B/ 一级指标	子准则层 C/ 二级指标	方案层 D/三级指标	权重	综合 权重
背景评价 0.1673	战略规划 0.4186	学校章程、发展规划等核心文件对该项工作的明确记载情况	0.3762	0.0263
		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专题研究部署该项工作的年度次数	0.3428	0.0240
		校级专项领导机构与覆盖院系实施方案的建立情况	0.2810	0.0197
	制度协同 0.3241	人才培养、绩效考核等相关制度修订中体现该项工作要求的条款数量与具体程度	0.3617	0.0196
		签约并投入使用的区域性实践教学基地数量及年度接待学生量	0.3382	0.0183
		基于专项调研数据形成的诊断报告数量及其推动教学改进的实例	0.3001	0.0162
	资源链接 0.2573	学校所在地政府部门发布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政策文件的年均密度	0.3915	0.0168
		学校所在地举办全域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的年度场次	0.3327	0.0143
		学校与所在地红色场馆、民族团结示范社区等建立稳定教学合作关系的数量	0.2758	0.0119
输入评价 0.2438	组织保障 0.3584	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机制建立及完善程度	0.3912	0.0342
		相关教育工作在院系绩效考核、教师评聘、资源分配中的权重与体现	0.3524	0.0308
		跨部门协同育人的常态化流程与案例	0.2564	0.0224
	师资队伍 0.3821	具备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背景的专职教师比例	0.2867	0.0267
		核心课程教师完成系统培训的比例	0.2648	0.0247
		牵头或参与省级以上相关教学研究团队的教师比例	0.2415	0.0225
	课程建设 0.2595	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开展浸润式、生活化引导的专项能力培训与支持	0.2070	0.0193
		“必修+选修+实践”三类课程的教学大纲通过专项审核的比例	0.3284	0.0208
		校企/校地合作开发实践课程或案例的数量与质量	0.2916	0.0185
过程评价 0.3135	课程教学实施质量 0.4218	自主开发的特色教材、数字化案例库、虚拟仿真项目等高质量教学资源数量与使用率	0.2258	0.0143
		教育教学改革等专项经费的预算额度、增长机制及使用效益	0.1542	0.0098
		学生对思政课教师授课方式满意度	0.2056	0.0272
		学生上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情况	0.1882	0.0249
		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跨历史视角比较与讨论的设计与效果	0.1947	0.0257
		课程中设置旨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与地方/民族叙事相融通的教学模块的比例	0.1781	0.0235
	实践育人活动质量 0.3082	多媒体技术和信息技术在思政课上的使用率	0.1278	0.0169
		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和反馈及时性与针对性	0.1056	0.0139
		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频次	0.4216	0.0407
成果评价 0.2754	文化环境营造质量 0.2700	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次数	0.3481	0.0336
		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传情况	0.2303	0.0222
		校园品牌活动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设计理念与实施效果	0.2864	0.0242
		在学术、文艺、网络等校园公共领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性与艺术性的示范案例数量	0.2728	0.0231
		学校积极使用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故事的情况	0.2382	0.0201
		师生、生生之间跨民族、跨文化日常交往的便利性、频度与深度	0.2026	0.0171
	学生认知与发展 0.3848	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测试达标率	0.2346	0.0249
		学生在网络平台理性回应涉及民族、历史议题的不良言论或错误观点的可核查案例数	0.2248	0.0239
		学生在模拟或真实情境中,面对涉及民族、历史等议题的片面言论时,所展现的辨析能力与立场表达的水平	0.2392	0.0253
		学生参与促进民族团结的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朋辈互助的主动性与持续性	0.1854	0.0196
		学生参与跨民族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科研团队或创业项目并完成既定任务的比例	0.1160	0.0123

表 1(续)

准则层 B/ 一级指标	子准则层 C/ 二级指标	方案层 D/三级指标	权重	综合 权重
成果评价 0.2754	教师发展 0.2851	教师主持或主要参与相关教学改革项目的数量与层级	0.3952	0.0311
		学校获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科研项目、高水平文章、提供资政报告的成果数量	0.3451	0.0271
		教师形成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案例、特色实践模式的数量与质量	0.2597	0.0204
	主体评价与 成长反馈 0.1952	学生对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教育活动的感知成效	0.3984	0.0215
		教师在此项工作中获得的典型育人案例、教学成果奖及专业成长叙事的数量	0.3518	0.0190
		毕业生对在校期间相关教育的回溯性评价及其对当前工作的影响程度	0.2498	0.0135
	社会效益 0.1349	毕业生在基层、民族地区、国际舞台等践行共同体理念的突出事迹与社会评价的数量	0.4273	0.0159
		学校相关工作模式与经验被外部采纳、推广或获奖的情况	0.3418	0.0127
		学校相关工作经验被上级部门简报、权威媒体或学术期刊报道或采纳推广的次数	0.2309	0.0086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立足新时代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使命,结合教育评价改革的政策导向,基于 CIPP 模型构建了一套系统的教育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理论演绎、专家咨询与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形成以下结论:

首先,研究确立了一个以“背景—输入—过程—成果”为逻辑主线的系统性评价框架。该框架将 CIPP 模型蕴含的诊断、优化、监控与反思功能,有机融入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全流程,有效回应了此项教育所兼具的战略性和系统性、融合性与实践性等复杂特征,从而为超越单一结果导向的评价模式、实现全过程动态监测与持续改进提供了适切的理论支撑。其次,通过严格的德尔菲法程序,构建了一套层次清晰、内容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涵盖 4 项一级指标、13 项二级指标及 47 项三级指标。两轮专家函询中,专家就指标的重要性、可操作性及表述清晰度达成高度共识,表明该体系兼具科学性与实践可行性。最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权重分析显示,一级指标权重依次为:过程评价(0.3135)> 成果评价(0.2754)> 输入评价(0.2438)> 背景评价(0.1673)。该结构既凸显了教育实施过程与学生实际获得的核心地位,呼应“立德树人”的成效导向,也强调了资源投入与战略规划

基础作用。在三级指标中,“教育活动频次”“工作机制完善程度”“社会实践活动次数”等权重居前,反映出评价体系对实践载体、机制保障与互动体验的重点关注。

在理论贡献上,本文实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推进:一是实现了理论嫁接的创新性,将 CIPP 模型系统应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通过本土化构建,推动该模型与中国政策语境、高校育人规律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性的深度融合。二是体现方法整合的系统性,综合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形成“共识凝聚—量化赋权”的连贯路径,提升了指标构建过程的科学性与透明度。三是突出工具构建的实用性,所构建的体系不仅是测评工具,更是一个管理框架,蕴含“战略诊断—资源保障—过程监控—成效反思”的动态循环,为高校开展自我评估与持续改进提供操作指引。

当然,本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建构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依据专家意见构建,样本视角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需通过跨区域、多类型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其普适性。此外,当前尚未开展大规模应用,其效度与预测能力有待后续追踪检验。未来可选取 2—3 所不同类型高校开展试点评估,通过问卷、访谈与观察相结合的方式,检验指标体系的适用

性与敏感性。此外,对教育成效的长期性与增值性评价机制的研究仍需深化。未来可结合数字技术开发动态监测平台,推动评价向常态化与精准化发展。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通过背景、输入、过程与成果四维度的有机整合,推动评价范式从静态结果测量转向系统过程监测。该体系既呼应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强化过程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政策导向,也为推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深化”与“有感认同”迈进,提供了可操作的评估工具与管理参考。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N].人民日报,2020-10-14(1).
- [4]Stufflebeam D.L.The CIPP Model for Evaluation[C]. Presented at the 2003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Oregon Program Evaluator Network(OPEN),Portland,Oregon,2003:31-62.
- [5]张学敏,李雪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一体化建设的价值与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2024,35(1):25-31.
- [6]苗师博,何生海.校园文化有形有感有效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以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学校为例[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6):46-52.
- [7]任玉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 CIPP 模式和知行理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2):209-218.
- [8]罗辉,刘国龙.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四维四级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CIPP 教育评价模型[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24(4):94-101.

[9]许锋华,吕鑫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校教育的实践路径与保障机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5(6):18-28.

[10]Saaty T.L. How to make a decision: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J].Eur.J.Oper.Res.1990,48(1):9-26.

[11]刘明新,塔娜,陈瑜,等.民族高校图书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探究:基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 CIPP 模型实证分析 [J]. 民族教育研究,2024,35(5):46-54.

责任编辑:潘宏纹

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冯 昕,谷佳璐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 530006)

摘 要:民族互嵌式社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单元,也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载体。以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为抓手,系统推进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五个维度的全面互嵌,已成为当前民族工作的关键议题。本文从上述五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开展实践检验,以推动该评价体系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关键词: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指标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05

[中图分类号]D633;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39-10

2014年5月,习近平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会议,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同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一次将“城市民族工作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作为重要政策表述进行了强调和重申^[2]。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3]2023年,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期间再次强调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是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4]。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既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从社会结构与社区互动的角度来看,城市中各民族人口的分布并非一种平面、静止的状态,而是深刻嵌入于城市的社会关系与交往网络之中,其分布格局实质上是民族间经济、社会与文化关系的空间反映。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机会显著增多,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合作机遇,也伴随着新的挑战。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接触频率与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城镇中的民族关系呈现出更加多样和复杂的态势。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其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城市的和谐与进步。因此,社区各民族之间不断增进和谐关系,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结合既有研究来看,我国有关民族互嵌式社区和测量民族关系的研究取得较快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其一,在民族互嵌式社区方面,杨鹏飞

收稿日期:2025-09-04

基金项目:2025年广西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YCBZ2025138)。

作者简介:冯昕,女,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谷佳璐,女,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将民族互嵌式社区定义为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由至少两个不同民族群体共同居住并形成空间交错融合的共同体^[9]。吴月刚、李辉从交往交流交融维度指出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孕育出一种独特关系状态:思想上相互理解与认同,文化上相互欣赏与融合,经济上相互依存与共荣,生活上相互接近与趋同^[6]。其二,在测量民族关系的性质及交往程度方面,学者们对民族关系研究指标进行了细化,涵盖语言使用、人口迁移、居住格局、族际通婚及族群意识^{[7]68-462},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及主流文化认同^[8],社区民族关系、社区治理活动认知、社区参与及社区预警情况^[9]等评价指标。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提出是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的民族工作“新常态”的回应和解答。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可为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一套科学有效的测量标尺与评估工具,是科学衡量民族互嵌式社区实际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嵌入,本文运用德尔菲法筛选并生成评价指标,并根据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指标体系,以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评价指标的初建与说明

本文初步构建了以“空间互嵌、文化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五个维度为核心的评价指标(表1),通过多级指标分解,旨在全面、量化地反映社区互嵌建设的实际状况与居民主观感知,为后续权重赋值的科学性及案例评价的客观性奠定理论基础。

1.一级指标。上述政策框架为互嵌式社区的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导。据此,本研究将“空间互嵌”“文化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确立为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的一级指标。

2.二级指标。空间互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场域。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空间由三个主要维度组成:一是物理性质,即人们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知的物质空间;二是精神属性,包括与空间的概念、表征和认知相关的心理和思

想活动;三是强调人们在空间中的实际体验和日常实践的生命属性,是注重体验和社会关系的存在主义空间,三者相互交织^[10]。从人类学视角来看,空间是涵盖环境、文化、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社会建构^[11]。这表明空间既包含人们日常生活所依托的居住空间,也涵盖文化空间、交往空间、环境空间及网络空间等非物质层面的空间。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要充分利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的“空间互嵌”,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12]。综上所述,在空间互嵌层面,本研究强调完善社区的硬件设施,满足各族人民生活需求,以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共用互促。为此,本研究设定了以下五个二级指标:“居住空间”“文化空间”“交往空间”“环境空间”“网络空间”。

文化互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其核心机制在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它通过打造共同文化根基、增强认同、推动深度交融,达成“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大的文化动力^[13]。民族交融则指在交往交流过程中,各民族特性相互影响、借鉴转换带来一定程度的共同性^[14]。在大规模双向人口流动,以及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现实背景下,消除语言障碍、减少误解与冲突、增进文化认同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15]。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族文化交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三项内容确立为二级评价指标,用于系统性测评文化互嵌的现状与效果。

经济互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经济互嵌不仅为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奠定物质根基,同时成为协调各民族利益关系的重要纽带。随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和生产社会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各民族的消费模式也不断升级。同时,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经济收益^[16]。基于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本研究在探讨经济互嵌的维度时,将“就业情况”“收入情况”设定为二级评价指标。

社会互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撑。国内研究人员将居民对社区的整体满意度及情感

归属等维度归纳为“认知性社会资本”,并指出该资本有助于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进而增强社区管理的整体成效^[17]。此外,社会互嵌还涉及人际互动、日常生活、婚恋交流等方面,从更微观的视角展现各民族交融情况^[18]。因此,在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社会互嵌评价体系时,本研究将“社会资本”“社会交往”设定为二级评价指标。这一指标设置旨在更全面地反映社区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

心理互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中,各族居民在心理上彼此接纳与融入,同时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逐渐凝聚成一个稳固的心理共同体。这一过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正如滕尼斯在论述社区共同体精神时所强调的,这种共同体内部充满温情,成员之间彼此支持、共同依存,形成了深厚的情感联结^[19]。这一论述表明,社区共同体概念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情感因素,社区的发展植根于各民族间的互助与协作。心理互嵌集中表现为社区认同和对公共安全的信任。各族群众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逐步建立起归属感,推动文化互鉴与情感共融,从而实现社区的深度融合与持续发展^[20]。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心理互嵌的二级评价指标确立为“认同感”“归属感”,探讨个体在多民族社区中的心理融合程度,以及“认同感”“归属感”的形成与强化机制。

3.三级指标。居住空间指标: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中心,在多民族相互嵌入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构建集娱乐、休闲、健身与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共享空间。社区内空间要素的布局会直接影响居民对共同生活区域的认知^[21]。居民在社区环境中的生活体验尤为关键,只有社区内部及周边的公共服务设施能与居住空间相互配合,才能构建起理想的居住环境^[22]。综上所述,在“居住空间”这一指标下,本研究进一步设定“空间布局特征”“公共设施配置情况”作为三级评价指标。这两个指标有助于分析居住空间的规划与设计如何影响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居住体验和社会互动。

文化空间指标: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动机是影响居民文化参与的关键因素,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社区文化的发展^[23]。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作为外生驱动因素,其优劣直接影响居民的文化参与度。同时居民的公共服务动机作为内生驱动因素,能够促使居民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从而影响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与创新。在构建“文化空间”评价维度时,需要综合考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居民公共服务动机这两个方面。因此,在“文化空间”的评价体系中,本研究将“文化场所服务质量满意度”“文化参与意愿度”设置为三级评估指标。

交往空间指标:合理利用公共区域设置多样化的交往空间,建立多种形式的居民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是建设亲密和谐民族互嵌式社区的重要手段。在居民沟通机制建设方面,应积极建立社区居民联席会议机制,确保社区内所有民族均有代表参与,广泛吸纳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代表参与^[24]。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议事机构应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推动社区内各类组织和居民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事务的共同协商与治理,进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社区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平台与载体的建立,能够促进彼此深入了解,深化情感联系,营造和谐的居住环境^[25]。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评价体系将“共建共治共享议事机构的认同度”“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载体”确立为三级评价指标。

环境空间指标:良好的社区环境有助于营造稳定、和谐的居住氛围。为此,应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与法律咨询服务,并在出现矛盾时建立快速有效的调解机制,从而避免矛盾升级,维护社区整体秩序^[26]。据此,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采用“法治教育和法律咨询满意度”“矛盾冲突调解机制认同度”作为评价指标,以评价环境空间的建设成效。

网络空间指标:民族互嵌式社区网络空间的建设目标在于打造智慧化平台,汇聚居民的意见和需求,推动社区向更加和谐有序的方向发展,同时提升服务温度,持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在这一过程中,社区认证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区域业主群、楼栋群等网络交流互动平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平台不仅展示社区的形象,还讲述着不同民族居民之间亲如手足、相互扶持的动人故事,同时传递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舆论氛围,从而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深度互动。在评价网络空间互嵌的程度时,本研究采用“线上交流平台认同度”指标来进行量化分析。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也以此为核心展开。一方面,要引导各族群众将“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深植于心;另一方面,要增强“五个认同”^[2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核心部分,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族群众共同认可的价值追求,也是各族群众评判真善美的重要标准^[27]。因此,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本研究将三级指标设置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认同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四个与共’‘五个认同’认同度”。

促进各族文化交流指标:文化认同是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的基础,而文化互动则促进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28]。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核心场所,应积极组织 and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为各民族提供更多互动机会^[29]。费孝通先生以“多元一体”概念来概括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他认为,在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应采取恰当的方式应对文化冲突,进而实现文化间的求同存异和共同进步^[29]。借鉴上述研究,本研究将“组织多元文化活动情况”“尊重和包容文化多样性情况”设置为三级指标,用于评价民族互嵌式社区在促进各族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效。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指标:针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不均衡的问题,应结合居民需求,采用灵活的学习方式、在线课程及数字技术等多种手

段,提供高质量服务,并加大对有需要人群的推广力度。同时,从日常生活切入,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营造良好学习氛围^[30]。社区可以采取多样化的策略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如在社区内部设立专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课程,策划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为了评估社区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成效,本研究采用“开展语言培训课程情况”“举办语言文化活动情况”这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就业情况指标:在社区层面,应加强对各族群众的就业与创业支持,尤其要通过鼓励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提供便捷的本地公共服务,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31]。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工作内容、环境满意度”“就业支持满意度”作为反映就业状况的三级指标。

收入情况指标:收入水平满意度作为衡量经济福祉的关键指标,其价值在于揭示收入分配、社会公平及心理需求满足程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本研究在评估民族互嵌式社区居民的收入满意度时,采取了主观满意度的测量方法。据此,本研究设定了“收入水平满意度”作为评价体系中的三级指标。

社会资本指标:在社区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中,刘志林等学者通过整合多学科理论,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测度与指标构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他们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社区社会资本与居民居住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32]。方亚琴从居民需求视角提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功依赖于三个核心维度:情感认同与归属构建,资源互助与优化整合,集体权益的协作维护。这些需求的实现,需要依托人性化的社区空间、成熟的社区组织与完善的治理结构作为支撑^[33]。为此,本研究采用“社区组织满意度”“社区治理结构满意度”两个三级指标,对社区社会资本进行评价。

社会交往指标:历史上,尤其在大规模人口迁徙阶段,不同民族之间我国曾长期处于多领域明显的不平等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明确废止了以往强化民族等级的制度与法律同时,我国民族间差异依然在日常生活和公众心理中潜存^[34]。个体对资源

的占有情况基本决定了其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该位置进而作用于其社会经济层级,促使同一阶层的人群形成共享的社会身份认同^[35]。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族际通婚被视为衡量民族关系和谐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能够揭示民族关系深层次的状况^{[7]462}。借鉴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选取“人际交往亲密度”“婚恋生活态度”作为三级指标。

认同感指标:各族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能够有效提升其对社区的认同感。主人翁意识的形成,有助于淡化其边缘身份感。这一转变也有助于调动更广泛的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24]。反之,在多民族聚居区治理中,居民互动频率不足、群体整合程度偏低及公共事务参与意愿低下,常导致社会联结机制弱化,阻碍共同体价值体系的构建。当个体对居住环境产生深厚的情感依附时,其会自发形成持续关注公共事务的行为模式,并在社会认同层面确立自身作为社区主体的角色认知。借鉴李立等人的研究,本研究将社区认同感指标设置为“社区事务关注度”。

归属感指标:信任源于对他人或群体可靠性的坚定信念,它是增强民族间归属意识、强化共同体认同的支柱^[36]。高度的社区信任能够转化为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仅增强居民间的联结,也激励人们自发互助,从而营造出和谐互助的社区环境^[37]。社区居民的获得感是衡量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程度的关键指标,也反映着社区治理的完善程度和实际效果。其中,邻里关系是获得感的重要驱动因素^[38]。因此,本研究设置“邻里关系满意度”“对其他民族的人员(社区陌生人)的信任度”为归属感指标的三级指标。

表 1 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初建

一级	二级	三级
空间	居住空间	空间布局特征
		公共设施配置情况
	文化空间	文化场所服务质量满意度
		文化参与意愿度
	交往空间	共建共治共享议事机构认同度
		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载体
	环境空间	法治教育与法律咨询满意度
		矛盾冲突调解机制认同度
	网络空间	线上交流平台认同度

表 1(续)

一级	二级	三级
文化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认同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
		“四个与共”“五个认同”认同度
	促进各族文化交流	组织多元文化活动情况
		尊重和包容文化多样性情况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开展语言培训课程情况
		举办语言文化活动情况
经济	就业情况	工作内容、环境的满意度
		就业支持满意度
	收入情况	收入水平满意度
社会	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组织满意度
		社区治理结构满意度
	社会交往	人际交往亲密度
		婚恋生活态度
心理	认同感	社区事务关注度
	归属感	邻里关系满意度
		对其他民族的人员(社区陌生人)的信任度

(二)评价指标的筛选与确定

根据专家问卷结果,由于 5 个一级指标因均值大于 4、变异系数小于 0.2,因而全部予以保留。二级指标中,“网络空间”“就业情况”“收入情况”因均值未达 4 或变异系数超过 0.2 被删除,相应将“就业情况”“收入情况”修改为“居民就业情况”和“社区就业支持”。三级指标中多项因未达阈值被删除,本研究相应替换或补充了“线上交流平台认同度”“传统节日组织满意度”“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满意度”“薪酬福利的满意度”等更具体的指标。第二轮问卷中所有二级指标均符合要求而予以保留;三级指标中“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满意度”等三项指标被删除,本研究将其进一步优化为“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满意度”“社区就业支持政策宣讲活动满意度”等更聚焦的表述。综上,经过两轮指标筛选与评价,本研究得到最终的评价结果(表 2),该体系具体包含 5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和 27 个三级指标。

表 2 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指标的确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空间互嵌 (A1)	居住空间 (B1)	空间布局特征(C1)
		公共设施配置情况(C2)
	文化空间 (B2)	文化场所服务质量满意度(C3)
		文化参与意愿度(C4)
	交往空间 (B3)	共建共治共享议事机构认同度(C5)
		线上交流平台认同度(C6)
	环境空间 (B4)	法治教育与法律咨询满意度(C7)
		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认同度(C8)
文化互嵌 (A2)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B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认同度(C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C10)
		“四个与共”“五个认同”认同度(C11)
	促进各族文化交流 (B6)	传统节日组织满意度(C12)
		民族节日组织满意度(C13)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B7)	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满意度(C14)
		语言文字规范使用培训认同度(C15)
经济互嵌 (A3)	居民就业情况(B8)	工作内容、环境的满意度(C16)
		薪酬福利的满意度(C17)
	社区就业支持(B9)	社区就业支持政策宣讲活动满意度(C18)
		社区就业支持技能培训满意度(C19)
社会互嵌 (A4)	社会资本(B10)	社区社会组织满意度(C20)
		社区治理结构满意度(C21)
	社会交往(B11)	人际交往亲密度(C22)
心理互嵌 (A5)	认同感(B12)	婚恋生活态度(C23)
		社区事务关注度(C24)
	归属感(B13)	社区居住条件整体满意度(C25)
		邻里关系满意度(C26)
		对其他民族的人员(社区陌生人)的信任度(C27)

(三)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本研究邀请了多位专家参与打分,在确保各位专家对研究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后,邀请其对指标体系权重调查表进行填写。本研究共收集 8 份打分结果,在将专家打分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后,舍弃 3 份未通过检验的问卷,只将剩余的 5 份问卷结果进行算数求值。在确定各级指标层的权重之后,为进一步明确各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本研究需计算其全

局权重(表 3)。该方法是将各指标层的权重乘以其对应上级指标的权重,进而得出该指标在整个模型中的综合权重值。公式如下: $\overline{W_{ui}}=W \times W_{ui}$ ($\overline{W_{ui}}$ 为三级指标全局权重; W 为该指标所属上级指标层权重; W_{ui} 为该指标的局部权重)

表 3 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权重

一级	权重	二级	权重	三级	权重	综合权重
A1	0.102	B1	0.200	C1	0.333	0.007
				C2	0.667	0.014
		B2	0.413	C3	0.250	0.01
				C4	0.750	0.032
		B3	0.258	C5	0.667	0.017
				C6	0.333	0.009
		B4	0.129	C7	0.667	0.009
				C8	0.333	0.004
A2	0.205	B5	0.198	C9	0.198	0.008
				C10	0.312	0.013
				C11	0.490	0.020
		B6	0.312	C12	0.750	0.048
				C13	0.250	0.016
		B7	0.490	C14	0.333	0.033
				C15	0.667	0.067
A3	0.276	B8	0.750	C16	0.333	0.069
				C17	0.667	0.138
		B9	0.250	C18	0.333	0.023
				C19	0.667	0.046
A4	0.276	B10	0.333	C20	0.250	0.023
				C21	0.750	0.069
		B11	0.667	C22	0.750	0.138
				C23	0.250	0.046
				C24	0.250	0.017
A5	0.141	B12	0.500	C25	0.750	0.053
				C26	0.750	0.053
		B13	0.500	C27	0.250	0.018
				C27	0.250	0.018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一)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数据的收集

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衡阳街道,是一个由 58 个居民小组组成

的混合型社区。该社区东接友爱路,北邻火车站铁路,西接北大路,南邻南宁交易场,面积约 0.6 平方公里。中华中路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居住着汉、回、维吾尔、壮、瑶、水等 20 个民族的群众,少数民族人口约 4000 人,约占社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社区内有南宁市梦之岛优购店、利客隆友爱分店、南铁客运段等 19 个驻区单位以及若干个居民小组。社区交通便利,紧邻南宁火车站,附近设有多个公交站,包括南宁火车站公交站等,方便居民出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中路社区创新性地提出了“能帮善引,诚交善融”的八字工作法。该工作法旨在通过能力帮扶、善意引导、诚意交往与善于融合的有机结合,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实践路径。该社区通过创建“民族之家”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为各族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现已成为民族事务基层治理的典范。“中华中路是我家”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受赞誉。2012 年,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获评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是广西首家获此殊荣的社区。2021 年,该社区再次获评第八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这些荣誉彰显了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在促进民族团结、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方面的显著成效,其主要做法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全国各地多家单位前来考察学习交流。

本次调研以中华中路社区居民为对象,问卷发放覆盖了社区各区域,同时通过线上平台广泛收集了居民的反馈。本次调研共计发放问卷 300 份,成功回收 282 份,回收率达 94%;265 份为有效问卷,有效率 88%。问卷背景信息涵盖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和社区居住时长等多个维度(表 4)。被调查者性别比例均衡,年龄以中青年为主,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民族构成多样,包括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瑶族、毛南族、京族等民族。社区居住时长以中长期为主,体现该社区居民具有稳定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征。为确保数据质量,本研究对有效问卷进行了信度分析。经过计算,本研究得出了 Cronbach's α 系数的值为 0.917。此外,结构效度用于衡量问卷题目与其所属维度间的相关强度。本研究运用 SPSS 对

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指标为 0.904,P 值为 0.000***,其显著程度低于 0.01,表明该问卷结构效度理想,且具备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表 4 被调查者统计信息

基本信息	特征描述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39	52.45%
	女	126	47.55%
年龄	13-18 岁	1	0.38%
	19-25 岁	39	14.72%
	26-35 岁	155	58.49%
	36-59 岁	65	24.53%
	60 岁以上	5	1.89%
受教育程度	小学	11	4.15%
	初中	24	9.06%
	高中或中专	72	27.17%
	本科或大专	153	57.74%
	硕士及以上	5	1.89%
民族	汉族	162	61.13%
	回族	4	1.51%
	维吾尔族	3	1.13%
	苗族	1	0.38%
	壮族	89	33.58%
	瑶族	2	0.75%
	毛南族	3	1.13%
	京族	1	0.38%
社区居住时长	一年以内	22	8.3%
	1-3 年	62	23.4%
	3-5 年	107	40.38%
	五年以上	74	27.92%

(二)民族互嵌式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依据预先建立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为每个维度及其具体指标设计了相应的问卷题目,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由受访者对每个问题进行评分。为确保评分过程的公正性与结果准确性,本研究制定了统一的评分标准,按照正向计分方式,将分值设定为 1 至 5 分五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积极程度。在对收集到的 265 份有效问卷进行详细的数据处理和加权平均分计算后,得出中华中路社区建设成效的得分结果(表 5)。

表5 中华中路社区建设成效评价得分情况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分	加权得分
A1	B1	C1	4.27	0.02989
		C2	4.46	0.06244
	B2	C3	4.29	0.0429
		C4	4.29	0.13728
	B3	C5	4.31	0.07327
		C6	4.28	0.03852
	B4	C7	4.31	0.03879
		C8	4.38	0.01752
A2	B5	C9	4.48	0.03584
		C10	4.89	0.06357
		C11	4.89	0.0978
	B6	C12	4.46	0.21408
		C13	4.3	0.0688
	B7	C14	4.32	0.14256
		C15	4.35	0.29145
A3	B8	C16	4.22	0.29118
		C17	4.17	0.57546
	B9	C18	4.3	0.0989
		C19	4.25	0.1955
A4	B10	C20	4.26	0.09798
		C21	4.38	0.30222
	B11	C22	4.65	0.6417
		C23	4.27	0.19642
A5	B12	C24	4.09	0.06953
		C25	4.38	0.23214
	B13	C26	4.28	0.22684
		C27	4.45	0.0801
合计得分				4.36268
百分比				87.254%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紧密结合我国民族政策导向，建立了一个包含空间、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该体系对中华中路社区进行了全面的评估与分析。主要结论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互嵌式社区旨在突破固有的民族成员身份壁垒，消除社会排斥现象，构建多元一体的社会共同体。这一社区模式立足于空间、文化、经济、社

会与心理五个维度，为多民族居民营造一个能够“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商事务、共享娱乐”的融洽社区氛围。在此环境中，各族居民不仅共享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还通过频繁的日常往来建立和睦的邻里情谊，从而促进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互嵌式社区建设，不仅能够促进民族之间的深度往来、沟通，更可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因此，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已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实现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在构建嵌入式社区环境方面成效显著，成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典范。本研究从“五个嵌入”维度对中华中路社区的工作成效进行了评估，满分5分，中华中路社区获得了4.36268的高分。这一优异成绩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华中路社区在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中的卓越成效，也为其他社区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树立了榜样。每一项评价指标的最终得分均超过了4.0分，表明中华中路社区在各个维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建设水平。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四个与共”“五个认同”认同度以及人际交往亲密度等具体指标上，中华中路社区的评分均在4.5分以上。中华中路社区的经验为其他社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对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

第三，实地调研亦揭示了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在构建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中存在的若干不足。具体而言，在空间互嵌层面，居民对居住空间的满意度尚有提升空间；在文化互嵌层面，文化载体吸引力不足；在经济互嵌层面，就业支持力度不足；在社会互嵌层面，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参与度存在短板；在心理互嵌层面，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较为薄弱。针对上述问题，相关部门需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向更高质量方向发展。要加强党建引领与整体规划，完善顶层设计，并在政策层面提供坚实支撑。同时，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彰显其在促进民族

团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实际成效。要着力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受限于研究者知识及研究水平,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后续深化研究。

第一,本研究在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时,面临较大挑战,主要原因是缺乏可直接借鉴的成熟评价指标体系。尽管本研究已尽力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评价框架,但随着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仍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进一步挖掘和纳入更多反映民族互嵌式社区特征和成效的指标,确保评价体系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二是科学确定指标权重,通过更为科学的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三是开展实证检验与修正,在更多社区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反馈结果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持续修正和完善。

第二,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地域差异带来的挑战。本研究以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为研究对象,该社区位于民族成分众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呈现出民族成分复杂、文化多元的特点。此外,社区毗邻人流量巨大的南宁火车站,流动人口众多亦是其显著特点。这些独特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华中路社区在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中的特殊地位。然而,正是这些鲜明特色使得本研究所归纳的中华中路社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成效及路径选择在普适性上面临考验。其是否适用于其他民族地区,尤其是那些在民族成分、文化背景、人口流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未来研究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以提升研究的普适性和实用性:一要加强针对不同地区、社区在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中面临的共性问题的研究,提炼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和策略;二要在关注特定社区的独特经验的同时,拓宽研究视野,涵盖更多不同类型、

不同地域的社区,以获取更为全面的数据和资料;三要通过对对比分析不同地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案例,总结成功经验并识别存在问题,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模式和路径。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N]. 人民日报,2014-05-27(1).
- [2]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14-09-30(2).
- [3]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1-08-29(1).
- [4]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EB/OL]. (2023-12-15) [2025-03-14].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0518.htm.
- [5]杨鹏飞.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特征及定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4):21-28.
- [6]吴月刚,李辉.民族互嵌概念刍议[J].民族论坛,2015(11):5-9.
- [7]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8]赵科,杨丽宏.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文化认同对少数民族学生幸福感的影响[J].民族教育研究,2019,30(5):147-152.
- [9]单菲菲,罗晶.新时代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与治理:基于西北地区四个社区的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9(3):13-17.
- [10]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Vk: Blackwell Ltd,1991:33.
- [11]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9-21.
- [12]孔德猛,章曼姝.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和实践路径[J].复旦学报(社

- 会科学版),2024,66(5):1-12.
- [13]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6-113.
- [14]龚永辉.确立“最大公约数”的“永字八法”: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六[J].广西民族研究,2014(6):1-10.
- [15]刘金林,马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深入推普的思考: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二[J].民族教育研究,2021,32(4):31-41.
- [16]张莉曼.长三角地区各民族交融与互嵌式社会结构研究:基于江苏六市的调查[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2(3):28-34.
- [17]邓念国.认知性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基于杭州的实证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15(4):89-95.
- [18]高向东.发挥好城市促进互嵌的重要功能[N].中国民族报,2022-06-28(6).
- [19][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87.
- [20]仙珠,王文晨曦.共同体意识下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3(11):26-29.
- [21]柴梅.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评价指标的理论构建[J].西部学刊,2020(19):24-26.
- [22]冯健,周一星.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J].地理学报,2008(8):829-844.
- [23]熊婉彤,周永康.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居民参与:公共服务质量与动机的双重驱动[J].图书馆建设,2021(3):34-45.
- [24]刘莹,杨桓.从“嵌入”到“融入”:空间视域中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9(4):80-89.
- [25]单菲菲,高敏娟,张东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实践与未来进路:基于三个民族互嵌式社区公共服务的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24,45(1):39-45.
- [26]冯思豫,祖力亚提·司马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内涵、层次结构和构筑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10):51-61+183.
- [27]高永久,郑泽玮.认同导向下边境牧区各民族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1(4):1-7.
- [28]刘金林,刘玉倩.文化转译视阈下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策略:基于广西百色S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小镇的田野调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4):84-90.
- [29]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3-21.
- [30]黄园园,刘金林,马静,等.边疆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的精神贫困治理效应研究[J].制度经济学研究,2023(4):200-215.
- [31]张福娇,杜社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就业融入研究:以贵阳市为例[J].民族学刊,2024,15(8):103-112+162.
- [32]刘志林,廖露,钮晨琳.社区社会资本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中低收入社区调查的实证分析[J].人文地理,2015,30(3):21-27+71.
- [33]方亚琴,夏建中.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J].中国社会科学,2019(7):64-84+205-206.
- [34]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7(3):93-103.
- [35]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J].社会学研究,2007(6):1-14+242.
- [3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0.
- [37]李立.民族互嵌式社区情感治理实践路径探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1(2):17-23.
- [38]张平,商晨阳.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驱动机制与策略选择[J].学术交流,2024(8):134-147.

责任编辑:潘宏纹

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构建:逻辑、框架与应用

侯水平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针对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工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实效,重统一、轻差异”的评估困境,本文融合法治、治理与评估三重逻辑,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考核评估体系:基于“过程—结果—发展”三维模型,设立了4个一级、12个二级及30个三级指标,通过“刚柔相济”的机制与动态应用模式,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目标。该指标体系不仅提供了可操作的评估工具,也为推动宗教事务治理向数据驱动、精准治理转型提供方法论支撑。

关键词: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宗教事务治理;考核评估指标体系;绩效评估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06

[中图分类号]D635;D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49-07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全面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必然要求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工作作为法治宣传教育向宗教领域纵深推进的重要载体,其实效直接关乎宗教关系和谐与宗教领域稳定,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实践形式。课题组调研发现,当前在一些地方实践中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统一、轻差异”问题,缺乏一套既契合法治精神又贴近宗教实际,既系统全面又便于操作的科学评估工具,导致工作成效难以精准衡量,经验不易提炼、问题不易系统诊断,制约了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深度转变。

构建一套科学化、系统化、导向清晰的“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考核评估指标体系”,不仅具有迫切的

实践应用价值,亦是对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积极探索。该指标体系力图构建一个融“目标引导、过程管控、成效检验、持续改进”于一体的动态管理闭环。本文主要围绕“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考核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逻辑、框架设计与应用路径展开论述,以期为宗教工作部门、宗教团体及相关研究者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框架。

二、宗教事务治理评估研究的进展与空白

当前,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未形成有机整体,更缺乏一套兼具理论深度与操作性的专门评估工具。

(一)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从宏观阐释到评估转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促使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有学者着眼于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与完善,系统梳理了我国宗教法

收稿日期:2026-02-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ZJ010)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侯水平,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法学、宗教工作法治化研究。

律规范体系的演进脉络,指出我国宗教事务治理整体上实现了从政策主导、单一行政管理向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刻转变^[1]。此类研究侧重于回答“应当如何依法治国”的规范性问题。近年来,法治在基层宗教事务中的落地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新疆、内蒙古等地学者结合地方实践,考察揭示了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普法宣传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并探讨了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具体路径与挑战^[2,3]。这类研究开始关注法治如何从制度走向治理的过程机制,呈现出“实践转向”的特征。然而,既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首先,研究的问题集中于宏观制度与中观政策,对宗教活动场所法治实效等微观层面缺乏关注。其次,研究方法以规范分析与经验总结为主,对如何衡量法治宣传教育实效,构建可量化、可比较的评估框架问题研究不够充分。

(二)公共政策评估与指标体系研究:方法积累与宗教领域应用

作为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工具,指标体系在很多领域已有丰富积累。在法治评估领域,国内学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方法论体系。有学者特别强调,应建立独立、客观、可验证的评估机制,以打破“谁决策、谁评估”的自我循环^[4]。在普法评估领域,尽管“六五”“七五”“八五”普法规划均强调考核评估,但对宗教领域考核评估的专门研究仍极为罕见。近年来,评估方法在宗教事务治理领域的应用开始受到学界重视。比如,《宗教学研究》2023年刊发了《政策创新与宗教治理:省级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绩效评估现状与实践反思》^[5]。该研究成果主要聚焦省级管理部门而非宗教活动场所,注重宏观绩效而非法治实效。与此同时,在宗教活动场所应用方面,评估方法亦初现端倪。《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宗教活动场所体检评估研究——以温州市塘下镇为例》一文,以“治理现代化”为视角,采用“体检评估”方法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系统诊断^[6]。

国际学术界在指标体系建构方法上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在公共政策效果评估经典分析框架方面,柯克帕特里克(Donald L. Kirkpatrick)提出了反应、学习、行为、结果“四层次评估模型”,将评

估从“活动实施”延伸至“行为转化”与“实效产出”^[7]。国外的方法论成果虽具有参照意义,但如何将其应用于我国宗教事务治理评估,仍需结合本土实际加以探索。

指标体系研究虽在方法层面日臻完善,但应用于宗教事务治理时仍面临特殊挑战。首先是宗教活动场所组织形态的多元性,难以构建覆盖各类场所的通用指标。其次是评估对象的敏感性,评估设计必须在依法管理与尊重宗教规律之间保持审慎平衡。再次是数据获取的有限性,信众认知、法治理念等关键实效指标难以通过行政台账获取,需要设计间接测量与交叉印证的方法。

(三)地方实践探索与标准化尝试:从分散走向系统

各地就宗教活动场所的规范化管理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如湖州市发布了《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指南》(DB3305/T 127-2019)^[8],扬州市构建“我国宗教中国化场所建设指标体系”^[9]。另外,不少省级层面政策导向也体现了评估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这反映了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对评估标准建设的迫切需求和积极尝试。

同时,地方实践存在明显局限。一是分散化与碎片化特征突出。湖州、扬州等地的探索在评估维度、指标设置、计分规则上差异较大,缺乏统一的框架指导,难以实现跨区域比较与经验推广。二是建设指南与评估标准时有混淆。部分标准或规范为建设指南而非评估标准,偏重“做什么”的规范性要求,而非“做得怎么样”的绩效判断。三是理论提升不足。地方实践多源于工作经验总结,缺乏对评估理论、指标体系方法论的系统运用,指标设计的科学性、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及权重的分配依据等缺乏充分论证。因此,迫切需要将分散的地方经验进行系统化整合与理论化提升,构建一套兼具普适性与灵活性的评估指标体系。

(四)研究空白与本文的学术定位

上述分析揭示,当前研究呈现“四有、四无”的基本格局,即有宏观法治论述、中观政策分析,无场所层面法治实效微观评估工具;有规范分析、经验总

结,无指标化、可验证的评估方法;有地方经验探索、标准先行,无系统理论整合;有绩效管理研究,无法治实效聚焦。

上述研究空白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起点,也提供了学术创新空间。本文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前沿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实现三重突破:第一,将法治逻辑、治理逻辑与评估逻辑有机融合,构建实效评估框架。第二,借鉴公共政策评估的成熟方法,结合宗教活动场所的组织特性、管理敏感性与数据可获得性,进行指标适配与操作化设计。第三,在地方实践基础上进行系统整合与理论提升,将分散的经验要素重构为逻辑自洽、结构完整、可复制、可推广的考核评估体系,实现经验升华。

本研究期望在宗教事务治理评估这一交叉研究领域进行具有理论自觉与方法论意识的学术探索,在为宗教工作部门提供操作工具的同时,为推动宗教事务管理从经验主导型向数据驱动型,从模糊定性向精准定量转变提供方法论支撑。

三、指标体系构建的三重逻辑基础

(一)法治逻辑: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根本遵循

习近平强调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建设,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10]。当前,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核心、宗教事务条例为主干的宗教法律规范体系,实现了宗教事务治理从政策主导向全面依法治理的深刻转变^[1]。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了法治宣传教育的责任主体、核心内容与保障机制,为法律进场所工作提供了权威的法律依据与基本规范。本体系在指标设计上直接对标法律要求:将“普法责任制”设置为评估重点,对应“谁执法谁普法”的法定义务;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宗教事务法规等列为“核心内容覆盖”的必学范畴,直接体现了该法的相关规定。同时,深度契合宗教事务条例等宗教事务专门法规的核心精神,旨在通过评估推动相关法规在基层场所的有效落实,从而提升各项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助力形成从立法、实施到评估反馈的完整闭环;主动衔接国家普法规划等宏观部署,确保评估导向与国家整体普法进程协同。

(二)治理逻辑:回应宗教事务法治化的实践诉求

本体系构建坚持问题导向,旨在回应并破解当前工作中的突出难点。针对普法“表面化”倾向,设置“日常融合普法”“信众感受”等指标,推动法治教育从“搞活动”向“融日常”转变;针对内部管理薄弱点,强化“依法管理”指标群,覆盖法人治理、活动规范、安全责任等关键环节,引导场所健全现代管理制度;围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总体要求,设置“宗教中国化实践宣传”指标,探索法治教育与国情教育、文化浸润相结合的路径;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设立具有一票否决效力的“底线合规”指标,明确划出涉及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法律禁止性红线。这一思路与各地深化宗教事务治理的实践探索同频共振。例如,新疆持续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2],内蒙古锡林郭勒等地积极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路径^[3]。各地关于提升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水平的有效探索,为本体系指标设计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评估逻辑:构建“过程—结果—发展”三维体系

本体系构建借鉴现代公共绩效评估理论,吸收关于“建立科学的政府重大决策法律风险评估规范体系”、打破“谁决策,谁评估”的自我评估循环等学术观点^[4],采用综合性三维评估体系:A1“组织保障与工作推进”(过程维度),着重评估工作的系统性、资源保障度与制度执行力,是成效产生的基础;A2“法治实效与行为规范”(结果维度),作为核心权重板块,重点评估法律知识内化度、法治理念认同度及依法管理行为践行度,直接回应“做得怎么样”的核心关切;A3“创新探索与附加评价”(发展维度),旨在鼓励特色创新与经验升华,引导工作从“合规”向“优秀”进阶。三维体系层层递进,实现了从资源投入到实际产出、从短期合规到长效发展的评估覆盖。

四、指标体系的核心框架、操作设计与创新

(一)系统化的四级指标结构

一级指标(4个),其中A0为前置一票否决项(不参与计分),计分指标为“组织保障与工作推进”

“法治实效与行为规范”“创新探索与附加评价”三大评估维度。

二级指标(12个),对一级指标进一步细分为B0一票否决情形,B1领导与部署,B2内容与活动,B3能力与保障,B4阵地与载体,B5学法成效,B6依法管理,B7氛围与影响,B8服务引导,B9权益保障,B10形式方法创新,B11示范与推广等。

三级指标(30个),为具体、可观测的评分点,B0确定了6个观测点。为确保评估的客观性与可验证性,每个指标都确立了1—4个观测点,明确了考查内容、资料来源与评分标准。

为引导宗教活动场所健全现代管理制度,推动宗教界实现从被动服从监管向主动加强自我管理的转变,本体系设置了“依法管理”指标群。实现这一转变有利于促进我国宗教健康传承,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在要求^[1],也是本体系期望达成的核心治理成效之一。

为探索法治教育与国情教育、文化浸润相结合的具体路径,在二级指标“内容与活动”下,设置了“宗教中国化实践宣传”三级指标。这一设计参考并吸纳了《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指南》(DB3305/T 127-2019)等地方实践经验^[8]。

表1 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考核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与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观测点与评分标准)	资料来源与备注
A0 前置合规审查(一票否决项。是评估的前置门槛,不计入总分。触发任一情形,总体结果直接判定为不合格,评估自动终止。)	B0 一票否决情形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宗教事务管理政策,发生以下依法认定的任一情形,则总体评估为“不合格”: C01.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暴力恐怖思想。 C02.成为境外势力渗透据点。 C03.发生依法认定的邪教组织案。 C04.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重大事件。 C05.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致人死亡或重伤。 C06.场所负责人或主要教职人员因严重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	以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文书、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正式通报、重大事故调查报告等为最终认定依据。
A1 组织保障与工作推进(35分)	B1 领导与部署 (10分)	C1.1 规划部署(4分):制定年度“法律进场所”专项工作计划或将其明确纳入普法、宗教工作要点。	正式文件。无文件0分;有非正式部署得2分。
		C1.2 机制建设(3分):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明确牵头与配合职责,有运行记录。	联席会议纪要、联合发文等。
		C1.3 督导检查(3分):对下级单位或所辖场所开展工作督导、检查或考核,有记录与反馈。★	督查通知、报告、问题清单等。
	B2 内容与活动 (12分)	C2.1 核心内容覆盖(4分):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宗教事务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必学必学内容。★	
		C2.2 重点活动开展(4分):按要求组织开展“宪法宣传周”“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等普法活动。★	
		C2.3 宗教中国化实践宣传(2分):结合“四史”学习、中华文化体验等,宣传阐释宗教中国化。	
		C2.4 日常融合普法(2分):将法治教育元素融入场所日常管理、节庆活动、讲经讲道中。	
	B3 能力与保障 (8分)	C3.1 经费保障(4分):财政预算纳入相关工作经费或场所公共支出,实际用于普法活动。	预算批复、支出凭证等。
		C3.2 队伍建设(4分):建立专兼结合的法治宣传队伍。配备或联络专(兼)职法治宣讲员及法律顾问,在教职人员或管理骨干中培养“法律明白人”(2分)。建立并落实教职人员法治素养定期培训制度(2分)。	聘任协议、培训计划、记录与考核、培训证书等。
	B4 阵地与载体 (5分)	C4.1 实体阵地(3分):场所内设有规范、常新的法治宣传栏(窗)、图书角(法治类书籍>30册),按规定悬挂国旗。★	现场照片、图书目录等。
		C4.2 信息平台(2分):利用场所自有或所属团体的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定期发布普法资讯。	平台截图、发布列表等。

表1(续)

一级指标与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观测点与评分标准)	资料来源与备注
A2 法治实效与行为规范(50分)	B5 学法成效(10分)	C5.1 知识测试(6分):组织教职人员进行法律知识测试,合格率(≥ 60 分)达90%以上。★	测试试卷、成绩统计表等。每低5%扣1分。
		C5.2 法治理念(4分):通过访谈了解,教职人员普遍认同“国法大于教规”,知晓依法维权途径。	匿名访谈记录或抽样问卷等。
	B6 依法管理(25分)	C6.1 内部治理(7分):民主管理组织健全、按章程运作;财务制度规范,执行年度报告(审计)制度。★	章程、会议记录、财务报告等。
		C6.2 活动规范(7分):所有宗教活动、涉外活动、大型活动等均依法履行报批备案手续;无非法传教活动。★	报批备案文件回执、活动档案等。发现一起违规扣3分。
		C6.3 安全责任(6分):消防安全、建筑安全、卫生防疫等制度健全,定期排查整改隐患,无责任事故。★	安全制度、检查台账等。发生一般事故扣3分。
		C6.4 矛盾化解(5分):建立内部纠纷调解机制,考核期涉场所纠纷能依法依规妥善解决,无激化升级。	调解记录、和解协议等。
	B7 氛围与影响(10分)	C7.1 信众感受(5分):信众对场所管理规范、活动有序性、权益保障的满意度较高。	匿名问卷等调查统计结果。
		C7.2 社会声誉(5分):无因违法违规引发的重大负面舆情;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服务,获得正面评价。	舆情监测报告、媒体报道等。有重大负面舆情扣5分。
	B8 服务引导(5分)	C8.1 引导守法用法(5分):引导信众依法从事宗教活动、处理民事关系;能提供基础法律咨询或转介服务。	宣传记录、咨询登记簿等。
A3 创新探索与附加评价(15分)	B10 形式方法创新(8分)	C10.1 特色项目(5分):创设具有本地、本宗教特色且成效显著的普法品牌。	项目方案、成果总结、影像资料等。
		C10.2 技术应用(3分):创新运用新媒体技术或数字平台,有效提升普法覆盖面和吸引力。	技术作品、访问量、互动数据等。
	B11 示范与推广(7分)	C11.1 经验认可度(4分):创新经验被市级以上主管部门简报刊发、官方媒体正面报道,或在区域性会议上作交流。	简报、报道、会议通知等。
		C11.2 荣誉与评价(3分):获得市级以上法治宣传教育荣誉;或作为示范点接受考察,评价良好。	
	B9 权益保障	关注场所及教职人员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依法保障。	观察项,不单独计分,但影响B6、B7评分。若存在侵权且救济不力,在B6、B7中酌情扣分。

(二)明晰化的操作设计

为保障评估的科学性、一致性与可操作性,本体系明确了以下操作特点:

1.评估对象与差异化侧重点。本体系可适用于宗教活动场所、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及宗教团体三类主体,具体应用时须体现评估对象差异化侧重点。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评估,应侧重A2(法治实效)和A1中“内容与活动”“阵地与载体”的建设成效;对政

府部门的评估,应侧重A1(组织保障)和A2(法治实效)中涉及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的指标,如C1.2机制建设、C3.2队伍建设等。对宗教团体的评估,应侧重A1中C1.1制定本宗教领域普法计划,C3.2培养“法律明白人”、配备法律顾问,以及A2中C5.1法律知识测试,C6.1团体内部治理规范性,C8.1提供法律咨询转介等。同时关注A3中经验被认可或获得荣誉等加分情形。

2.评估周期与模式。可用于年度监测与全面评估(如每2—3年一次),前者可选取带“★”标识的核心指标,后者使用全部指标,兼顾评估深度与工作效率。

3.评估方式。为力求结论全面、客观,采用“多源印证法”。可综合运用文档审阅、数据比对、实地察看、人员访谈、第三方评价等多种方式收集资料证据,进行交叉验证。

4.计分与定级规则。若经依法依规确认发生A0“底线合规”中列明的任一情形,则评估结果直接定为“不合格”。

总分=A1得分+A2得分+A3得分

结果等级:

优秀:总分 ≥ 90 分,且A2法治实效与行为规范得分 ≥ 45 分

良好:总分 ≥ 80 分

合格:总分 ≥ 60 分

不合格:总分 < 60 分,或触发一票否决。

(三)突出的设计创新

1.刚柔相济的导向机制。通过“一票否决”条款设定不可逾越的刚性底线,同时通过“创新探索”模块提供柔性激励,形成“底线守牢、高线鼓励”的积极导向。刚柔相济的导向机制等设计创新,既源于理论探讨,也得益于对地方先行先试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例如,湖州市等地通过发布《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指南》等地方标准,对宗教活动场所的法治化与中国化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标准化探索。本体系对分散的地方经验进行了系统化整合与理论化提升,构建了更具普适性的科学评估工具。

2.动态弹性的应用机制。“全面”与“监测”两种模式相结合,并对核心指标(★)进行标识,允许使用者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选取评估范围与深度。

3.强化实效的双重门槛。设定“优秀”等级,不仅要求总分达标,还强制要求A2法治实效与行为规范这一核心维度得分必须达到高标准(得分率不得低于90%),以有效防止“形式主义高分”,确保评估结果不因其他维度的“虚高”得分而被

拉升。

五、指标体系的实施应用与效能展望

“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致力于构建一个从精准评估到有效运用、从强化问责到驱动改进的完整管理闭环。

(一)科学化的实施路径

为确保评估实施过程严谨、证据扎实,须严格遵循前述“多源印证法”,按照既定规则计分定级。为确保评估结果真实,准确反映被评估单位法治化建设的实质水平,应坚持“优秀”等级的双重门槛设计。

(二)系统化的结果运用

评以致用,评估结果可被运用于多个管理环节。

1.形成“评估—反馈—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流程,将评估直接转化为推动问题解决、促进工作提升的管理工具。

2.将评估结果与干部考核、评优评先、资源配置等管理措施挂钩。

3.通过对不同场所、不同地区评估数据的对比分析,可精准识别有效经验、普遍性短板及系统性障碍,为上级部门优化顶层设计、调整工作重点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

4.将评估结果,特别是发现的共性问题和典型案例,向同级或上级党委、政府主管行政部门、人大常委会报告,以反映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实际情况,为普法责任落实和配套制度完善提供来自实践层面的参考。

“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考核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是提升宗教工作法治化、科学化水平,稳步推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益探索,可在多个层面产生积极影响。在操作层面,为基层工作者提供清晰的“施工图”与“体检表”,使法律进场所工作目标可量化、过程可追踪、效果可评估;在治理层面,推动宗教事务管理方式从经验主导型向数据驱动型、从模糊定性向精准定量转变,是提升宗教工作科学化、精细化水平的有益探索;在学术层面,为开展宗教法治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比较模式等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结构化

的分析框架。

构建“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是宗教事务治理领域一项兼具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意义的有益尝试。应该看到,任何指标体系都内嵌着一定的时代性与情境性。“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考核评估指标体系”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动态开放性。它应被视作一个“活”的工具,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宗教工作形势任务的发展演进以及评估实践反馈的持续积累,进行定期的复审、调试与优化。

[参考文献]

- [1]冯玉军.进入新时代 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J].中国宗教,2025(6):66-68.
-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法治中国建设视域下新疆伊斯兰教事务治理法治化道路研究[J].中国宗教,2025(10):25-26.
- [3]苏德.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多措并举 全面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J].中国宗教,2025(10):56-57.
- [4]徐隽.重大决策风险评估不能自说自话: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冯玉军[N].人民日报,2016-01-27(17).
- [5]吴华.政策创新与宗教治理:省级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绩效评估现状与实践反思[J].宗教学研究,2023(5):188-193.
- [6]陈玉娟,黄俊杰,胡俊琪,等.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宗教活动场所体检评估研究:以温州市塘下镇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协会,沈阳市人民政府.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规划的价值与作为——2025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出版者不详],2025:253-263.
- [7][美]唐纳德·L·柯克帕特里克,詹姆斯·L·柯克帕特里克.如何做好培训评估:柯氏四级评估法[M].林祝君,冯学东,译.3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22-82.
- [8]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指南:DB3305/T127-2019[EB/OL].(2020-01-10)[2026-01-11].
<https://dbba.sacinfo.org.cn>.
- [9]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扬州新实践[EB/OL].(2025-01

-26)[2026-01-02].https://zjj.yangzhou.gov.cn/llyj/art_481fdese89d845aecd293a15f699bd.html.

[10]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N].人民日报,2021-12-05(1).

[11]陈琛.推进宗教界依法加强自我管理的路径研究:以呼伦贝尔市有关工作实践为例[J].中国宗教,2025(3):33-34.

责任编辑:潘宏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逻辑、挑战与路径

姚 薇

(宜昌市社会主义学院,湖北宜昌 443009)

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中国式民主的独特优势,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当前,在乡村治理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还面临民主意识淡化、民主主体弱化、民主制度虚化等突出问题。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从理念、主体、制度三方面为乡村治理赋能,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全面提升治理效能。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乡村治理;路径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07

[中图分类号]D422.6;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56-07

民主与治理相互关联、相互贯通、互促互进,共同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可以说,民主治理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是具有鲜明治理属性的新型民主形态,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根基。乡村治理水平直接关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乡村治理。”^[2]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乡村治理模式面临诸多挑战,亟须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乡村治理路径。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不仅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夯实国家治理基石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随着学者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不断深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治理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契合性、优势、嵌入机制等内容进行了充分阐释,但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乡村治理这一更为微观层面的实践关联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新时代乡村治理为研究视角,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剖析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探寻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3]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一种

收稿日期:2025-12-24

作者简介:姚薇,女,宜昌市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民主理念,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实践,其核心价值在于让每一位公民真正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中,而基层正是这一参与的实践起点^[4]。基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场域,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前沿阵地。乡村更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试验田”。因此,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广泛践行民主原则与民主精神。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显著优势与乡村治理实现精治、共治、善治的目标高度契合,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的逻辑前提。

(一)“全链条”的民主契合乡村治理实现精治的内在要求

精治是对治理过程的规范,既是对资源投入的要求,更是对治理效果的追求。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治理正在从“粗放型”向“精治型”转型,这必然要求对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设计,对有限的治理资源进行精准匹配,以精细化的过程、精准化的服务实现高效治理。

1.“全链条”的民主程序塑造精细化治理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完整的制度程序为支撑,是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大环节的“全链条”的民主。“全链条”的民主将民主贯穿于乡村治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形成了“民意征集—民主决策—贯彻实施—全程监督”的工作闭环机制^[5],以完整的民主链条促进乡村治理各环节更加紧密衔接、治理流程更加规范有序。例如,湖北省秭归县把“全链条”的流程闭环运用到乡村治理实践中,持续打造“村落夜话”乡村治理品牌。在每场“村落夜话”中,当地形成“明确主题、前置讨论、议事协商、审核公示、组织实施、反馈评价”六个步骤,确保议而有果、行而有效,进一步提升了乡村治理规范化、系统化水平。

2.“全链条”的民主实践提供精准化公共服务。我国乡村数量多、分布广,农村公共服务普遍存在供给水平低、供给模式单一、供需关系失调、资源配置

不佳等问题。“全链条”的民主能够确保人民群众在各个环节中“在场”,并通过多样化的民意收集渠道,精准识别群众需求,高效集成民意资源,找准治理难点与痛点,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实现治理资源供给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实现乡村治理的“精准滴灌”。

(二)“全方位”的民主契合乡村治理多元共治的发展需求

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口、职业构成更加多元化,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必然要求树立大社会观、大治理观,进而形成参与式、互动式、协同式的治理模式。

1.全过程人民民主塑造“全方位”的治理主体格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及村民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着力打造面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核心在“人民”,重点在“全”,落实在“过程”,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优势、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统筹功能,能够吸纳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村民、乡贤精英等多元治理主体,打造具有共同价值目标、深度利益联结、功能相互补充的乡村治理共同体,从而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格局。

2.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全方位”的治理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由涉及各个领域、不同层次的系列体制机制组成,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的全方位治理体系。从横向看,涵盖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各方面;从纵向看,贯穿中央、地方和基层多层次,达到了各治理主体相辅相成的耦合效果。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在乡村治理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基层政府作为连接上级部门与村级自治组织的枢纽,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基层人大、基层政协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广泛政治参与平台,发挥汇集民意、凝聚共识的重要作用。“全方位”的治理体系保障了基层群众真实全面的民

主参与,为乡村治理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3.全过程人民民主搭建“全方位”的治理平台。全过程人民民主搭建起形式多样的治理平台,形成涉及各领域、各层次的全方位的治理格局。例如基层立法联系点是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载体。截至202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已达54个,覆盖31个省(区、市),带动省、市两级人大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7800多个^[9]。基层立法联系点除了设在市、县的人大常委会和乡镇人大主席团之外,部分还设在政府机构、街道、社区、企业和高校,形成了以基层人大系统为主、各层级多元化单位并存的民主形式和工作网络,为立法注入基层智慧,也为广大基层群众表达诉求提供了便捷畅通的渠道。另外,各地探索的“院坝会”“屋场会”“恳谈会”“板凳民主”等各具特色的协商议事形式,推动民主参与以日常化、生活化的方式融入基层群众的政治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表达的需求,保障了群众的全过程参与,筑牢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

(三)“全覆盖”的民主契合乡村治理追求善治的价值目标

乡村治理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逐步推进乡村善治,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一致性。

1.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全覆盖”。在我国,人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时参与经济、文化、社会等事务的管理。乡村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生动的实践场域。随着乡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基层群众的精神需求也日益增长,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意愿更强,他们渴望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有助于基层群众通过各种形式与渠道参与村务治理并行使民主权利,从而满足基层群众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的需求。同时,通过直接选举、面对面协商、心贴心交流等具体的、日常的民主实践,民主逐步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使人们的民主意识、参与能力在持久的民主实践中不断得到提

升。这既有利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也能够培育基层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自觉,为乡村治理建设高素质农民队伍。

2.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治理领域和内容的“全覆盖”。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的实践全面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与改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社会治理与平安建设等重要事项,并深度融合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例如,1999年浙江温岭市松门镇开展的“民主恳谈会”,经过20多年的深化和完善,其功能从化解群众矛盾扩展到协调公共利益,其范围从单一镇街的创新实践拓展为覆盖多领域的协商平台,其性质从基层探索升华为制度规范,不仅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助推了地方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各领域,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朝着更加民主、高效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乡村治理善治的目标。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

理论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乡村治理高度契合,这使其赋能乡村治理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民主意识、能力、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在乡村治理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制约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

(一)民主意识淡化影响治理的广度

1.基层群众“政治冷漠”心理制约了治理主体的广度。长期以来,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农民相对封闭、保守的性格,加之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公共意识相对缺乏,使得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仍停留在“被动响应”层面。在一些农村地区,村民更关注个人生活,对乡村的发展并不关心。有的村民对选举缺乏足够的重视,认为选举结果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不愿参加选举,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参选率低、候选人范围小等问题。还有的认为村务管理是村干部的事情,对村集体的公共事

务保持习惯性沉默,不愿建言献策。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阻碍了部分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发展事务,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倡导的充分、广泛的参与还存在一定差距。

2.基层政府“强行政、弱参与”的惯性思维制约了治理领域的广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此,村民委员会是设立于农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府是国家政权体系的最基层单位,承担着行政管理职能,两者性质不同,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由此可见,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之间应当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基层政府将大量繁杂的行政事务下达给村委会,导致村委会耗费大量精力完成行政任务,无暇顾及村民自治事务。基层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村委会的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挤压了乡村治理的自治空间,限制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二)民主主体弱化限制治理的深度

1.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足。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乡村治理的“主心骨”。但是,部分农村党组织还存在班子配备不齐、软弱涣散等突出问题。有的村党支部委员队伍年龄偏大、工作能力较弱,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人难选”“人难留”问题突出。这种情况使得农村党组织缺乏创新意识和主动担当精神,引领发展能力较弱,且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

2.基层群众自治能力不足。广大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其认知能力、表达能力、维护自身权益的

能力等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成效。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大批农村地区青壮年外出务工,乡村老龄化、空心化趋势加剧,治理中坚力量严重流失。农村建设主要依靠老年人、妇女、儿童等留守群体。他们文化程度较低,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和协商议事的技巧,即使参与协商也较少发言或几乎不发言,难以准确有效地表达自身观点与诉求,无法承担乡村治理重任。

3.村委会力量薄弱。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在现实中村民委员会作用的发挥却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在外部环境方面,村委会因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出现“小马拉大车”的超负荷运转问题,这限制了其作为自治组织本应发挥的功能,降低了乡村治理的质量与效率。在经济基础方面,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财力支撑不足,村民自治陷入“制度空转”的境地。在村干部素质方面,有的村干部素质不高,村务治理能力明显滞后,难以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要求。

(三)民主制度虚化影响治理的效度

1.民意表达制度有待健全。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制度主要有村民自治制度、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信访制度等。但是,在这些制度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偏差。例如,因选举制度不完善,部分村委会选举存在拉票现象。在信访工作中,由于部门职责划分不清、信息传递不畅、处理机制不健全、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致使一些群众信访事项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2.协商议事制度流于形式。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是进行民主协商的主要方式,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村级组织议事协商还存在随意性较大、不够规范、协商氛围不浓等问题。有些村干部把民主协商简单理解为开会通气,协商活动往往局限于信息收集和结果通报,且协商过程被简化成形式化投票,缺乏充分讨论和意见整合,致使群众参与协商时只能“人

云亦云”。由此可见,协商议事虽然在形式上多种多样,但在个别地方却流于形式。这种“走过场”式的协商降低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3.权力监督制度存在盲区。尽管各个村都制定了村务监督管理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因各种因素的影响,仍存在执行力度不够、监督渠道不畅通等问题。首先,因村级组织层级较低,上级政府部门对农村基层的监督往往存在距离上的困难。再加上农村事务纷繁复杂,政府部门难以实时掌握基层动态,这导致对村干部的日常监管存在滞后性。其次,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村务监督体系中的核心机构,其成员多由村干部及村民小组长担任,监督独立性受人际关系制约。部分村民因害怕得罪村干部,存在不愿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的心理。再次,囿于技术手段的限制,部分农村地区仍依赖人力监督,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应用不足,村务公开存在内容简单、程序不规范、时间不定期等问题。这些因素导致对村干部的监督陷入“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困境,致使村务监督存在盲区。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

将民主与治理有机结合,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必须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之中,充分发挥理念优势、主体优势、制度优势,从理念、主体、制度三方面赋能乡村治理,切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一)理念赋能:以“最真实”的民主本色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凸显了群众全过程、全领域参与的鲜明特色,能够使群众在参与中获得认同感与获得感,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为乡村治理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

1.强化理论宣传,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影响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要在乡村落地生根,就必须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开展互动式、体验式的宣

传,增强话语传播效度,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更接地气、更聚人气。要通过乡村广播、农村文化墙、地方曲艺、文艺表演、抖音短视频等多种方式,讲述鲜活生动的民主故事,宣传民主实践的成功案例,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村民可知、可感、可参与的生动实践,引导村民深刻认识自己所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应承担的民主职责,从而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2.创新实践形式,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色品牌。立足本地乡土人情、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实际,不断创新探索民主形式,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品牌。例如,浙江省诸暨市枫源村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优势,探索了“三上三下三公开”的民主议事机制,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让群众实实在在地参与村内事务治理,形成共谋、共建、共治、共评、共享的“枫桥式”乡村治理新模式^⑦,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了由治及兴、由兴而富的转变。借助品牌效应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度融入乡村治理,既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长效发挥,也提升了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同度。

3.线上线下结合,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场域空间。一方面,打造线下实践阵地。以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人大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为依托,打造功能互补、协同高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阵地,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有机嵌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另一方面,开发线上平台。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在乡村治理中的运用,实现“互联网+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开发集信息发布、民意征集、线上协商、活动组织、结果查询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平台,打破时空限制,降低参与成本,使基层群众能够“足不出户可议事、足不出村可办事”,实现全时空参与乡村治理。

(二)主体赋能:以“最广泛”的民主参与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意味着全体人民享

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既彰显了人民群众在治理中的主体性,又能够激发各类乡村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

1.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要综合考虑政治素养、工作能力、群众基础、年龄结构等各方面条件,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党员退役军人中选拔并培养村党组织书记,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成员。着力培养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党员,强化村级后备干部储备。二是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34],这一思路可以打破地域、行政的限制,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资源互补等原则,组建“片区党建联合体”,推动城乡、村际、村企进行党支部联建,以解决党支部能力参差不齐、各自为政等问题。要通过“片区党建联合体”实行抱团发展,把乡村治理所需的人力、科技、资金、项目等各种资源要素整合起来,为乡村治理提供坚强组织引领和政治保障。

2.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群众的主体作用。一是培养本土人才。通过宣传引导、技能培训、积分管理、激励表彰等多种形式提升农村留守群体的民主意识和治理能力。充分调动农村“五老”人员、致富能手、文化能人、返乡创业人士、新乡贤等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发挥其在道德教育、化解矛盾等治理领域的重要作用。二是引进适用人才。要以情感为纽带、以事业为召唤,通过引进选调生、“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方式吸引外部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反哺桑梓。要加强农村社会工作、经营管理、法治建设等重点领域的人才培养,并将这些人才充实到乡村治理关键岗位,实现人才供给与乡村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

3.充分发挥村委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一是厘清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职责。村委会是连接基层政府与村民的桥梁,要明确划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各自

的权力范围,防止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的过度行政干预,为村委会开展村民自治留出必要空间。二是加强村委会规范化建设。要标准化建设以村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村级综合服务设施,优化村委会办公和服务场所。要聚焦政策法规、村务管理、矛盾调解等内容,对村委会成员开展专业化培训,提高其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政策执行等能力,以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要求。

(三)制度赋能:以“最管用”的民主制度促进治理效能全面提升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管用性”源于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其依靠制度的力量保障人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及公共生活,并为社会治理提供系统性制度支撑。因此,只有健全制度体系,才能促进民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1.构建畅通高效的民意表达制度。一是拓宽多元化的民意表达渠道。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两委”干部要主动下沉基层一线,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访谈等各种渠道,加强与群众的直接联系,广泛收集群众的利益诉求与意见建议,确保“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二是搭建便捷化的民意表达平台。要通过设置意见征集箱、线上议事平台、线下服务窗口和热线电话等,以便群众能够便捷地表达诉求、参与讨论。例如,上海市张江镇“民意直通车”以“智慧人大系统”为核心,融合线下代表联络站与线上小程序,打造全天候民意收集矩阵,实现了民意畅通直达,群众的诉求得到高效回应。

2.构建深度互动的议事协商制度。一是精准设定议题,这是深度协商的前提。打破“自上而下”的议题设定模式,建立以群众诉求为核心的议题生成机制。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事项、民生改善关键事项、社会治理难点事项,通过常态化走访调研、大数据分析研判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议题,把村民的“急难愁盼”转化为协商议题,确保协商议题精准。二是规范协商流程,这是深度协商的保障。构建全环节标准化体系,确保从确定议题、组织协商到督办落实

的每个步骤都有章可循。在协商过程中,要营造畅所欲言、坦诚讨论的协商氛围,鼓励村民各抒己见、充分交流。

3.构建纵横贯通的权力监督制度。一是加强协作联动,凝聚监督合力。统筹县、乡、村三级纪检监察力量,构建以上率下、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大监督”体系,推动村级监督力量有效整合和有形覆盖。聚焦农村“三资”管理、惠农政策落实等“小微权力”运行关键领域,通过交叉检查、联合办案等方式,强化对村干部的监督管理,使“小微权力”处于日常监督之中。二是借助数字技术,延伸监督触角。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村级民主监督,将村务动态以实时数据流形式推送至村民手中,建立起全天候、全流程的监督网络,推动监督从“事后纠偏”向“过程预防”转变,提升监督的即时性和透明性,让村干部的“微权力”更好服务于“大民生”。

四、结语

实践证明,民主的价值理念只有落实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才能彰显其效能。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乡村治理在目标上相互契合、主体上高度一致、场域上交叉融合、实践中同向而行。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不仅能够为乡村发展构建全新的运行机制,更能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引擎。未来,面对更加复杂的乡村治理环境,必须进一步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优势,凝聚乡村治理强大合力,健全乡村治理制度体系,全方位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32.
- [2]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65.
- [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4]陈荣卓.基层民主治理能力与全过程人民民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1):73-85.

[5]乔瑾,郭明月.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三维审视[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1):25-32.

[6]冯添,赵祯祺,周誉东.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在我身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设立十周年[J].中国人大,2025(21):39-41.

[7]郑功帅.协商民主赋能乡村治理的价值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诸暨市枫源村“三上三下三公开”民主议事机制为例[J].中国领导科学,2025(5):90-97.

责任编辑:刘菊香

·统战理论与实践·

从危机到共识:论西安事变中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

何 玲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局转换的枢纽,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理论构想走向政治现实的初步实践。本文旨在将西安事变置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宏大脉络中,从“历史基因—认知跃迁—使命传承”三个维度出发,深入分析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所蕴含的深厚历史基因,阐释其在应对空前民族危机时所实现的认知跃迁。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百年统战史中的使命传承,进而深刻领悟西安事变中统一战线从危机到共识的作用,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继续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提供借鉴。

关键词:西安事变;强大法宝;统一战线;认知跃迁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08

[中图分类号]D613;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63-07

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统一战线始终在党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彰显了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回溯历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对这一宝贵经验的成功注脚。当外敌的侵略严重威胁民族生存,当中国深陷内战“漩涡”,“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2]。本文遵循“历史基

因—认知跃迁—使命传承”的内在脉络,构建一个三维分析框架,旨在系统揭示统一战线在百年统战史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深层逻辑,从而为新征程上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历史镜鉴与实践启示。

一、历史基因: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理论魂脉与文化根脉

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历史基因,源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构成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理论魂脉与文化根脉。西

收稿日期:2026-03-24

基金项目:甘肃社会主义学院2026年专项课题(创新工程科研支撑项目)(GSSYZD202601)。

作者简介:何玲,女,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西安事变中各方力量最终能够实现认知跃迁、共赴国难,也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历史基因。

(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魂脉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深层哲学根基,可追溯至马克思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构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这一宏伟愿景的实现,必然依赖于超越个体与阶级局限的“联合行动”。这种联合,至少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指向国际层面的战略协同;二是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强调进步政治力量间的联合;三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而要实现这种多层次、广范围的联合,必须系统性地解决好三个核心问题:其一,自身团结统一问题。无产阶级首先要实现自身的团结统一。这既指实现一国之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联合,也涵盖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与战略配合。其二,同盟军问题。无产阶级必须采取灵活而坚定的策略,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精准识别并努力争取一切同盟军,与其他阶级、阶层及社会力量建立广泛的联盟。其三,领导权问题。这是统一战线的生命线。在与其他阶级或政党结成联盟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实质上就是要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更形象地阐述,强调“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4]。

纵观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全过程,中国共产党清晰展现了党在极端复杂的局势下对“自身团结统一”“同盟军问题”“领导权问题”的全局把握。在自身团结统一问题上,党面临着事变突发后的严峻考验。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舆论哗然,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出现了激烈争论。部分同志出于对蒋介石长期“剿共”的积愤,主张“审蒋”“除蒋”。面对这一局

面,党中央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清醒与团结能力。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冷静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方意见,最终在“和平解决”这一基本方针上达成全党共识。这一过程不仅统一了全党思想,更避免了因内部纷争而导致的决策失误,确保了党在重大历史关头能够步调一致、行动统一,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在同盟军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洞察力与联合艺术。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洞察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果断调整策略,统战方针从“反蒋”转向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抗日,构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共同基础的广泛同盟,迫使蒋介石最终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在领导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始终坚定立场,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导权。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5]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充满底气地宣告:“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6]32}正是在这场重大危机中成功解决了党的自身团结统一(统一全党思想)、同盟军(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开展联蒋抗日)和领导权(掌握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导权)这三个根本性问题,西安事变才得以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根脉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根脉。有什么样的历史,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7]。这种历史共同性决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

的整体性,由此铸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其中,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8];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则赋予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发展,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一统”“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智慧精髓的充分汲取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西安事变中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其深层动因也在于此。

首先,是“大一统”观念铸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大一统”观念,是维系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纽带。尽管历史上王朝更迭,但维护统一始终被视为最高的政治道义。至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与华北危殆的局势,这种“大一统”观念在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下,迅速转化为全民族救亡图存的集体意识与强烈情感。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成功,首要在于它顺应并高扬了这份追求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历史文化基因。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以发动“兵谏”,其主要动因正是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维系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政治主张。

其次,是“和而不同”理念所蕴含的求同存异智慧。中华文化素来讲究“君子和而不同”,其在承认差异性、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追求在更高目标下的和谐统一。这一哲学智慧为处理极端复杂的矛盾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西安事变所面临的局面盘根错节:中日民族矛盾、国共阶级矛盾、国民党内部矛盾以及国家多方势力政治博弈交织并存。中国共产党在应对事变时,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确立了“联蒋抗日”的正确方针。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西安谈判的核

心便是践行“求同存异”,紧紧抓住“一致抗日”这一最大的“同”,暂时搁置或缓和国共之间的分歧之“异”。此举正是在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统一下的“和而不同”。这一古老智慧在危局中的创造性运用,最终促成了不同党派、不同军队为民族生存这一最高利益而携手。

再次,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以天下为己任,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精神在近代民族危亡中得以极大升华,并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无论是张学良、杨虎城等军事将领,还是参与调停的各界贤达,其行动背后无不涌动着赤诚的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之所以能超越党派与阶级界限,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广泛凝聚起来,正是因为它诉诸了比任何集团利益都更为崇高的民族大义。它将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激发了每个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从而汇聚成挽救民族危亡的磅礴力量。

二、认知跃迁：统一战线发挥法宝作用的政治逻辑

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思维与“多元一体”的家国伦理,塑造了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政通人和的政治文化和强调集体理性与家国情怀的政治逻辑。基于这样的政治文化与政治逻辑,西安事变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政变。各政治主体在其中实现认知跃迁,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不断凸显。

(一)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跃迁：从“反蒋”到“联蒋抗日”的战略升华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救亡图存的高度,不断调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一是从“反蒋”到“逼蒋”“联蒋”的统战方针的根本性转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统战口号定为“抗日反蒋”。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逼蒋抗日”的统战方针。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

共产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认知自觉，确立了“和平解决”以“联蒋抗日”的总方针，最终促成蒋介石口头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是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策略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实现了从单纯的上层统一战线到上下层统一战线相结合的转变。《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9]。在1936年7月2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建立联合战线的工作，应大家出马，不应关起门来”“不仅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级的工作”^{[6]562}。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统战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与领导力的确立。西安事变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的严峻考验。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局势瞬息万变，苏联态度暧昧，国民党内讨伐声浪高涨，张学良、杨虎城处境艰难，全国民众人心惶惶。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站在全民族利益的制高点上，提出和平解决方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西安事变中沉着应变，与宋子文、宋美龄等展开谈判，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展现出卓越的危机处理能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赢得了道义优势和广泛的社会同情，使全国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顾全大局、富有远见、值得信赖的政党，从而确立了党在全面抗战中作为统一战线中流砥柱的地位。

（二）张学良、杨虎城的认知跃迁：从效忠个人到共赴国难的价值重构

作为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认知跃迁体现为对“忠诚”概念的彻底重构和对“中共与抗日关系”的重新定位。一是从“追随者”到“兵谏者”，对“忠诚”概念的彻底重构。从1928年东北易帜到1933年赴欧洲考察，张学良认为服从蒋介石就等同于“爱国”

和“忠诚”。即便不认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并通过“苦谏”“哭谏”等方式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在多次“谏言”失败后，他认识到当蒋介石的政策不顾国家民族危亡时，采用“兵谏”是对国家、对民族更大的忠诚。正如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发动兵谏时讲到的：“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10]。这种为民请命的政治宣言，标志着其认知实现了质的飞跃。二是从“剿共主力”到“联共先锋”，对“中共与抗日关系”的重新定位。作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是执行“剿共”命令的军事负责人。但在与红军交战中，张学良发现红军不仅战斗力强且有抗日热情。通过与周恩来、刘鼎等人的接触和会谈，他完全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可靠的抗日盟友，进而形成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宏大构想。张学良的认知跃迁源于他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看到了人心的力量，他的思想转变也充分印证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百年统战总结的政治智慧。

作为西北地方实力派代表，杨虎城的认知跃迁呈现出从自保到革命的格局升华。一是其政治格局实现了从“地方自保”到“民族救亡”的转变。作为非蒋嫡系的西北地方实力派，联共最初有寻求外援、自保的实用主义考虑。在与中共接触和张学良的影响下，他的思想从保全一隅之地上升到为国家民族寻找出路的高度。他比张学良更早、更坚定地认为“劝谏”是无效的，必须采取非常手段，进而成为民族革命的参与者，也体现出其对政治斗争本质的深刻洞察。二是其政治判断经历了从“反蒋求生”到“联共图存”的根本转变。杨虎城长期受蒋介石的排

挤和打压,对蒋介石的权术和铲除异己的手段有清醒认识,内心深处对蒋介石极度不信任。他坚决反对无条件放蒋介石,认为必须拿到书面保证,否则必遭报复。他的认知比张学良更现实也更务实,这种不信任在事变过程中不断强化。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举动,完全印证了杨虎城的判断。与之相对,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他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实现其救国理想的可信赖盟友。这种认知跃迁使其在张学良被扣后仍能坚持原则,即便最终惨遭杀害亦不改其志。

无论是哪方的认知跃迁,跃迁的核心在于对“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历史判断的集体确认。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仍将剿共作为中心任务。西安事变发生前后,中日民族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西安事变的爆发,就是国民党阵营内部对“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的彻底否定。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使国民党乃至全国民众清晰地看到:除了全民族团结抗日,中国别无生路。这一关于主要矛盾的集体确认,是统一战线得以形成的根本前提,为不同政治力量提供了合作的重大政治基础。西安事变的历史证明,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不仅源于正确的策略,更源于各政治主体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与认知升华。这种基于“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深刻认知,正是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保持生命力并不断发挥重要作用的深层逻辑。

三、使命传承: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

党的统一战线历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等多个阶段^[1],其使命任务始终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习近平指出:“百年奋斗历史还告诉我们,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12]从“主要法宝”到“重要法宝”再到“强大法宝”,统一战线的历史演进深刻表明:越是面临危局、

困局、变局,越是需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正如习近平强调:“统战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讲求很强的工作艺术。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要有特殊的方式方法。”^{[13][78]}我们要从西安事变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传承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把握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基本规律,让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强大法宝作用。

(一)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

党的长期的统一战线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才有团结凝聚的核心,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进,才能充分彰显重要法宝优势作用”^[1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根本、最核心的政治原则,是统一战线发挥强大法宝作用的根本保证。没有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离开党的领导,各方面力量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团结与联合,这是百年统战必须“刻在心坎上”的共识。在新时代,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具有更加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核心是对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等各界人士,要在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政治认同。同时,党的领导既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又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将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真正赢得党外人士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拥护。新时代,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越是面临范围扩大、对象增多、任务繁重的情况,越要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十五五”规划的部署要求,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提高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同时，统战工作本身也是一门艺术，需要广大统战干部具备坚定的立场、民主的作风、广博的知识和真挚的情怀，在工作中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不怯于攻坚，不惮于开拓；不悖于正道，不桎于常形，真正赢得党外人士的尊重和认同，从而将党的领导建立在更广泛的共识和更牢固的情感基础之上。

（二）坚持凝心聚力，画出最大同心圆

统一战线的本质是解决人心和力量的问题，而凝聚共识则是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共识，就没有真正的团结；共识越广泛，团结就越牢固。党的百年统战实践反复证明，越是能够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就越能够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力量源于共识，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的问题。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政治圆心越牢固，团结奋斗的基础就越坚实；扩大共识的范围越广泛，形成的同心圆的半径就越大。“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发扬‘团结一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3]25} 历史经验表明，不同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其凝聚共识的具体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凝聚共识的内在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即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将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整合到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之下。如果说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更强调“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思想统一、立场一致、行动同步，那么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则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更注重“一起来想、一起来干”的民主协商与行动自觉。这一转变深刻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变化，平等协商、民主参与、广泛合作已然成为凝聚共识更为有效的途径。这一转变也体现了党对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团结不是表面的整齐划一，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内在统一。在实际工作中，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协商民主平台，在协商中增进共识、在共识中凝聚力量，最终汇聚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三）坚持求同存异，提升治理效能

“求同存异”是统一战线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原则，是党在处理复杂政治关系和多元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智慧。百年统战实践反复证明，越是能够善于运用“求同存异”的方法，就越能够在复杂局面中找到出路、在多元诉求中形成合力。西安事变中“联蒋抗日”的战略决策，是“求同存异”政治智慧的经典实践，展现了在民族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搁置内部矛盾的政治远见。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着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带来的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以及需要不断协调的多元利益关系。社会越是多元化，利益诉求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求同存异”的方法论来整合分歧、凝聚共识。这就要求我们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做到“同”有方向、“异”有空间。具体而言，对于涉及道路、制度、旗帜、方向等根本性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这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对于社会各阶层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包容的态度予以尊重、引导和整合。要把握好“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以“同”引领“异”，使各种“异”的诉求在共同奋斗目标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表达和有序参与；以“异”丰富“同”，使共同的政治基础在不断吸纳各种合理诉求的过程中更加坚实、更加深入人心。当前，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重点在于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系统处理好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五大基本关系，不断扩大团结面，有效化解消极因素，建立更加和谐的统一战线，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展现统一战线在推进国家治理中的显著优势。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统一战线始终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从革命年代的“三大法宝”之一，到新时代的“强大法宝”，统一战线的地位不断凸显、作用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

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形成,不仅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科学与生命力,更在新时代语境下展现出强大的实践伟力。新征程上,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必将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系统的战略谋划和科学的实践指引,为我们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力量。

[13]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14]赵洲洋.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命题的理论与实践内涵[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5):86-101.

责任编辑:刘菊香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43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2.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2.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4-09-28(2).

[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06-03(1).

[9]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65.

[10]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327.

[11]王清艳.坚持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22(4):39-43.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54.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下沉—整合—协同”体系的初步探索

——基于四川省基层统战工作的案例研究

何 画¹, 王江燕²

(1.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2.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使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向基层延伸,基层统战工作重要性不断凸显,呈现出统战工作环境与对象深刻变迁,统战工作领域与内容持续拓展,统战工作方式与机制不断创新等态势。新时代各地积极探索和配置资源,基层统战工作形成了“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深入剖析资源下沉式、资源整合式与资源协同式三种基层统战工作的运作逻辑,有助于揭示基层统战工作的治理机理,推动该体系向科学化、制度化方向发展。要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横向组织与纵向层级”“思想引领与利益保障”“传统规律与创新变革”四对核心关系,不断完善“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

关键词:基层统战工作;基本态势;资源配置;工作体系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09

[中图分类号]D613;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70-10

一、引言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统一战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的重要任务。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用,不仅需要不同部门、单位和社会力量的横向整合,也需要各个层级工作力量的上下连贯,这必然要求加强基层统战工作。同时,“解决高度复杂性的社会治理难题,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论述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准确把握完善大统战工作

格局现实逻辑的基本出发点”^[2]。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构成要素、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不断涌现,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基层日益成为各类社会群体的集聚点、社会利益的联结点、社会矛盾的交汇点和风险隐患的集中源头,基层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党建引领不断与时俱进。为构建覆盖广泛的大统战工作格局,画出统一战线凝心聚力最大同心圆,需进一步拓宽统战工作视野、扩大统战工作力量,推动统战工作力量下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提出,将“重视加强基层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地方党委承担统战工作主体责任

收稿日期:2025-12-25

作者简介:何画,女,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基层统战工作;王江燕,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与政策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政党制度及人民政协理论。

的重要内容。基层是构建纵横衔接、上下一体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环节,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基础,其统战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由此,如何开展好基层统战工作,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的研究侧重点,并构成统一战线工作创新发展的关键实践导向。

关于理论研究内容,目前学界多以某一具体的论域为切入点,大致可分为结构、机制、效能三个视角。一是基层统战研究的结构视角。该视角聚焦于基层统战工作构成要素的系统安排与相互关系,是研究的基础层面。现有研究主要从主体构成^[3]、对象网络^[4]与运行模式^[5]三方面展开,研究多集中于高校、网络统战、新的社会阶层等不同领域的静态描述,对要素间互动关系与动态合作的揭示不足。二是基层统战研究的机制视角。该视角集中于组织化和社会化机制^[6]、数字化赋能机制^[7]、政策执行机制^[8]研究,关注结构要素如何被激活并相互作用,以产生特定的过程与结果,这是当前研究最具活力的领域。然而,该视角研究对各类机制如何具体运作、何以生效缺乏深度的过程分析与比较。三是基层统战研究的效能视角。现有研究主要从政治整合^[9]、社会治理^[10]与经济发展^[11]三个层面论述其效能。研究普遍肯定基层统战工作能够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乡村振兴,但论证多偏重规范性阐释与个案描述,缺乏严谨的因果机制论证与效果评估。总的来看,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但同时也存在研究短板。一方面,多数研究仍倾向于聚焦局部实践或特定层面的分析,缺乏对整体性、系统化工作框架的深入构建,导致难以从宏观上把握基层统战工作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机制,从而制约了对其整体机理形成的全面理解。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工作成效高度依赖于对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源的动员、吸纳、分配和利用能力,基层统战工作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配置模式是其活力彰显的核心因素,但此关键维度在既有研究中未获充分审视。

关于工作实践经验,我国已形成资源“下沉—

整合—协同”工作体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及“访惠聚”驻村工作,通过制度化的人力资源、财政资源、政策资源的持续下沉,为基层注入强大的组织动能,并深化了情感纽带,具有典型的资源下沉特征。北京市朝阳区的“大V会客厅”平台,由区委政府牵头搭线,整合网络人士资源,引导大V群体在各自领域发挥自身优势,为社会治理积极献计出力;黑龙江省大庆市成立“庆知驿站”,凝聚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力量,打造成集思想引领、实践创新、服务社会、履职调研等功能为一体的平台阵地。上述实践均有明显的资源整合特征。广东省多地开展的“企业家日”活动,通过建立高层级、制度化的政企对话协商平台,整合政府的政策资源、服务资源与企业的产业资源、创新资源、市场资源,并以规则化互动实现双向赋能;湖北省武汉市成立“同心”律师服务团、“同心”注册会计师服务团等,将体制外的高端专业智力资源,与政府的产业政策资源、企业的发展需求资源进行深度协同,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此二者亦体现为资源协同的典型路径。分析可知,基础薄弱的地区常以“资源下沉”为主导进行赋能,资源分散的地区侧重“资源整合”以实现聚力,需要复杂攻坚的场景则聚焦“资源协同”以推动价值共创。实践中,基层统战工作更多表现为“下沉+整合”的输血与造血并重、“整合+协同”的聚力共创进阶。

四川省属于经济大省,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四川统战资源丰富,其集人口规模大、多民族聚居、重大国家战略叠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省、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于一体,可视为统战工作的一个样本。在此背景下,四川探索形成的统战工作体系,必然需要回应多元、复杂的治理需求,因而具有“治理复杂性”的特点。为应对多元基层治理挑战,四川统战工作实践覆盖了资源“下沉—整合—协同”全谱系,并积累了动态联系的丰富案例集群,具有“实践完备性”的特征;四川基层统战工作的活力,既得益于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和鼓励探索,也

源于各县(市、区)强烈的“争先”意识和创新实践,其实践逻辑清晰,易于从中概括提炼出具有推广价值的理论框架,具有“理论可提炼性”。

为进一步拓展基层统战工作研究视野,并探索基层统战工作路径,本文以基层统战工作的运行态势为现实起点,选取四川省基层统战工作实践作为样本,从资源配置视角揭示基层统战工作资源下沉式、整合式与协同式的运作逻辑,进而对“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进行深入剖析,以深化对基层统战工作体系的研究。

二、基层统战工作的基本态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统战工作面临的环境与对象发生深刻变迁,工作内容与领域持续拓展,工作方式与机制不断创新。基层统战工作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手段。

(一)工作环境与对象深刻变迁

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12]。建构大统战工作格局,统战工作重心需向基层延伸,同时需搭建起“纵横交错”的组织网络,打通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最后一公里”。此外,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新职业、新行业不断涌现,产生了一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联系紧密的新职业群体。例如,下乡创业兴业的城市居民、返乡在乡居住的党外知识分子等,他们在资本、知识、社会资源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是基层治理多元格局中的新兴力量,具有特殊的统战工作价值。传统统战工作以中上层人士为工作重点,但难以应对工作对象的深刻变迁。基层统战工作能够聚焦社区、园区、楼宇等广阔领域的新群体,做好团结工作,画出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

(二)工作内容与领域持续拓展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工作领域更加宽广、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工作范围不断拓展,呈现出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13]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

机遇挑战、任务要求,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其内在结构与外部环境均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具体而言,其社会基础已从传统界别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延伸,工作领域从相对固定的政治领域向全域社会治理拓展,工作内容从联谊交友、政治协商向价值引领、利益协调、社会服务等多重功能深化,工作范围亦随社会结构变迁而持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基层统战工作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实践载体与末端延伸,不仅关注政治领域的团结引领,更融入了经济建设、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并在贴近社会现实、直面群众需求的场域中不断丰富工作内涵、拓展工作内容,如优化营商环境、参与乡村振兴、助力科技创新等,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凝聚了广泛力量。可以说,基层统战工作是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

(三)工作方式与机制不断创新

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担负的历史任务有所不同,其团结联合的范围对象有所变化,因而采取的策略方式自然有所区别。传统统战工作,主要针对“上层人士”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以“面对面”联谊交友、教育引导的方式开展,并将团结范围扩大至各自领域乃至其他领域的更多力量,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云南迪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的统战工作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14],对西藏上层人士开展的统战工作促进了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5]。然而,新时代新征程,随着社会日益扁平化、网络化,网络意见领袖等具有高社会关注度的新兴群体不断涌现,传统“以点带面”的工作模式效能逐渐衰减。这就要求统战工作进一步下沉,创新工作方式与机制,形成“面对面”与“键对键”互补、线上线下融合的工作模式,并将分散的“点”(个体)通过“线”(社会组织、统战团体、网络社群等)加以有机串联,推动统战工作全面覆盖。基层统战工作则是激活基层各组织功能,联通统战成员,形成“点一线一面”立体化工作网络的有效实践。

三、基层统战工作“下沉—整合—协同”体系构建的案例分析

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小组座谈、深度访谈等方式,跟踪研究了四川省30余个基层统战工作案例。为呈现不同资源配置的差异,本文选择以“资源下沉”为主导的武胜县、“资源整合”为主导的资中县及以“资源协同”为主导的雅安市为案例进行剖析。三地分别反映出“下沉—整合—协同”体系中的一个主导面向,三者组合起来则能呈现出该体系完整的理论和实践谱系。

(一)资源下沉式:广安市武胜县打通与民主党派省委合作共建渠道

广安市武胜县位于成渝经济区成遂渝和渝广达两个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是农业农村大县,具有悠久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历史。2014年,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四川省委、广安市委统战部与中共武胜县委签订了《关于共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基地的协议》,在武胜建立四川统一战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教育基地。该基地以一个党派对口帮扶一个乡镇的方式,以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工作保障机制和沟通协调机制为抓手,充分发挥了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联系广泛的渠道优势和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推动各民主党派精准对接重点乡镇、关键点位、优势领域、专项改革等方面的发展需求。在各民主党派省委的帮助支持下,武胜县汇聚全省统一战线力量与多党合作资源,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个,先后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四川省旅游强县。2024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92.1亿元,从贫困县跃升省县域经济第三梯队。这一统战资源下沉的模式,不仅推动了武胜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充分彰显了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有力提升了统一战线在全局工作中的贡献率。具体来看,武胜县采取的措施如下。

建立健全“三大机制”。一是健全组织领导机制。由县委主要领导牵头,通过制度化会议部署推进。二是健全工作保障机制,确保财政经费与人员编制到位。三是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建立“1213”对接联络机制^①,以清单制的方式主动对接争取上级资源。

精准做好“四个对接”。一是精准对接重点乡镇。各党派结合自身优势,分别定点联系一个重点乡镇,形成“一党派一乡镇”的工作格局,实现民主党派与重点乡镇的定向联系。二是精准对接关键点。聚焦当地乡村治理重难点,因村因户施策,协助推动经济发展。三是精准对接优势领域。借助合作共建平台,聚焦乡镇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开展了系列“同心”活动。四是精准对接专项改革。构建专项改革参与机制,组织民主党派通过议政监督深度融入县域改革进程。

深入实施“三大工程”。一是实施“同心·凝聚共识”工程,依托多党合作实践成果打造现场教学点,强化党外人士思想引领。二是实施“同心·人才培养”工程,以基地实践资源赋能党外干部培养,实现地方发展与党派建设的双向促进。三是实施“同心·助推发展”工程,推动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该工程推动民主党派帮扶重心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转型,通过建设示范载体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武胜县统战工作的实践创新,集中体现了在省级统战工作体系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下,多党合作制度与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该模式以“民主党派与地方合作共建”为制度载体,紧扣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系统整合各民主党派省委在政治资源、专业人才与项目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实现资源的结构化下沉与精准化配置,有力赋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民主党派要有效回应基层治理对智力支持、科技服务与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需激发其内在

^①“1213”对接联络机制:即一个省级共建单位由两名县级领导、一个县级部门、三名联络员进行对接联络。两名县级领导主要是县委、县政府一名分管领导、县人大和县政协一名联系领导;一个县级部门,主要是根据职能职责情况和共建单位特色优势情况进行确定。三名联络员分别是县级部门、县委统战部和县内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对接联络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工作任务推进情况;与合作共建单位对接联络,通报工作进度,协商下一步工作安排。

的组织革新动力,加速优化内部人才结构、完善资源调配流程、强化服务能力建设,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同时,实现自身组织韧性、资源整合效能的全面提升。同时,民主党派成员通过制度化参与基层治理实践,在直面社会现实、回应公共需求的过程中,不仅丰富了他们观察社会、理解国情的实践经验,更使他们在知行合一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认同,进而全面提升其政治判断力、制度认同感与协商履职能力,形成了个体成长与组织完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综上,武胜县的经验揭示了资源下沉式的基层统战工作模式,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将政治资源转化为基层发展动能的重要机制,促进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同演进,凸显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效能与制度优势。

(二)资源整合式:内江市资中县整合资源搭建全要素平台“同心楼”

内江市资中县作为四川省首批27个扩权强县之一,县辖22个镇,空间分布呈离散化特征。在统战工作方面,与武胜县不同的是,资中县自身统战资源禀赋丰富,其组织生态涵盖民盟、民建、农工党、九三学社4个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并汇聚县工商联、县侨联、县台联等十余个统战团体,形成了多元主体的组织网络,但存在结构分散、整合难度较大的现实困境。为应对资源碎片化挑战,资中县发挥县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的核心作用,整合统战各领域工作小组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力量,制定《资中县“同心楼”建设实施方案》,将“资州古城”核心区一栋五层1000余平方米的仿古大楼用于建设实践创新基地——“同心楼”,并结合实际,确定“同心楼”建设重点围绕“四强六有”展开,即“政治向心力强、统战凝聚力强、创新引领力强、社会影响力强”,“有组织机构、有规章制度、有工作阵地、有活动开展、有特色品牌、有示范作用”。“同心楼”配套建设“同心大讲堂”“同心沙龙”“同心会议室”等功能区。“同心楼”建成后,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和统战团体集中办公、开展活动、联谊交友提供了场地支持。此外,资中县还在大楼周边3000余平方米的城北水系景观区域实施

“同心楼”二期建设工程,通过建设“一楼一廊一林一江一广场”的“统战大观园”,构建了凝聚统战资源全要素集聚平台。“同心楼”作为基层统战工作的实践创新载体与制度化资源整合平台,通过规范化组织机制、常态化活动开展,稳定了资源保障,系统性地整合了县域统战力量,实现了从物理空间聚合到治理功能升华的深刻转变。

在运作机制上,资中县依托该平台实现了多重制度创新。一是组织机制结构化。通过派驻专职统战工作指导员、设立“固定活动日”等方式,建立了系统化工作框架。二是活动开展功能化。围绕“船城新动力·助资新发展”“保护母亲河·同心沱江行”等重点开展主题活动,将思想引领、情感联谊与服务发展有机结合。三是参与渠道多元化。“同心楼”的建立,拓展了统战成员在事业发展、社会联谊、生活服务与参政议政等方面的多维实践空间。

在实践效能上,“同心楼”模式取得显著的多维治理效应。一是凝聚效应凸显。平台促进了统战资源的系统性重组与结构性优化,并构建起事业成长圈、社会资本圈、服务支持圈与协商议事圈“四圈联动”的生态体系。二是示范效应明显。该平台被确立为全县统战工作创新实践的“制度蓝本”,形成了“抓点示范、分类推进、以点带面”的工作路径。三是品牌效应扩散。该平台已逐步发展为县域统战的标识性载体,在获得跨区域认可的同时激励全县统一战线更主动地融入中心工作,从而提升全局发展贡献度。

“同心楼”的实践不仅体现了资源整合式统战模式的有效性,更通过制度化、功能化与品牌化的系统运作,探索出基层统战工作从“物理集聚”到“化学融合”、从“平台搭建”到“效能输出”转型的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为更好整合资源,发挥统一战线作用,资中县以“同心楼”为原型推进实践创新基地的网络化扩展,整合四川统一战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石榴籽同心联络站、“爱国爱教爱家乡”教育基地等资源,组建基层统战实践系统,从而形成统战工作全域覆盖的“一张网”格局。该模式通过构建制度化的资源整合平台,实现了县域内分散

化、碎片化统战资源的识别、动员与重组,进而推动资源配置方式从粗放式叠加向精准化适配的结构性转变。这一过程不仅显著提升了统战资源的整体利用效能,更为统一战线成员参与基层治理、实现自我价值创造了更为丰富的实践机会。此外,该模式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推动了统战成员在价值认知、业务实践与情感认同三个维度的有机整合,促进了统战成员在价值理念上形成共识、在实践行动上实现协同、在情感归属上建立联结。这一过程有效激发了统战力量内部的“催化效应”,促使原本离散的个体资源在互动中产生化学反应,实现显著的协同增强。这种根本性转变,最终推动基层统战工作完成了从局部性、碎片化的试点探索到全域性、体系化的治理效能的结构性跃迁。

(三)资源协同式:雅安市促进辖区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力量联动

雅安市为四川省地级市,市辖2个市辖区、6个县。据不完全统计,雅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3.2万人,占全市人口(143.46万人)的2.23%。与常住人口持续下降的情况不同,其数量却呈现波动式上升态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具备专业化的知识结构、技能优势与社会影响力。系统化开展针对该群体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①。雅安市正确把握统战规律,为整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力量,围绕基层治理现代化目标,构建了市、县两级资源协同与联动机制,推动形成全域统筹、层级联动、功能集成的工作格局。

一是建设协同组织。构建制度化的协同组织体系,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具体举措包括:系统推进市、县两级新联会组织建设,实现县级全覆盖,并以独立建制(而非分会形式)运行,以此强化基层组织的自主性与行动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广泛吸纳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入新联会,建

立与人大、政协的制度化联系渠道。该机制既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围绕地方发展建言献策,亦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入基层、提升议政实效提供支持,形成双向赋能的协同格局。

二是建立协同机制。构建系统化协同机制,以提升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效能。具体包括:建立由统战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完善领导干部列名联系代表人士制度,强化跨部门信息互通与协作;同步制定涵盖会议、调研、人才培养与日常管理的实施细则,构建“1+8+N”内部制度体系^①,实现组织运行与资源协同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整合资源禀赋。围绕国家战略部署,以主题教育与社会服务双轮驱动,有效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专业优势参与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例如,创新联农带农机制,形成“村企联营”利益联结方式,构建股金、租金与薪金相结合的复合分配结构;同时,深度整合地方非遗资源,依托30项省级非遗项目及52处传承场所设立统战联络点,以6项民俗活动为载体建立“非实体”工作平台,强化文化与统战跨领域合作,发挥基层统战协同优势。

雅安市立足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要求,深刻把握其功能定位与使命担当,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纳入地方治理体系全链条,推动组织、机制、主体、领域的协同合作,体现了对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统战工作战略价值的精准认知与前瞻性谋划。目前,雅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被评为市级4A级社会组织。该组织通过构建市、县两级协同联动机制,凝聚了人才、资金、项目等资源。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运用其专业知识参与社会治理、贡献智慧力量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国家发展战略与制度优势的认知。该模式显著提升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自我效能感与社会融入度,促进了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公共价值创造的有效融合,实现了政治目标与个体价值的有机

①1个章程:雅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章程;8项基本制度:党建制度、民主选举制度、会员大会制度、理事会制度、秘书处工作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重大事项备案报告制度、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制度;N项特色制度:联谊交友制度、学习教育制度、建言献策制度、会员管理评价办法、秘书处工作经费补助办法等。

统一。在知行互构的实践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秩序由外在认知到内在认同的深刻转变,促进了政治资源向社会资本与经济动能的转化。

四、基层统战工作“下沉—整合—协同”体系的治理机理

“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不仅是对基层统战工作实践经验的深刻提炼,也蕴含着清晰的治理逻辑与理论内涵。

(一)理论逻辑:螺旋上升的治理闭环

“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是一个逻辑严密、动态循环的治理系统,其核心在于通过资源的定向流动与再组织,重塑治理结构,激发治理效能。该体系始于“下沉”,即治理重心的下移与资源的战略性前移,其理论实质是国家能力与意志在基层的“在场”与“赋能”。通过政策、资源的制度化输送,提升基层治理的资源禀赋,为后续的精细治理奠定基础。地方资源(包括下沉资源)往往面临“碎片化”风险,因而需要整合。“整合”的核心逻辑是将离散的、隶属于不同系统(党政部门、统战组织、社会力量、市场机构)的资源,通过物理或虚拟平台搭建、制度化机制构建或价值共识凝聚进行有机连接。其目标是形成“1+1>2”的聚合效应,推动资源从“分散的资源点”转向“联通的资源网络”。“协同”是体系效能释放的关键环节。它超越了“整合”的物理联结,迈向基于共同目标、规则与信任的集体行动。在此阶段,各主体在资源网络中发挥比较优势,进行深度互动、分工协作与价值共创。其产出不仅是任务的完成,更是社会资本的积累、共识的深化以及新的治理规则的生成。协同的成果又会反馈至系统,为新一轮、更精准的“下沉”提供信息与方向,形成“下沉(赋能)→整合(聚能)→协同(释能)→反馈优化”的螺旋式上升循环。

(二)运作机制:一个系统化的动态过程

“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不是一个机械的固定流程,而是基于情境诊断、动态适配的“治理工具箱”。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核心任务,可对三种模式进行灵活选择和组合运用。其

中,资源下沉模式适用于“资源匮乏、能力薄弱”的地区。通过政策倾斜、财政转移、干部派驻等方式进行外部赋能,旨在解决资源“匮乏”问题,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资源整合模式适用于“资源分散、未成合力”的地区。通过搭建实体或虚拟平台、建立组织网络等方式进行内部聚拢,旨在解决资源“散乱”问题,将潜在资源转化为可用资本。资源协同模式适用于“资源具备、需共克难题”的地区。通过构建议事规则、创建合作项目、设立激励机制等方式促成多元共创,旨在解决资源“效能”问题,实现“1+1>2”的价值增值。三种资源配置模式在理论概念上可分离,但在实践中常交织渗透、互为支撑。实际上,“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的运行遵循一套系统化的动态过程,具体包括情境诊断、策略选择、组合执行与效能反馈四个关键环节。该过程始于对地区实际治理情况的系统性评估,且在此基础上动态适配并组合运用三种资源配置模式;依据所选策略,相应地引导资源流动方向,并调适党政部门、统战对象及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模式;最终,通过对执行过程与产出成果的效能进行评估,形成反馈回路,进而优化调整后续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组合,实现工作体系的持续改进与适应性演进。

(三)理论互构:与现有治理理论的互动创新

“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与当代主流治理理论深度契合,并在中国语境下实现了理论具体化与实践创新。

一是丰富了协同治理理论。协同治理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及公众等)在共同目标驱动下,围绕公共事务,通过制度化协商与持续互动,形成集体决策并实现资源整合与风险共担的动态治理过程^[17]。该体系为协同治理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下沉”为协同初期打牢了资源基础,“整合”完善了协同所需的组织基础,“协同”本身则是协同治理理念的过程体现。

二是具化了网络治理理论。网络治理是对治理合作网络的管理,是继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后出现的新型治理模式^[18]。该体系聚焦治理网络的构建与管理重心,“下沉—整合”是网络构建的基础,体

现了“自上而下”的赋能。体系中的“协同”环节则充分展现了多方活力,特别突出了党政部门在构建网络方面的能动性。

三是回应了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是基于权力依赖关系的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是受外部环境资源制约,并对外部环境进行管理的行动集合^[19]。“下沉—整合—协同”体系揭示各类主体在治理资源上的相互依赖性,并通过“整合”与“协同”机制,将这种依赖关系从潜在的博弈转化为制度化的合作。尤为关键的是,通过“下沉”环节,主动为系统注入关键资源,优化了基层的资源禀赋,调整了依赖结构,从而塑造了更为均衡、可持续的合作关系。

五、完善基层统战工作“下沉—整合—协同”体系的思考

基层统战工作是系统性工程,“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具有韧性的治理体系,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运用与完善。重点在于,不论采取何种工作模式,均需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横向组织与纵向层级”“思想引领与利益保障”“传统规律与创新变革”四对核心关系,通过制度创新、组织重构、动力重塑和技术赋能,将上述关系中的潜在张力转化为发展动力。

(一)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精准联动

统一战线工作需向基层延伸。不论是资源下沉式、资源整合式或是资源协同式,均体现出基层统战工作在上级规定范围内的积极探索是具有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能够为其他地区提供实践经验。这就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联动机制提出了要求。顶层设计需避免“事无巨细”的指令性规划,转而提供框架性、导向性的政策指引。例如,制定“负面清单”与“鼓励清单”,明确不可逾越的底线与鼓励探索的空间,为基层创新预设“制度弹性”。同时,基层统战部门需大胆实践,不断创新,从基层摸索中积累经验,建立基层统战工作开展、评估与反馈机制,形成“实践样本”。这些样本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反馈至上级,为上级党委的顶层设计提供实证依据,助力政策体系的自我优化与迭代升级。总的来看,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实现精准联动,能够将基层探索纳入可控的

轨道,又能使顶层设计在实践中获得修正和完善,形成“自上而下”的指导与“自下而上”的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横向组织与纵向层级协同耦合

习近平强调:“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20]基层统战工作是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基层执行路径,开展好基层统战工作,还需处理好横向组织与纵向层级之间的关系,打造“矩阵式”的协同治理格局。横向上可建立制度化的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合行动机制,打破统战系统内部及与其他党政部门间的组织壁垒。例如,雅安市建立的《雅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市委宣传部、民政局等30余家市级部门单位的协同合作,促进了资源在横向网络上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在纵向上需明确市、县、乡、村四级在统战工作中的权责清单与事权划分。其中,市级侧重统筹与资源下沉,县级侧重整合与枢纽联动,乡镇、街道、村、社区侧重协同与精准落地,由此形成纵向职责清晰、指挥高效的传导链条。广安市武胜县正是通过整合联动各民主党派省委资源,实现了跨层级协作。因此,处理好横向组织与纵向层级协同关系,能够实现资源在各组织间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利用。

(三)思想引领与利益保障共同驱动

习近平指出:“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21]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体现在基层统战工作中,重点要把握好思想引领与利益保障的关系。通过将宏大的价值理念转化为与统战成员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叙事和实践场景,使统战成员在贡献中获得价值感、获得感,从而增进政治认同。在此过程中,统战部门需通过构建公平透明的利益表达、协调与保障机制来实现目标。例如,建立“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的精准对接平台,切实解决统战成员在事业发展、权益维护等方面的现实困难。当统战成员的利益诉求得到合理满足时,会进一步强化其政治认同;反之,

深刻的政治认同也会使其超越短期利益,追求更长远、更根本的共同利益,从而形成精神与物质相互强化的双循环驱动。因此,在基层统战工作中,应将思想引领与利益保障相结合,共同驱动动力机制由“要我团结”转变为“我要团结”。

(四)传统规律与创新变革双轨并行

统战工作“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团结联系,坚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待之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助之以实,真正赢得党外人士尊重和认同,为党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12]。这意味着开展基层统战工作需正确把握统战工作的基本规律,深刻认识到联谊交友、协商民主等传统工作方式的内在价值,继续发挥“面对面”交流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基层统战工作也需适应数字时代,进行数字化变革,创新工作方法与工具。例如,可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将线下深厚的信任关系延伸到线上社群进行维护和深化,利用数据分析为线下精准联谊、个性化服务提供支撑,形成线上线下交融互促的统战工作新形态。把握传统规律与创新变革双轨并行的发展模式,有助于紧跟时代变化,拓展工作半径,提升工作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结语

“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基层治理实践中,依托丰富的地方性经验,通过不断把握区域差异性与发展阶段特征,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高度适配性的资源调配与组织动员模式。其本质是党的统一战线价值理念与地方性经验在基层场域中深度融合,也是党的群众路线与治理智慧在新时代统战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与制度性呈现。“下沉—整合—协同”工作体系的构建,为基层统战工作提供了系统化的实践框架与可操作的机制路径。该体系通过资源的有序下沉、优化整合与有效协同,实现了统战工作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治理的模式转型。在理论层面,该体系不仅深化了对统一战线内在运行规律的认识,也为阐释其法宝作用的发生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在实践层面,通过激活基层治理资源、提升多元主体

参与效能,有力推动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条例》从制度层面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基层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目前,基层统战工作在整体制度框架中仍属较新的实践领域,其在有限的发展周期内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各地立足自身禀赋与问题导向的差异化探索,以机制化路径将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切实的治理实效,在凝聚社会共识、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法宝”作用。这一过程不仅夯实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亦在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中,承担了基层责任。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因素明显增多的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着力构建思想引领与实践转化之间的双向互动与良性循环机制,增强统一战线的政治凝聚力与社会整合效能。基层统战工作作为思想引领与实践转化相统一的关键实践场域,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未来,应依托基层统战工作,紧扣时代脉搏,坚持守正创新,在基层社会构建起更具包容性、韧性和活力的“治理共同体”,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能。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1).
- [2]王彩玲.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要求[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5):40-52.
- [3]杜孝珍,代栋栋.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背景下增强统战意识的研究[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2):71-80.
- [4]张师平.新时代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实践考察与路径探索:以南昌市西湖区为例[J].回族研究,2021,31(2):100-104.
- [5]张志雄.党建+统战:基层统战工作的路径选择

- [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4):56-59.
- [6]齐春雷.基层统战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探析[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25(3):33-38.
- [7]孟安琪,崔晓敏.论大数据时代基层数字统战工作的构建[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26(4):31-37.
- [8]杜绮红.构建跨行政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基层实践:以肇庆“粤桂一家亲·省际睦邻廊道”建设为例[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4):131-135.
- [9]肖楠楠.耦合共生:统一战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与实现路径[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1):4-13.
- [10]张先花.统战工作融入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体系问题探赜[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2):23-33.
- [11]李彦儒,尹德志.基层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研究[J].现代农业研究,2021,27(6):76-78.
- [12]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J].求是,2024(2):4-7.
- [13]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191.
- [14]李志农,周丽梅.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以对云南迪庆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例[J].思想战线,2023,49(1):96-104.
- [15]李荟芹.和平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上层统战工作探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51-58.
- [16]孙信,姜立,马东升.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64-87.
- [17]白一然.基层政府协同治理的情境、机制与绩效改进研究[D].兰州大学,2025:60.
- [18]闫函.城市社区网络治理的结构与功能研究[D].吉林大学,2024:54.
- [19]柳芳红.资源依赖情境下企业知识创造及其实现机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20:61.
- [20]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人民日报,2022-07-31(1).
-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96-297.

责任编辑:祝远娟

·政党制度研究·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初探

梁晓宇, 吴有海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成都 610071)

摘 要: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是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迫切需要,其基本依据正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现实折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从发展、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土壤中汲取经验,以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的理论跃升为目的。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涵盖理论准备、实践基础与国内外现实因素三个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基本架构分为四个层次,即元理论奠基本体、价值与方法,基本理论阐明性质、地位、作用、任务与功能,应用型理论聚焦实践效能、运行机制与主体履职,发展型理论贯通制度演进、理论建构与话语创新。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基本依据;前提条件;基本架构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10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80-09

从我国长期的多党合作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亦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现代表达。在西方政党政治陷入治理困境、国家治理现代化亟须理论支撑的背景下,构建系统完备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成为历史必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既植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实践积淀,又回应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参政党建设等现实命题,其关键在于突破了西方竞争性政党理论框架,彰显了合作型政党政治的独特优

势。应进一步阐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内在机理与时代价值,为更好地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学理支撑。本文立足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从构建依据、重要前提与四级架构展开探析。

一、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依据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其基本依据正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现实折射。这一体系

收稿日期:2026-01-27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3BKS046)。

作者简介:梁晓宇,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湖南研究基地研究员,四川省党的建设研究智库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新型政党制度;吴有海,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2024级党的建设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与新型政党制度。

从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中汲取经验,以推动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为目的。

(一)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必备要素

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需要量的不断积累,使之具备质变要件;另一方面需要科学理论对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践问题进行回应,保证发展方向不偏离正确轨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植根于中国土壤,立足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历久弥新,呈现出理论发展与制度演进并驾齐驱的良好局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革命统一战线的联合到抗战时期“三三制”政权的实践,再到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商成立新中国,这一历程以阶级联盟为核心,形成了政党合作推动革命胜利的政治共识,为制度创立奠定了基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首次从理论高度界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将多党合作从策略层面上升为国家政治准则,初步勾勒出党的领导与政治协商相统一的制度雏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多党合作定位为“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1],推动其纳入国家制度范畴;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颁布,系统构建了制度性质、原则与功能框架。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凸显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的文化根脉与理论特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现了理论范式的历史性突破。2018年3月,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实现了我国

政党制度从“中国特色”到“新型”的理论升华,深刻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两个大局”,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已成为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必备要素。国际层面,西方政党制度陷入“民主倒退”与“治理失效”的双重困境,呼唤替代性理论话语;国内层面,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提升制度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构建通过整合多元理论范式,提炼标识性概念集群,搭建起以历史、理论、实践逻辑为主轴的框架体系,扩大国际话语权,推动制度发展从“实践自觉”向“理论自强”跃升,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既扎根中国土壤,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智慧。

(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指引

制度的完善离不开理论的指引。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始终以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为动能。目前,这一制度在团结社会力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然而,面对诸如数字化时代协商效能提升、社会结构变迁中增强参政党代表性、国际话语权构建等现实议题,这一制度的发展仍存在滞后性问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3]问题不是阻碍发展的对立面,制度的滞后恰是理论自觉的前夜。正是在正视问题的过程中,理论获得了介入现实、重塑制度的锋利刃口。

构建系统完备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能够为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这一指引,绝非简单的事后注解或逻辑粉饰,而是提供一套具有解释力、批判性与建构性的认知范式。面对制度发展复杂的实践张力,仅凭经验层面的局部调适容易陷入“头痛医头”的碎片化循环。破解这一难题,要求理论创新必须从多党合作实践中提炼出具有共通性的核心概念。构建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意义,恰在于为制度发展与理论抽象提供一种确定性的分析框架,从而能在纷繁的实践表象中提炼出本质规定性——即明确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与协商”“执政与参政”之间内在的辩证关系。唯有在学理上厘清这一制度区别于西方竞争性政党政治的“结构性优势”与“过程性特征”,才能确立制度完善的方向,避免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发生原则偏移。

(三)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不仅是对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学术回应,更是建设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理解二者的关系,可从统一战线的学科化历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统一战线学的内在关联等方面加以把握。

统一战线学的发展是从科学认知到学科建构内在要求演进的结果。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首次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4];1979年3月,李维汉重申这一命题;1985年2月,习仲勋强调“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5];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6]。2015年,山东大学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合作共建统一战线学二级学科、联合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24年,中央党校增设统一战线专业博士点,进一步推进统一战线学科化的进程,标志着统一战线研究从零散的理论认知走向系统化的学科建制。统一战线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学科门类,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学科基础。

统一战线学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学科归属上存在着“属种关系”。统一战线学作为研究政治联盟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其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问题和争取同盟军问题,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统一战线理论在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制度化体现。尽管学术界对于统一战线学学科定位的探讨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应将其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二级学科或政治学的三级学科,也有学者认为应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中共

党史党建学科下。但是学界普遍认为,推进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建设,需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比如,有学者认为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体系化建构,需要重视其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人民政协理论的融通^[7]。有学者则指出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需要在“策略与科学”“体系与功能”“学科与平台”三个层面的关系中寻求协调发展^[8]。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恰是联结这些层面的关键纽带。因此,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构建置于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加以推进,既是理论自觉的要求,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二、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理论准备、实践基础和现实因素等方面来探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框架。

(一)理论准备

任何理论体系的构建,都必须以充分的理论准备为前提。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践场域,实现了原创性突破与系统性建构。具体而言,学术界主要在理论渊源、核心概念和学术积累等三个层面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准备。

1.理论渊源。习近平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并强调其“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9]。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两个理论渊源。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奠定其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民主政党合作的原则——既要努力争取团结,又要保持自身独立性,并保留对同盟者的批评权利;列宁则在俄国革命实践中提出在国家政权中实行社会主义多党

制的构想,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内涵。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提供独特精神基因。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外源性政党理论吸收与本土政治文化实践转化的有机统一^[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和合共生、休戚与共、多元一体、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等价值精髓,形塑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精神基因,构成了影响其运行程序与理论形态的内在编码。

2.核心概念。概念是理论体系的基础单元,概念提炼的程度直接影响着理论体系的成熟度。核心概念提炼与研究的深化,也推动体系构建从“经验描述”走向“学理建构”的范式转换。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标识性概念的提出与学理化阐释,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了必要的范畴支撑。也有学者提出,构建理论体系涵盖五大基础理论问题——领导权理论、党际合作关系理论、代表性理论、团结理论、治理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逻辑和实践框架^[10]。

3.学术积累。目前学界已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格局。有学者指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应着眼历史渊源、文化基因、价值功能、特色优势,从历史形成、结构主体、根本性质、显著特征、理论依据、文化底蕴、功能作用、运行机制等方面归纳概括,深刻揭示其蕴含的道理、学理和哲理^[1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报告·2024》指出,当前学界产出了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深化了长期研究议题并不断拓展新的重要议题,尤其是中央统战部牵头在北京、上海、吉林、山东成立四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基地,推动了有组织科研和学术共同体建设。

(二)实践基础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有着丰厚的多党合作实践积淀。长期以来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实践,以及学界愈加深入的实证研究,不断丰富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知识生产与理论供给。

1.制度化历程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实践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是某种先验理论框架的制度移植,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经由实践反复检验与形塑的内生性制度创造。有学者指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必须从了解中国的多党合作史入手,历史了解得多不多、透不透、完整不完整,决定了理论研究能否全面、深入开展^[12]。从1949年多党合作制度正式确立,到1993年多党合作制度载入宪法,再到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及其功能拓展,这一历经“奠定基础、开局起步、不断拓展、日臻完善定型”^[13]多个历史阶段的制度化实践,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积累了大量经验素材。

2.多党合作实践为理论体系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来源。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话语体系是在深刻总结当代中国共产党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汲取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精髓,借鉴世界政党制度的先进理念,通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而形成的理论与话语体系^[14]。进入新时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职能,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建言献策,深入开展民主监督,形成了协同发力的实践格局。新时代多党合作的生动实践,不断为理论体系注入新的经验材料,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丰富与更新。

3.实践创新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内在驱动力。实践既是理论的源泉,也是理论的检验标准和发展动力。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仍面临着若干理论难题,而这些难题的答案需要回归到制度实践的创新与效能提升中寻求实践验证,在理论建构的探索中构成“实践推动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丰厚的实践积累,不仅是构建理论体系的经验前提,更是推动理论创新持续深化的不竭动力。

(三)现实因素

构建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除了理论准备、实践基础外,也建立在特定现实条件和具体时代需求上。构

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层现实规定性为基础,并在与世界政党政治的比较中彰显其鲜明特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规定性,是构建其理论体系的重要出发点。郭定平在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逻辑时指出,理解这一制度的“新型”特质,必须把握三个关键层面,即民主党派的政党属性、党际关系的合作属性、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规定性。

从国内层面来看,所谓“现实规定性”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独特约束条件——超大规模社会的整合需求、赶超型现代化的动员压力、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维系——决定了中国无法简单移植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必须构建一种适应中国实际、能够带来“民主、稳定、秩序和繁荣”的政党合作模式。多党合作与多党竞争是政党政治的两种不同运行方式,它们分别适应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条件。中国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这一约束条件下展现出了无可比拟的适应性和制度效能。从国外层面来看,以欧美为代表的竞争型政党制度曾长期主导政党理论的学术话语。有学者研究指出,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以“分权制衡”“竞争性选举”“政党轮替”等概念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话语遮蔽,构成了理论建构的外部压力^[15]。然而,近年来,柴尚金等学者研究发现,民粹主义与极端政党的崛起加剧了西方政党政治的极化、民粹化与碎片化等异化倾向,多党竞争日益异化为民粹政治、否决政治、身份政治、金钱政治^[16]。全球政党制度演变态势的剧变,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在全球政党制度对话中确立自身的学术坐标与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机遇。

从国际比较的维度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基础在全球政党政治版图中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一是与欧洲共识政治相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维护政治稳定、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具有强有力的制度韧性。从2024“超级选举年”的现实状况来看,在欧洲,共识民主传统深厚的国家近年来正经历共识政治的解体。有学者研究后指出,二战后西欧左右翼政党在自由平等价值、选举竞争程序、社会福利政

策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推动了共识政治的形成,使政党体制具有跨阶级整合的功能。然而,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主流政党整合能力下降、代表性危机显现,激进右翼政党强势崛起,西欧政治正从共识政治加速向对抗政治转向^[17]。二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型政党制度相比较。合作并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有现象,有学者在国内外政党合作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国外政党合作是在政党竞争基本格局中出于策略考虑的选择,旨在实现本党目标和维护本党利益,属于“手段型合作”;中国的多党合作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这一全局而长远的共同目标所进行的合作,属于“目的型合作”^[18]。例如,无论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是多党联合执政传统深厚的荷兰、比利时,尽管以多元竞争和政党合作维持政治活力,但其合作仍受制于选举周期和政党自身利益而出现博弈与妥协。由此可知,真正的合作型政党制度需要超越策略性联合,进入以共同利益和长远目标为根基的制度化合作层面。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呈现出清晰的层次性,可以分为元理论、基本理论、应用型理论和发展型理论。以上四个方面共同支撑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一)元理论

元理论通常被界定为“解释理论前提的理论”“关于理论的理论”“作为学科基础的理论”,它通过对学科理论的“元概念”进行设问、对规范理论的前提进行质疑,对理论研究的本体进行求证,形成支撑学科的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基础^[19]。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而言,其元理论构成主要指向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等核心理论来源。三者相互嵌套、彼此支撑,从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层面回答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可能、何以合理、何以运行的元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

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0]。这一重要论断界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和利益代表性特征,也重塑了现代政党理论的本体论预设——政党不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工具,而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政治组织。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借鉴基础上,构建出了在根本目标、政党间关系、治理绩效以及责任政治和廉洁政治等各方面超越传统西方政党制度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21]。目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构建存在基础性概念及概念体系相对薄弱、理论体系建构路径不够清晰、理论研究停留在循环论证阶段、配套保障缺乏完整性系统性的四大元问题^[22],而破解关键恰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引,回答好“政党为谁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的根本问题。

民主政治理论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价值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精华,并在“两个结合”中实现了本土化发展。民主政治理论的核心原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等,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区别于西方的竞争性政党政治、精英政治和选票民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3]这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所谓民主就是自由竞争性选举的狭隘概念。

统一战线理论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统一战线理论明确了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原则;规定了不同发展阶段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任务;形成了“求同存异”“团结—批评—团结”“政治联盟”“同心圆”等方法论。这些原则与方法深刻揭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里,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对国家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极端重

要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上是统一战线理论在政党关系领域制度化的结晶,是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它解决了制度如何运行并将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有效组织起来,围绕共同目标形成合力的元问题。

(二)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构成了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内在逻辑、价值遵循与实践路径的核心框架,系统回答了制度“是什么”“居于何位”“有何作用”“担负何任务”“如何运行”等基本问题。

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性质论。性质论旨在回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4]。这一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将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有机统一起来;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也不同于西式竞争型的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而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形态。从“两个结合”的视角来看,它实现了对外源性政党理论吸收与本土化政治实践转化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全新政党制度类型。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地位论。地位论着重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定位。从政治地位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法理地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从人类政治文明的高度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具有独特地位,它“坚持世界政党制度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24],既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

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用论。作用论聚焦于揭示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制度效能。

2022年7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5],发挥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通过“三个新就新在”“三个有效避免”^[2],构建了“目的型合作”的政党关系,从而凝聚执政党与参政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强大合力,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成事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任务论。任务论旨在阐明新型政党制度的阶段性目标与长远使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从长远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任务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从当前来看,其阶段性任务集中体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习近平指出:“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26]这一重要论述不仅赋予政党崇高的时代使命,更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任务定位提供了基本遵循。各民主党派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论。功能论在于揭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运行层面的实践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的重要功能,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27]。具体而言,该制度拓宽了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证了不同阶层的利益表达和政治诉求;通过广泛协商达成思想共识、目标认同和行动统一,促进政治团结和有序参与;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强大的社会合力。

(三)应用型理论

应用型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聚焦于制度实践形态、运行逻辑与主体行为的理论层次。它旨在系统阐释这一制度如何在国家治理的复杂现实中落地、生效与完善,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的关键中介。应用型理论通过对“制度如何有效运行”“运行产生何种效果”“关键主体如何作为”三大核心问题的深入剖析,构建起理解该制度动态实践的理论框架,深刻揭示了其“行得通、很管用”的内在机理。

1.实践效能论。实践效能论聚焦于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过程,是对制度运行实效的动态评价。习近平强调:“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28]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示了其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和优越性,但既有的研究多半聚焦于制度的主要特征和比较优势,在理论建构、话语传播和效能提升研究方面则成果有限,因而亟须加强制度效能的理论化研究^[29]。因此,从实践效能的角度出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并非停留于制度文本的静态表述,而应在“中国之治”的实践检验中不断彰显其制度活力。

2.运行机制论。运行机制论着力揭示制度从静态架构向动态运转转化的内在机理与程序安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主要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制度安排,将协商贯彻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保证决策施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有学者对运行机制的逻辑范式进行研究后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逻辑依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自适应地发生了从求用、求真再到求义的历时性转换,形成了共在性的民主集中制逻辑原则和同一性的“领导—合作—协商”逻辑构架^[30]。运行机制论的学理化建构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非依靠政治对抗与党派竞争来运转,而是依靠结构化的协商合作与程序化的民主机制来实现系统的高效运转,这是其区别于西式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深层逻辑所在。

3.民主党派履职论。民主党派履职论聚焦于参政党在制度框架中的能力建设与作用发挥,是应用型理论的主体性维度。“建言献策是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彰显价值的集中体现”^[31],民主党派“有责任和义

务发挥自身的智力、经济、界别等方面优势,履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的职能”^[32]。若没有建言献策,民主党派的作用和价值就难以实现,多党合作的特色和优势也难以彰显,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就难以充分发挥。因此,民主党派履职能力建设应从经验总结走向理论自觉,即参政党不仅要具备高质量建言献策的能力,更要在政治协商中展现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履职能力的现代化推动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效能提升。

(四)发展型理论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33]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制度的合理性与生命力根本上取决于其能否适应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不是对既有政治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推动政治共同体持续前行的能动性力量。其所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发展型理论”范式。

1.制度演进中的发展型理论。有学者从政治发展范式的角度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探索了一种以政党中心主义重构政治发展模式的路径,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责任使命一脉相承^[34]。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经历了从制度生成、制度嵌入到制度效能释放的演进过程,每一阶段的制度变迁都顺应了中国共产党责任使命和工作重心的调整,而其最终指向的目标,正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换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始终以发展为导向,以效能为检验标准。

2.理论建构中的发展型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创新首先需要理论上的自觉建构与学理化阐释。近年来学界形成了高度共识,即必须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指导制度实践的坚实学理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建构进入系统化推进阶段,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研究的理论自觉逐步增强,不断围绕核心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深化研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规范性研究成果丰硕。发展型理论的学理化程度决定着制度未来发展的理论高度,它不是对既有实践的被动总结,而是通过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不断为制度的自我更新提供方向性指引,将制度实践中的经验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理论自觉,以理论创新驱动制度创新。

3.话语建构中的发展型理论。有学者指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国际社会充分理解和认可中国的政党和政党体制,从而全面提升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35]。话语体系既是理论体系的表达形态,也是理论资源向实践效能转化的重要中介。在全球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以中国实践回应时代之问、以中国理论破解发展之惑的能动性努力。它不仅要向世界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更要在政党政治的话语竞争场域中,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政党理论范式提供一种基于发展实践的本土话语方案。由此,话语建构与制度演进、理论建构一道,共同构成了“发展型理论”的完整逻辑闭环。

[参考文献]

- [1]唐铁汉.邓小平现代领导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
- [2]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4.
-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15.
- [5]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仲勋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8.
- [6]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

- 央文献出版社,2019:97.
- [7]宋俭,陈灿.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三重维度[J].学习与实践,2025(5):3-12.
- [8]钱再见.从科学到学科:新时代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J].江苏社会科学,2023(4):45-53.
- [9]臧秀玲,李鹏,贾晓强.道理—学理—哲理: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逻辑进路[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4):72-82.
- [10]束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理论探析[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2):86-99.
- [11]张献生.关于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几个问题[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6):55-65.
- [12]李晓虎.更好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J].群言,2025(4):20-22.
- [13]钟德涛,付瑀.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8(5):28-42.
- [14]王立峰,周强伟.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维探究[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2):58-70.
- [15]臧秀玲,贾晓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4):15-22.
- [16]柴尚金,冯文楷.西方政党政治异化现象的多维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6):15-21.
- [17]高春芽.共识政治与政党体制的代表性建构:“二战”后西欧的政党实践及其经验启示[J].天津社会科学,2025(2):86-94.
- [18]古洪能.国外政党合作与我国多党合作的区别及其理论发现[J].学术界,2024(11):138-148.
- [19]余潇枫.国家安全学的“元理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15(5).
-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 [21]黄龙,孙熙国.论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制度思想[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45(11):20-34.
- [22]许奕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问题与内在机理[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5):117-126.
- [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2.
- [24]梁晓宇.深刻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因[J].黑龙江社会科学,2024(2):8-13.
- [2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240.
- [2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24.
-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8.
- [28]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528.
- [29]郭定平.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与效能提升路径分析[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3):92-106.
- [30]王林兵,雷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范式、秩序形态与功能强化[J].理论导刊,2024(4):19-25.
- [31]张献生.建言献策与合理吸纳的互动: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关键[J].团结,2024(2):44-50.
- [32]梁晓宇,吴有海.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科建设的探讨[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36(1):66-74.
- [3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4.
- [34]郭定平,蒋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路径[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1):5-13.
- [35]张汉.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挑战与应对[J].中国政治学,2024(4):33-60.

责任编辑:刘菊香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从“天下一家”到“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历史进路

唐圣电,秦江明,汪守军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重庆 400064)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于先秦时期形成的“天下一家”理念。历经秦汉时期中原与边疆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民族对中原的高度认同后,中华民族在隋唐时期形成“和同一家”的图景。宋元以降,“天下一家”意识不断增强。在近代反抗外敌侵略的过程中,“天下一家”理念逐渐蜕变重塑,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突破了“华夷秩序”的藩篱,实现了从民族自在到民族自觉的全面觉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迅速增强。

关键词:天下一家;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历史进路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11

[中图分类号]D633;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89-07

1902 年,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很快为时人所接受和使用,对推动中华民族从几千年的自在状态走向自觉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各阶层广泛认同“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空前高涨,实现了全民族的觉醒。这种民族认同意识究竟始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是个值得系统性探讨的问题。此前多位学界大家关注到中国古代“天下一家”的观念,并对此展开论述,如罗志田认

为:“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1]邢义田指出:“对一位欲为‘天下王’的皇帝而言,如何化外服为内服,合天下为一家,是一项永恒的挑战。”^[2]晁福林认为:“‘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3]姚大力以为:“天下中国观既然排除了均衡多国体系观念的生长,历史上分裂时期国家对国家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也就从

收稿日期:2025-12-03

基金项目: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2025-1),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5TZ08)。

作者简介:唐圣电,男,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讲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专家,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民族史;秦江明,男,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多党合作历史研究室高级讲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专家,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汪守军,男,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多党合作历史研究室主任、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专家,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4]李扬帆认为:“天下观念是中国古代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它是天道一天理观念在政治上的体现。”^[5]陈玉屏则指出:“中国古代先民心目中包含‘中国’和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在内的‘天下’具有某些现代国家的属性。‘中国’一词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春秋大一统学说中,‘中国’和‘天下’终究是要合一的。”^[6]李大龙也指出:“综观中国历史,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即古代中国经历了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最终在清代形成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华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很早就存在一个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7]于逢春同样指出:“作为近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其疆域的最终奠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8]此外,赵汀阳指出:“与西方语境中的‘帝国’(empire)概念不同,‘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概念表达的与其说是帝国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关于帝国的理念。概念和理念虽然大体一致,但有一点区别:理念不仅表达了某种东西所以是这种东西的性质(希腊人认为是一种决定性的‘形式’),而且表达了这种东西所可能达到的最好状态。”^[9]这些研究史料翔实、见解独到,但多聚焦于天下“大一统”政治思想和状态的形成,较少深入探讨民族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民族认同意识这一议题。本文拟基于中华民族发展的相关史实就此问题作一初步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天下一家”的萌芽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民族形成的规律:共祖的血族团体结成氏族,氏族结成部落,进而结成部落联盟,融合成民族(Volk);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扩大,新的生产关系出现,新阶级产生,使得氏族制度逐渐不能负荷而消灭,随之产生由新民族(Nation)组成的国家^[10]。可见,民族是原始社会末期继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之后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正是基于这一规律,中国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红山、仰韶、良渚等早期文化的出现,可被视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起点。此后,各族群通过广泛地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中华民族实体^[11],并确立了“天下观”,孕育出“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芽。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与明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西方带来的“天下观”殊异。后者是新航路开辟后,基于“天下有五大洲”的地理科学概念。前者“天下”意为“天之下”,脱胎于“万物有灵”“敬天法祖”的原始宗教。夏商周前,人们大多认为宇宙万物由神灵主宰。进入夏商周后,为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统治者往往强调受命于天。《诗经·殷武》载:“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极”^[12]^[69]。青铜器铭文也有“赫赫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13]的记载。夏商时期,对天上的神鬼崇拜兴盛,《论语·泰伯》就说夏禹“致孝乎鬼神”^[14]。《礼记·表记》也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15]这一时期,人们构建起从天至祖非常庞大的神鬼体系,体系中最高的就是天神。天神“人化”之后即为甲骨文中的“帝”或三代文献中的“昊天上帝”。周对神鬼崇拜有所损益,其一方面继承了夏商的天下思想,另一方面完成了由“尊神”到“事鬼敬神而远之”的转变,确立起“以德配天”的意识形态和“敬天保民”的治国方针,从此更重“天下”之民而非“天上”之神,“天下”观念也随之广为传播。这样的观念在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中随处可见,如《诗经·皇矣》有“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16]^[26],《尚书·大禹谟》有“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16]^[90],《周易·同人》各卦象也有“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17]等语,《庄子》更有专门的《天下篇》。天下的地理四至也逐步清晰:“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18]^[36]天下所涵盖的人群也十分明确,《尔雅·释地》载诸夏与“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19],先秦时期“四海”“九州”为天下的同义异称,可见当时的天下在人群上并不单指中原华夏,而是涵盖了“五方之民”在内的共同体。

同时,夏商周为天下共主。夏建立时,“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20]。商建立后,“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12]168}。殷周鼎革之际,“华夏蛮貊,罔不率俾”^{[16]444}。随着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以及分封制、宗法制与“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18]136}的五服之制的推行,夏商周逐渐确立起了以天子为圆心,以“尊王”为最大半径的统治格局。正是在夏商周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的有机统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在“天下观”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102}的理念,并由此生化出两种思想:一是“定于一”的政治大一统意识;二是“天下一家”的共同体认知。这两种思想互为表里,对中国古代历史影响至深。春秋时期孔子直言:“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入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21]这是关于“天下一家”最早的文献记载。荀子亦云:“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22]这些表述既彰显了先秦时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也透露出中华民族早期“天下一家”认同意识的萌芽。

二、中原对边疆民族的认同

秦汉时期,伴随政治上的大一统,“天下一家”的认同意识在中原勃兴。陈胜率农民起义军攻入陈时,秦二世曾召博士诸儒问策。诸儒认为陈胜为反叛,令秦二世极为不满。于是叔孙通阿谀说:“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18]2720}汉武帝时宫中博士诘问东方朔,为何其境遇不如苏秦、张仪。东方朔答,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今非然也。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贤与不肖,何以异哉”^{[18]3206}?这虽有吹捧汉武帝和自我开脱之意,但也反映出“天下一家”思想在士大夫阶层的深刻影响。这种意识在《史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司

马迁在《史记》中开创性地为边疆民族单独立传,如在《匈奴列传》中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18]2879},《朝鲜列传》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18]2985},《南越列传》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18]2967},《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18]2979},《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18]1739}。司马迁几乎把边疆与中原的民族作为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鲜明地体现出中原人士对边疆少数民族的高度认同。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兵进南越,汉武帝派遣严助发兵调解百越矛盾,并宣称“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印治”^[23]。在这种叙事下,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为大小宗关系,同属“一家”,因而汉朝有义务和权力处理边疆民族之事。此后,在政治上“大一统”和民族意识上“天下一家”思想的双重指引下,汉朝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大一统”的局面。以往研究多聚焦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史实,较少探究背后的思想动因。事实上,夏商周以来延续的“天下”观和“天下一家”意识是汉武帝经营“四夷”的重要驱动力量。

三、边疆民族对中原的认同

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边疆民族对中原的认同不断增强。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迎来了边疆民族对中原的高度认同。

西晋建武元年(304),晋室诸王内斗、局势混乱,早已内附的南匈奴刘宣在离石(今山西吕梁)劝说刘渊起兵反晋。刘渊采纳其意见并宣称:“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24]2649}刘渊认为汉匈和亲后约为兄弟,即为一家人;自己乃汉室外甥,具备兄终弟及的合法性,因而建国号为汉。刘渊此举虽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已鲜明地彰显出此时匈奴作为边疆民族的认同意识的转变。东晋义熙三年(407),赫连勃勃在代(今山西大同)地建立政权时,更是“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24]3202}。此前是司马迁站在中原的角度提出“匈

奴夏后氏之苗裔也”,体现的是“中原”对“边疆”的认同;此时却是赫连勃勃作为匈奴人,主动以“夏后氏之苗裔”自居,体现的是“边疆”对“中原”的认同。这种双向认同极大地推动了匈奴融入中原,并增强了其他边疆民族对中原的认同感,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就顺应历史趋势,于太和二十年(496)下诏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25]4393}孝文帝改革直接奠定了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和同一家”的基础,对中华民族走向一个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民族实体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说春秋时孔子提出的“天下一家”、战国时荀子主张的“四海一家”还只是一种理想的萌芽,到了隋唐时期,这一理念就已成为一种社会现实。隋唐时期的治国思想继承了“天下一家”的理念。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后,初即帝位的唐太宗就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25]6022}贞观元年(627),在面对有司请求授以秦王府旧兵武职、追入宿卫以示封赏时,唐太宗回绝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26]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还说道:“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25]6215-6216}时为殿中侍御史、后为宰相的张行成等官僚也时常谏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27]2703}在此种思想指导下,隋唐时期在处理中原和边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时,推行了极为开明友善的民族政策,通过与吐蕃、回纥等边疆民族政权和亲,在边疆设立大量的羁縻府州因俗而治,同时设置燕然、安北、安西、安东、安南、单于、北庭都护府等机构进行管理,有效维护了边疆地区较长时段的稳定。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被边疆各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开元十七年(729)吐蕃赞普尺带珠丹(赤德祖赞)上表唐玄宗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27]5231}可见唐朝“天下一家”的理念,得到了中原和边疆各民族的高度认同,共同成就了隋唐时期“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

冕旒”的恢宏气象和宏大政治格局。

四、“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

正是隋唐时期“和同为一家”社会局面的开创,使得宋辽金夏之时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陆游离世前留下的“但悲不见九州同”和“王师北定中原日”,正是这种认同的生动写照。该时期,无论哪个政权均以正统自居,宣称自己拥有“天下”法统。《宋史》载宋太祖于“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号曰宋”^{[28]4},又载“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三”“宋有天下三百余年”^{[28]2094-2095}等,明确在法理上宋朝拥有“天下”,并称北边的辽、金政权为北朝。《辽史》也载辽太祖“简天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29]402},又说“太宗选天下精甲三十万为皮室军”^{[29]738},也在法理上声称辽朝拥有“天下”,称南边的宋政权为南朝。《金史》同样载天辅七年(1123)金太祖攻下辽大部分郡县后诏曰:“顷因兵事未息,诸路关津绝其往来。今天下一家,若仍禁之,非所以便民也。”^[30]同时,该阶段各并立政权还注重维护古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关系,以维护和巩固对“天下一家”的认同。辽太祖曰:“辽之先,出自炎帝。”^{[29]24}耶律俨修史之时又认为辽为黄帝之后,其依据是辽宗室宣称郡望为漆水,漆水为渭河分支,在今陕西岐山,乃周王朝龙兴之古豳州。《括地志》载,豳州新平县即漆水县,诗经豳国,公刘所道之地也。周祖后稷和唐尧是兄弟,同为帝喾高辛氏之子。帝喾又是轩辕黄帝的曾孙,辽由此与黄帝和周室攀上关系。同时,由于汉高祖刘邦自称是唐尧后裔刘累之后,辽太祖阿保机又非常仰慕刘邦,因而定耶律的汉姓为“刘氏”。辽此举,意在证明契丹与中原是一家,辽与周、汉在思想和文化上一脉相承。此举虽有服务统治者的政治意图,却也反映出此时边疆民族内心深处对中华民族是“一家”的高度认同。

元明清作为大一统王朝,“天下一家”的观念更是贯穿于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1260年忽必烈自立为蒙古大汗,与其弟阿里不哥争位,建年号为“中统”,并诏曰:“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31]65}至元二十年(1283),河北道发生饥荒,流

民渡河到河南求食,朝廷却遣使者阻拦。时任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的程思廉斥责道:“民急就食,岂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31][3830]}明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为纳云南于舆图,曾语湖广行省参政吴云曰:“今天下一家,独云南未奉正朔,杀我使臣,卿能为我作陆贾乎。”^[32]雍正七年(1729),清世宗也言:“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而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33]从中可见,“大一统”政治观念和“天下一家”民族意识已深度融合,成为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

在梁启超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后,“天下一家”意识便自然转化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并在抵御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增强。1912年溥仪退位时,清室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仍强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34],视中华民族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五、克服“天下一家”的张力

“天下一家”意识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使得中华民族不断凝聚为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整体。但在其发展历程中,“天下一家”一直面对两大张力,它们时强时弱,消解着这一意识。一是把“天下一家”与“家天下”混为一谈。由于封建专制王朝文化思想普及程度低且受时代局限,“天下一家”的意识并未充分下沉至普通民众。在几千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统治政策下,民众对“我们是谁”认识并不清楚,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把“天下”“中国”归为一家一姓之天下或中国。甚至到近代,面对外来侵略时,民众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窠臼中。二是在“天下一家”的思想内构建起“华夷秩序”的等级观念。春秋战国时期“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危机,促使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夷夏大防”“华夷有别”的理念,并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只允许“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而不愿看到“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该种思想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夏等边疆民族力量崛起并入主中原的历史时期反复抬头,以至于在元末

朱元璋起兵时,也喊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当然,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即位诏》中立刻宣布:“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35],承认了元朝正统地位以及蒙古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事实。但这份诏书也恰好表露出几千年来“华夷秩序”这种民族不平等意识对“天下一家”意识建构带来的巨大张力。清王朝虽费尽心力,意图把统治区域内各民族都整合为“华”,而将“夷”所指范围限定于域外国家和民族,但仍出现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具有历史局限性的革命口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广泛发动群众,发出“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的号召^[36],并教育抗日战士“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37],最终普遍唤醒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推动中华民族由几千年的自在状态走向自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相关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与团结,最终突破“华夷秩序”的藩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几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和共同文化浸润中,在近代以来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深厚感情里,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各民族当家做主权利的制度保障下,以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护航中,得以迅速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38],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不仅在理论层面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廓清了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等一系列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同时在实践层面推动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前,中国的民族工作正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正走向一个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整体。

结语

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路,可以明确中华民族并非近代以来凭空构建的政治概念,而是数千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生共存共发展铸就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3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近代从无到有的认知突变,而是历经千年量变积累、百年质变飞跃的升华过程,最终由“天下一家”理念重塑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历史演进逻辑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呈现清晰的阶梯脉络:先秦时期依托传统天下观,萌发“天下一家”认同;秦汉大一统格局下,形成中原对边疆民族的辐射认同;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实现边疆对中原的聚集认同,辐射和聚集认同双向共振成就了唐朝“和同为一体”的盛世格局;宋元明清时期,“天下一家”理念深度扎根,成为各个政权恪守的正统共识与价值准则;近代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传统“天下一家”理念突破封建桎梏,完成现代转型,最终升华为全民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千年以来,“天下一家”的朴素认同意识与“大一统”政治理念双向赋能、深度耦合,持续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凝聚、愈发团结,塑造了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

从理论传承逻辑审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一家”“家国一体”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从温情厚重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理念,到凝心聚力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价值倡导,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式提出,清晰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脉络,实现了传统家国理念与现代民族治理、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

从文化本源逻辑审视,中国家国同构的传统“家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沉、最持久的动力源泉。与西方界限分明、功能单一的原子化家庭结构不同,中国传统家庭是集伦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持续性事业共同体,依托差序格局层层辐射、向外延伸,最终形成“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的家国一体格局,饱含着修齐治平、天下大同、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也蕴藏着中华民族独有的家国伦理与命运认知。

这种根植于数千年文明血脉的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密码,赋予了中华民族超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与生命力,支撑着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绵延发展。

[参考文献]

- [1]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J].中国社会科学,2007(5):191-204.
- [2]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M]//刘岱.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永恒的巨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56.
- [3]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29-41.
- [4]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7.
- [5]李扬帆.“天下”观念考[J].国际政治研究,2002(1):105-114.
- [6]陈玉屏.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

- 观[J].民族研究,2005(1):67-71.
- [7]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1-15.
- [8]于逢春.疆域视域中“中国”“天下”“中原王朝”与“中央政权”之影像[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2(1):10-20.
- [9]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7.
-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65.
- [1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 [12]诗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93:275.
- [14]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5:96.
- [15]礼记:下[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1056.
- [16]尚书[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7]周易[M].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133.
- [1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9]尔雅[M].北京:中华书局,1985:84.
- [20]左传:下册[M].郭丹,程小青,李彬源,注.北京:中华书局,2024:2306.
- [21]礼记:上[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431.
- [22][战国]荀况.荀子[M].[唐]杨倞,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51.
- [2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87.
- [2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6][唐]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63-164.
- [2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8][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9][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0][元]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40.
- [31][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32][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416.
- [33]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99.
- [34]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05.
- [35]全明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
-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67.
- [37]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807-808.
- [38]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N].人民日报,2024-09-28(1).

责任编辑:潘宏纹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

——以新疆为例

彭无情, 苏 晶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旅游业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场域,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五个维度促进了各民族的全方位嵌入。立足新疆文化润疆、旅游兴疆的战略需求,探讨新疆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实践样态、当前实际存在问题及今后的优化路径,可为推进边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旅游;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路径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12

[中图分类号]F327;F592.7;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096-10

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下文简称“三交”)应着力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通过居住空间交错化、文化传统互鉴化、经济资源互补化、情感体验共鸣化、心理认知认同化的多维互嵌,实现民族团结从政策驱动向内生动力的质性跃迁。旅游业作为践行“三交”的关键场域,兼具经济赋能、文化传导、社会整合三重功能,尤其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的多维互嵌中发挥着结构化媒介作用。新疆旅游促进“三交”实践呈现出结构化多维互嵌样态,其通过化解互嵌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张力,持续推动实践创新,为边疆地区创新民族工作提供了参考借鉴。

一、新疆旅游促进“三交”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在“三交”进程中,个体身份认同逐步升华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由此构筑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坚实的精神基础。旅游业不仅为“三交”提供了实践场域,同时也激发了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旅游促进“三交”,既是党的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路径。

(一)旅游促进“三交”的理论基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共同富裕既要求物质富足、也要求精神富有,是中

收稿日期:2026-01-15

基金项目: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XJ2025G194)。

作者简介:彭无情,男,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苏晶,女,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政策、党的治疆方略。

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从我国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中不难发现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巨大潜力。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求方面,旅游通过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2],带动人民群众增收致富,实现物质富足;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方面,文旅融合能够为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中华文化注入兼具传承与创新活力的持久动能,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滋养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3]。除此之外,旅游活动过程中的主客互动,在消除部分刻板印象的同时,加速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

习近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4]全方位的嵌入实践需要多维度的理论研究。空间层面,旅游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多元主体之间的交互空间,为“三交”提供实践平台^[5];文化层面,旅游业是促进民族互动、加强文化交流、影响民族心理的重要驱动力量^[6];经济层面,旅游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流动形式,大规模带动人、物、资本、信息的流动,推动经济发展^[7];社会层面,旅游推动社会整合,促使不同地域与不同民族的文化要素、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流动交融,是促进“三交”的重要纽带^[8];心理层面,旅游交往交流活动能够防止出现民族心理区隔现象^[9],能够增进文化认同,强化国家感知。旅游促进“三交”桥梁作用的发挥,要在旅游情境下通过主体间循环互动,加强全方位多维整合,实现“三交”的新平衡^[10]。

“三交”需要动态开放的社会互动场域,依赖于各民族在流动过程中,于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族际间的接触与互动,是各民族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基础上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三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中国化时

代化的成果,其丰富的内涵在实践层面为促进各民族人口在不同区域间的双向流动、迁移、融居,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互嵌提供总体思路和实践策略^[1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价值旨归。旅游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12],是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手段^[13]。旅游促进“三交”,就是要将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转化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各民族在旅游活动中拓宽交往物理空间,深化文化交流,提升经济水平,实现社会互动更加和谐,心理认同更加深入。旅游活动中蕴含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因子,“三交”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有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二)新疆旅游促进“三交”的实践价值

新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促进“三交”注入了新动力,也为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提供了重要平台。新疆是我国旅游资源富矿区,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先天优势。推动新疆旅游高质量发展,有效拓展了各民族之间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彰显了“三交”的实践价值。这种深层次的民族交融与全方位互嵌,不仅强化了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更有力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民族团结以及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深远意义。

一是新疆旅游业推动的民族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径。通过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五个维度的深度互嵌,各族群众得以更直观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深切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从而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巩固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多元一体格局。二是新疆旅游业深化的民族交融奠定了新疆“稳边固边”的坚实社会基础。

新疆拥有中国最长的陆地边境线,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 8 个国家接壤,肩负着“稳边固边”职责,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深化各民族在多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能推动新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更能通过挖掘,利用边境红色文化等特色资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能。三是新疆旅游业催生的民族交融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生动实践。旅游业带动下的民族交融有助于构建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社会格局,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奠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同时推进新疆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各民族全方位嵌入能够促进治理方式的创新发展,提升治疆方略的实施效能。

二、全方位互嵌:新疆旅游促进“三交”的实践样态

作为古丝绸之路枢纽和“一带一路”核心区,新疆凭借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与多元文化禀赋,以旅游业为纽带构建出新时代“三交”的创新范式。2024 年,新疆接待游客 3.02 亿人次,游客总花费 3595.42 亿元^[4]。这体现了旅游业作为促进“三交”核心载体的战略价值。

(一)空间重构:旅游产业集群驱动的多维融合

空间互嵌是推动“三交”的重要实践场域,是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前提^[5],是衡量旅游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建效能的标准之一。新疆“一核三带四心多点”的产业集群发展布局重构了旅游空间^①,形成了景区内、区域间、城乡间联动发展的互嵌式格局。这种空间重构不仅改变了物理距离,更通过 92 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等载体,创造了各民族共居共学的社会生态^②。

一是在微观尺度上,部分景区将旅游空间转化为多民族共生社区。比如,伊犁喀赞其民俗旅游区、

库车市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等通过主客共享理念,将核心游览区打造为多民族共生社区;各族商户在这里相互嵌入,共同为游客服务。和田夜市创新“美食长廊+民俗表演”空间模式,实现了多民族经营者混居,各族群众共享旅游红利。二是在中观层面上,以立体交通网络促进跨区域人口双向流动。目前,新疆在用运输机场 28 个,20 个支线机场开通 193 条直飞疆外航线,通达国内 40 个城市^[6],形成“空中公交”网络;新疆铁路持续打造“坐着火车游新疆”品牌,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天山号”“环塔游”等旅游产品,2024 年累计接待游客超 5 万人次^[7],“坐着火车游新疆”变为现实。这种“航空+铁路+公路”的立体式交通网络拓宽了各族群众的交流空间。三是在宏观维度上,以城乡空间融合彰显空间重构的社会整合效应。自 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名录建设工作以来,新疆已有 92 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入选,加速了城乡交流,拓展了城乡融合的空间。阿克苏地区天山托木尔景区的塔村是文旅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国家级乡村旅游示范区,该村既是外地游客赴阿克苏旅游的常选之地,也是周边城区居民的周末度假之地。旅游业的发展使村内近三分之一农牧民转变为旅游从业者,这些从业者以东道主的身份在主客共享的旅游空间中互相交流沟通,促进“三交”。

(二)文化融合:新疆文旅融合中的文化共同体建构

文化互嵌是多民族社会培育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在民族地区的旅游实践中,旅游场域与文化互嵌场域呈现时空重合特征。旅游为文化互嵌提供具象化的实践载体,文化互嵌则为旅游注入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核,避免旅游同质化。二者通过各民族参

①“一核三带四心多点”的产业集群发展布局,是指以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核心引擎,构建贯穿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三大文化和旅游产业带,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市作为四大区域中心,以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等作为重要节点的产业集群发展布局。

②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统计所得。

与者的互动形成双向赋能,构建了“以文彰旅、以旅促文”的良性模式,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强化了中华民族共有文化认同。新疆通过旅游文化资源的创新性转化,使博物馆、文化遗产地和节日共庆活动成为展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活态课堂。从龟兹乐舞的现代演绎到“石榴花红”景观雕塑,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化了游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化实践成效凸显。截至2024年底,新疆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地6处,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6456项(兵团85项)^[18]。各地以“非遗+旅游”模式活化传承,丰富旅游产品内涵,强化游客对中华文化一体性认知,如喀什古城土陶、木雕作坊的体验课,吐鲁番高昌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的桑皮纸制作、柳编等10余项非遗体验项目等。二是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地成为文化互嵌的重要载体。据全国博物馆年度报告信息系统统计,新疆共有153家博物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等考古实物资源丰富,数字化展示水平较高的博物馆成了各族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游客可以在此感悟“三交”悠久历史,领略新时代的“三交”辉煌成就。三是通过节庆活动搭建文化共融平台。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伊犁州“草原文化节”、吐鲁番“丝绸之路葡萄节”等文旅活动品牌,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为各族群众创设了贴心意的文化交流场景。

(三)经济协同:旅游产业化中的族际共生

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越深,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根底就越坚固。旅游产业催生的新型就业形态和“景区+社区”生计互嵌机制,构建起各民族经济互嵌的立体网络。新疆旅游业带动下显著提升的就业增长率体现了旅游作为区域经济协作纽带的重要价值。

一是多元经营网络形成“景区带动+社区参与”的生计互嵌机制。喀什古城景区深入推进“景区+就业”模式,通过旅游场域的资源整合,实现了区域

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协同共进。景区依托民宿、咖啡馆、旅拍店等商业网点,构建了多族群协同参与的旅游生计网络,2024年接待游客2349.3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0.05亿元^[19],人均收入大幅增长,提升了各族群众的生活满意度与社区认同感。二是旅游新业态重构属地就业供需匹配的整体架构。直播电商、民宿管家、旅游定制师等新职业新岗位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和有返乡就业意愿群体的就业需求相适配,解决了属地化就业问题。例如,多民族青年组成的新疆特产销售直播团队(“我和7村的故事”“贺娇龙品味新疆”等账号的直播团队),阿勒泰地区的“冰雪教练”等新就业群体的出现,带动了新疆就业结构中灵活就业占比的提升,推动了新疆就业结构向新业态延伸。三是产业要素的跨域整合丰富了族际经济共同体建构路径。新疆各地推动“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研学”等多种“旅游+”融合模式促成产业要素重组,在催生出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推动了族际经济往来。以“旅游+研学”为例,吐鲁番市超50%的A级景区已完成体验型业态转型,以“体验感+文化共鸣”为特色的体验型业态打破了族群经济壁垒,为族际间经济共生搭建了互动平台。

(四)社会优化:旅游发展中的族际互动

社会互嵌是不同民族成员融入其他社会结构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消除民族隔阂,推动各民族深度交融的主要实践样态^[20]。旅游发展催生的多民族混居社区正在重塑新疆社会结构,就业融合、志愿服务、公共服务和教育交流四重机制提升了社会资本,加速了社会互嵌。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景区多民族商户的共生实践,印证了旅游业作为社会融合催化剂的独特价值。

一是旅游就业可以促进社会融入。2025年初,乌鲁木齐市国际大巴扎景区有1443家各族商户,仅步行街就为周边居民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21],形成了跨族群生计互嵌空间,成为国内外游客认识新疆跨文化现象的空间媒介。伊宁市托特科瑞克社区培育了502家文旅业态,带动了286户各族居民创

业、2102 人就业^①。在就业结构的影响下,各族群众的社会生活得以不断融合。二是志愿服务增进社会互动。2023 年新疆陆续出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工作方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并举办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志愿者培训班,组建文化和旅游志愿者团队,服务文化资源配置薄弱的县市区。这种培训机制的持续推进强化了志愿服务的文化中介功能,丰富了族际互动的形式。三是公共服务提升促进社会公平。2024 年新疆全区政府性投资文旅基础设施项目 104 个,总投资 80.19 亿元。全区上下联动开展群众性文化惠民活动 4.62 万余场次,惠及 4550 万余人次^[4],形成了文化治理矩阵。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共享,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归属感。四是教育交流深化社会认同。新疆各地区紧紧抓住青少年“拔节孕穗”的关键期,积极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让相隔千里的青少年们跨越山海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库车市为例,库车市以浙阿“百校十万‘石榴籽’青少年融情工程”构建跨地域教育互嵌体系,鼓励中小学学生与宁波学生结对,组织甬库青少年开展“看海赏沙”“甬库同窗情”等主题融情活动,以教育交流的形式深化了甬库两地青少年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共识。

(五)心理认同:旅游情境下的情感共同体构建

心理互嵌是“三交”的核心机制,其通过缩短各民族心理距离,构建共享情感记忆库,依托旅游等流动性社会活动进行社会化传递,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基底。旅游创造的跨文化情境触发点通过形象传播、双向流动和共同记忆三大机制,强化了各民族的情感联结。从央视春晚的影视传播到“新疆人游新疆”在场交流,这些微观互动正在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

一是通过旅游传播重塑地域形象。2024 年新疆文化和旅游厅启动实施“新疆文化旅游宣传大使”计划,央视节目主持人尼格买提、作家刘亮程等 30

位名人被聘为“新疆文化旅游宣传大使”,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新疆旅游文化宣传。除此之外,2024 年央视春晚的喀什分会场、《我的阿勒泰》热播剧、“新疆是个好地方”融媒体矩阵等多形式多视角全方位的宣传推动了新疆旅游形象的塑造,强化了社会各界对新疆旅游景观和民族关系的积极认知。二是双向流动促进心理认同。新疆实施的“引客入疆”和“新疆人游新疆”政策推动了各族群众的持续互动,深化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如莎车县锚定“昆仑乐都、美韵莎车”品牌定位,持续打造《莎车故事》《昆仑欢歌》等文化精品,同时开展诗词晚会、舞龙舞狮、“非遗品鉴会”等文化活动,丰富“新疆人游新疆”文化内涵,催生文化共情,加深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三是记忆的政治性书写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每年接待少数民族参观者 10 万多人次,《坎土曼》《一件军大衣》《马背上的白衣天使梅莲》《好医生姜万富》《民族团结模范尤良英》等深受各族群众喜爱的故事增强了各族群众对兵团文化和军垦精神的共同记忆。歌舞剧《十年》演绎 2014 年至 2024 年疏附县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发展史,建构出进步史观主导的集体记忆文本。这些记忆仪式的反复操演,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化。

三、新疆旅游促进“三交”的困境解析与路径优化

(一)新疆旅游促进“三交”的结构性困境

新疆旅游促进“三交”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在人才队伍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科技赋能等方面也存在结构性矛盾,影响了各民族全方位互嵌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困境既折射出边疆旅游发展的共性挑战,又凸显了新疆特殊地理文化语境下的个性难题。

1. 适配发展需求的旅游—民族工作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

^①数据为调研所得。

的主线的背景下,旅游产业与民族工作的融合发展不仅体现在旅游开发中融入民族团结培育的工作内涵,更推动民族工作从“单一行政事务”向“文旅协同服务”转型,这种双向赋能催生出复合型人才队伍需求。从队伍结构看,新疆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存在政府文旅系统管理人员编制数量不足、年龄结构梯队未形成,景区服务人员流动率过高、专业型人才匮乏等问题。从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看,存在领导干部理论转化能力薄弱和服务人员业务素养不足的问题。以景区讲解员为例,能够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精通业务标准的讲解员稀缺。人才问题的成因复杂多元,主要为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力不足等内生性因素,也受季节性就业特征明显等外部条件制约。

2.城乡—区域—景区三重空间协调均衡发展能力有待提升。空间协调均衡发展为“三交”提供物质、场域与机会支撑,是“三交”和各民族深度互嵌的外在保障。新疆的城乡—区域—景区三重空间的发展存在不协调不均衡问题。在城乡间,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产品开发等方面差距较大,如部分乡村旅游的“最后一公里”交通可达性差,旅游产品开发集中于采摘项目,产品内容和形式同质化严重。在南北疆区域间,在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存在明显发展差距,北疆整体水平高于南疆。在不同景区间,优先发展景区与后开发景区之间呈现较明显的“马太效应”。这种空间发展失衡的问题,一方面源于新疆自然环境条件限制和历史遗留因素影响,另一方面源于游客数量激增背景下对旅游发展趋势和游客需求的研判不够精准,在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品开发、产品营销推广等方面未能做到有的放矢。除此之外,地区间合作机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3.景区数字化与创新转化能力有待提升。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凭借其跨时空、强互动、广覆盖的特性呈现出多元场景,在情感联结、认知深化、参与赋能等多个维度增强“三交”和各民族深度互嵌的力度。新疆旅游数字化发展面临技术使用和创新的双重短板。在技术使用

上,智慧景区覆盖率不高,限制了数字化在实践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发挥。在创新应用上,存在沉浸式体验项目稀缺,技术创新与新疆历史文化深度挖掘需求失配的现象。这种技术落差的形成,既与新疆数字化建设起步较晚有关,也受制于专业人才匮乏的现实困境。特别是在旅游旺季,传统管理方式难以应对客流压力,智慧化解决方案的缺位直接影响了服务质量,削弱了科技促进“三交”的潜在效能。

(二)新疆旅游促进“三交”的路径优化

旅游业从观光型向体验型模式升级,能够推动“三交”由生活层面互渗向精神价值共契深化,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方式。因此,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价值共识凝聚人心力量,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互嵌基础,让技术赋能激活文化基因,进而形成旅游促进各民族深入互嵌、深度交流的有效路径。

1.党建引领与机制优化: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方向。

第一,以党建引领夯实政治基础。“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4],党建引领是旅游促进“三交”工作的必然要求。其一,积极推行“党建+”模式。各级党组织要以“党建+文旅融合”“党建+旅游产品”等多种形式引导各民族在旅游活动中不断互嵌,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党建活力转化为推动旅游产业和民族工作发展的动力。其二,发挥好各级党组织的资源整合优势。各级党委的统筹协调是实现旅游资源合理整合、区域间协同配合的重要组织保障,要通过健全旅游领域的党组织架构,选优配强党组织领导班子,推动旅游促进“三交”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其三,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鼓励党员积极参与旅游项目开发和旅游产品设计,以自身经验带动周边群众。同时,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参与文明旅游宣传、游客接待等工作,提高地区旅游整体服务水平。

第二,完善机制建强制度基础。其一,完善协同

合作机制。旅游和民族交往都具有流动性,跨区域活动是其显著特征,亟须通过政策协调实现跨域治理。因此,要突破行政区划壁垒,建立旅游规划编制、品牌创建、市场营销和线路开发等方面的跨域联动系统,用协同发展机制形成稳定合力。其二,完善法治保障机制。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三交”的法治化是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例如,伊犁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立法目的,制定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该条例详细规定了县、乡、村三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等主体的法律义务,破解了民族事务治理的责任离散化困境,为解决部门职责不清等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其三,完善效能评估机制。效能评估机制是提升文旅深度融合能力,确保融合坐标始终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标的关键工具。效能评估不能以经济指标作为单一评价标准。要丰富评估方式,建立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混合评估模式和协同评估网络,吸纳多元主体协同评价。

2. 宣传教育与需求导向:凝聚“三交”的人心力量。

第一,以宣传教育凝聚价值共识。宣传教育通过价值共识凝聚,为旅游促进“三交”建构认知基底,需引导各族群众强化国家认同、深化“四个与共”理念。其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旅游景观设计。要深入挖掘旅游资源中蕴含的中华文脉基因,通过中华民族文化长廊等互嵌式符号载体,建好“三交”的文化互嵌载体。将博物馆、非遗馆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演剧场,构建各族群众共享交流的互嵌式空间。其二,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旅游宣传全媒介。注重景区宣传教育功能培育,在宣传折页、旅游指南等传统媒介与景区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数字平台中系统植入共享性文化符号,实现民族团结素材的跨媒介叙事融合。其三,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景区服务管理。景区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与游客的具体人际互动是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互动节点,建议景区对服务人员开

展涵盖族际互嵌史实内容的系统性培训,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中介者。例如,在导游讲解中,融入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成就的内容,呈现文化共生叙事。

第二,着眼主客双方需求强化民族团结实践效能。大众旅游时代需构建主客共享的生活空间,以游客与居民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供需双侧协同发力满足双方需求,实现族际互动、文化共享与经济协同发展。其一,立足游客需求推动文化互嵌型产品迭代。以游客主观需求为导向,开发满足顾客心理需求的旅游产品,是游客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背景下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关键^[2]。因此,要通过差异化的服务和体验,促进新疆文旅融合可持续发展。例如,在产品设计方面,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发丝绸之路相关主题的研学项目,引导学生了解各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历史;针对年轻群体,开发以兴趣为纽带的跨文化社交产品,如“草原文化音乐节”“民族体育竞技”等,鼓励游客与不同民族参与者组队参加活动,形成跨文化社交惯习;针对老年群体,开发文化记忆慢速沉浸的产品,如慢节奏深度游、怀旧游等主题化定制产品。其二,立足居民需求激发居民主动参与积极性。民族地区居民是“三交”的核心主体,居民主体性缺位将导致“三交”场景失真。因此,需通过重构利益机制,调动居民进入旅游场域的主动性。要建立居民主体的利益共享机制,鼓励居民通过将自有民居改造为民宿、将非遗转化为旅游产品等方式,积极参与旅游经营。同时,鼓励旅游企业优先雇佣当地居民,确保居民在经济层面获得稳定收益。开通居民参与决策的渠道,在旅游项目规划、产品设计中,通过“村民议事会”“代表座谈会”等充分听取居民对文化保护、民俗互动场景设计的意见,培育居民文化治理主体意识。搭建居民能力提升平台,针对居民开展文化解说、服务礼仪、电商运营等专项培训,提升其参与旅游服务的能力,使其在与游客、同事的互动中强化“三交”。

3. 人才培育与基建升级:夯实旅游促进“三交”的发展根基。

第一,培育“引才—育才—培才—留才”四位一体的文旅人才梯队。“人才是第一资源”^[1],破解新疆旅游人才的“规模不足”与“素质不高”的双重瓶颈,需构建引育培留一体化体系,建成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梯队。在引才方面,优化特岗特聘制度,靶向引进关键岗位专家,同时搭建项目制柔性引才平台,促进区域间行业精英资源的共享与流动。在育才方面,构建“政校企研”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联合政府、院校、企业及科研机构,设立特色专业方向,开发理实一体的课程体系,定向培养旅游运营—民族工作双栖人才,这是解决人才困境最主要的途径。在培才方面,丰富培养形式,细化培养层次。采取本地培养与外出培训相结合的“双向互动”模式,将外地知名专家“请进来”传经送宝,同时组织相关从业人员“走出去”开展沉浸式体验,在一进一出间强化从业人员的认知能力,开阔视野、提升其格局。此外,还应根据培养对象实际需求分层次开展培训。对旅游管理者,重点开展旅游政策和民族工作政策解读,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平衡等专题培训,提升其统筹协调与科学决策能力;对一线服务人员,聚焦沟通技巧、服务水平提升、应急处理等实操技能培训,提升其在旅游服务中促进各族群众情感共鸣的能力;对非遗传承人,开展旅游产品转化、新媒体传播等培训,助力其将非遗、传统民俗转化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旅游体验项目,同时在传承中强化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认知。在留才方面,通过设置专项基金、职称政策倾斜等奖励机制构建留才引力场,降低人才流失率。

第二,优化硬件,搭建族际互嵌型空间支撑网络。基础设施构成多元文化接触的物质载体,其配置情况直接影响族际交往的频度与深度。首先,要构建“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体系和“最后一公里”的景区通达网络,强化游客文化接触的具身体验,拓宽各族群众交流接触空间。其次,要优化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延展族际共在的时空维度。在景区、游客集散中心、民族特色村寨等场所,建设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设立民俗文化展示区等文化交流

平台。最后,要推动“数字基建”向乡村地区延伸,弥合城乡文化资源位差。通过5G网络搭建和智慧旅游平台的覆盖应用,拓展智能导览、文化直播等功能,打破文化传播交流的时空限制,提升旅游交往的效率与质量。

4.文化挖掘与科技赋能:驱动旅游促进“三交”的实践创新。

第一,以旅游资源文化内涵挖掘筑牢文化根基。其一,整合联动文化旅游资源,扩大文化传播范围。文化旅游资源间的联动能促进旅游业发展,推动文化共享。新疆吐鲁番、阿克苏等多地有《西游记》故事背景的景点,应通过旅游线路设计实现文化资源联动整合,进而打造标志性文旅IP,提升景区知名度。其二,创新文化互鉴范式,重构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时空维度。文化传承需依托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的开放性。数字化技术能够实现跨时空文化互鉴,是一种有效的文化传承方式。例如,和田约特干故城景区通过行浸式技术重现班超戍边、于阗传丝公主等历史场景,以“现代科技+实景还原”的方式完成了集体记忆的仪式化再生产。除数字化技术外,独特的艺术形式也可以实现跨时空的文化传承。例如,库车市将《胡璇、胡腾舞》《五弦舞》《乞寒舞》等古代龟兹乐舞与十二木卡姆大曲、萨玛瓦尔舞等非遗有机融合,打造出乐舞诗剧目《杏花之约·丝路龟兹》,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机制,丰富了文化互鉴模式。这两种文化互鉴模式均为文化赋能旅游内涵挖掘的探索提供了范式参照,应予以传播推广。其三,加大文化研究力度,全面深刻阐释新疆文化的“多元一体”属性^[2]。为充分发挥旅游业促进“三交”的载体功能,有必要加强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研究和提升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效能。在内容上,学术研究要立足文化润疆、旅游兴疆的战略要求,结合新疆旅游实际,产出学理性与可及性相统一的研究成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操演的文化文本,并适配公众认知水平。在形式上,学术研究成果不只限于学术交流,还应以宣传素材的形式广泛应用于宣传工作,拓宽学术研究成果的实践场域。在制

度上,完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科研成果转化评价机制,构建成果转化和共享平台,为研究者提供贡献智力的渠道。

第二,以数字技术重构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链条。其一,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资源开发,重构族际互动的时空结构。要通过推进“数字孪生景区”建设,运用VR/AR技术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将物理空间转化为线上互嵌社区,有效提升参与度并缓解景区承载压力。其二,总结数字技术放大文旅融合效果的有益经验,增强数字技术使用效果。“数字媒体技术深刻改变着旅游文化空间的表达形式,是推动文旅融合、文旅创新的重要举措。”^[24]新疆依托“新疆是个好地方”文旅融合品牌,搭建跨媒介叙事网络,推介新疆。依托其运营的13个国内新媒体平台账号和5个海外新媒体平台账号^[25],有效扩展了新疆文旅融合的传播空间,彰显了媒介化空间表达效能,推动了文旅融合效率的有效提升。蕴含其中的品牌搭建、平台运营等实践经验弥足珍贵,应作为人才培养内容加速经验传播,提升技术使用率。其三,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资源保护。2023年中宣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文物事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26]。在旅游促进“三交”的语境下,要用科技实现文化基因数字化的存续,如用数字克隆、数字化编辑等技术,完成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等脆弱文物的数字化保存工作。

新疆旅游促进“三交”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实践确证,这一实践不仅验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科学性,更通过旅游这一流动性社会空间,探索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实践机制。今后,要继续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将旅游促进“三交”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持续完善“三交”的社会机制,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有益启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持久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2).
- [2]周锦.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文旅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J].现代经济探讨,2022(9):107-116.
- [3]王兆峰,赵书虹,黄细嘉,等.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旅强国:重大理论与实践[J/OL].自然资源学报,2026-01-07.<https://link.cnki.net/urlid/11.1912.N.20260106.1100.004>.
- [4]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中国民族,2021(8):4-7.
- [5]明庆忠,韩璐,刘宏芳.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阐释和内在逻辑[J].广西民族研究,2023(3):8-16.
- [6]汤洋,顾效瑀.增强文化认同:边疆地区赫哲族非遗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5(1):142-152.
- [7]孙九霞.旅游流动影响下的民族交融与认同凝聚: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再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5):75-86.
- [8]温士贤.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价值内涵、内在动力与践行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2023,44(5):103-109.
- [9]王延中.实践偏差与价值回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论析[J].贵州民族研究,2023,44(2):2-6.
- [10]孙九霞,周明.迈向新有机团结:旅游发展驱动各民族“三交”[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2):5-14.
- [11]杨须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形成、内涵及思想贡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1):1-8.
- [12]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5):28-46.
- [13]三部门联合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

- 划[EB/OL].(2022-06-27)[2025-08-15].https://www.mct.gov.cn/whzx/whyw/202206/t20220627_934135.htm.
- [14]2024 年新疆旅游各项指标创历史新高[EB/OL].(2025-02-10)[2025-06-28].<http://www.xj.xinhuanet.com/20250210/8213353e6af4453f985c85368282cb40/c.html>.
- [15]张振国,李雪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4(4):173-180.
- [16]马伊宁.从 1 到 28 新疆机场数量不停涨[N].新疆日报,2025-08-26(A01).
- [17]新疆铁路深度挖潜客货两旺[EB/OL].(2024-11-19)[2026-01-02].https://www.mot.gov.cn/jiao-tongyaowen/201512/t20251226_4185405.html.
- [1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规划(2025—2030 年)[EB/OL].(2025-05-25)[2025-07-31].<https://wlt.xinjiang.gov.cn/wlt/zcfg/202505/baf0edb2af5b4f9fa274d0765289c4ab.shtml>.
- [19]喀什古城:文旅融合赋新能“三交”共绘同心圆[EB/OL].(2025-04-18)[2025-07-31].<https://www.xjtz.gov.cn/static/content/jctz/2025-04-18/1364219343252234240.html>.
- [20]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1-14+123.
- [21]透过“新疆之窗”看见同心圆——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侧记[J].中国民族,2024(12):14-15.
- [22]王姗,王海飞.游客特征及偏好与区域旅游发展的响应——以广东省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40(2):97-102.
- [23]田飞龙.军事殖民论是西方经验,不能解释新疆地区历史[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4):85-89.
- [24]马聪玲,滕菲菲,李翎维.沉浸式文化旅游空间形成要素及路径研究:基于价值共创理论与扎根理论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25(6):87-103.
- [25]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省域文旅品牌推广案例荣获“文旅好品牌”年度银级案例及年度省域及城市品牌优秀案例[EB/OL].(2024-11-19)[2025-07-31].<https://travel.ifeng.com/c/8edwTRisbgZ>.
- [26]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等十三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的通知[EB/OL].(2023-11-20)[2025-08-21].http://www.ncha.gov.cn/art/2023/11/20/art_2318_46439.html.

责任编辑:潘宏纹

从广西语言兼用模式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刘秋妍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语言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其接触、兼用的历史与现实进程,深刻折射出不同群体的文化互动与身份认同。广西作为我国边疆多民族聚居区,其语言格局呈现出“多民族语言共存、汉方言交织、通用语普及”的复合型特征。本文以广西语言发展脉络为切入点,考察历史上的语言交叉互融与当代的语言兼用现象及其驱动因素,揭示语言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关联,并结合广西语言文字工作现状,提出以语言为载体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路径,为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广西多民族语言;语言兼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6.02.013

[中图分类号]D633;H0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6)02-0106-07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传承、社会整合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其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西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长期接触、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而独特的语言生态和语言兼用现象,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建设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一、语言接触:历史上的语言交叉互融

语言接触是不同族群在空间互动与文化交往中形成的必然现象,其进程与区域的历史发展、移民迁徙、政策推行深度绑定。有学者将语言接触分为直接

接触与间接接触,强势接触与弱势接触,文化借用与密切借用等类型,并指出语言接触的本质是人的接触^[1]。广西地处岭南地区,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带,各民族语言长期接触、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的语言借用和混合现象。语言接触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语言变化规律,也能揭示民族交融的历史轨迹,反映民族关系发展的深度与广度。

(一)广西语言概况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广西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约为3131.88万人,占62.48%;各少数民族人口约为1880.80万人,占37.52%^[2]。广西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是广西语言资源

收稿日期:2026-01-05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一般项目(ZL2024008);2025—2026年度全区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GXSYXT202502)。

作者简介:刘秋妍,女,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史。

丰富的主要原因。汉族的迁入,不仅增强了广西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也促进了各民族语言的交融与发展。目前,广西有壮语、汉语、瑶语、苗语、侗语、仫佬语、毛南语、回语、京语、彝语、水语、仡佬语等多种民族语言,其中壮族、瑶族、苗族、彝族还有各自的方言土语。壮族、京族、彝族、水族有公认的民族文字与古籍,而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民族则保留了用土俗字抄写古籍的传统^[3],其他民族基本使用汉字。在汉语中,主要有粤方言、西南官话(桂柳话)、客家话、平话、湘方言、闽方言六种,同种方言内部又分不同片区。广西各种语言分布与民族分布基本一致。由于多民族杂居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各语言使用区域参差交错,语言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呈现出“多民族语言共存、汉方言交织、通用语普及”的复合型特征。

(二)广西语言接触的历史脉络

德国学者弗里兹·格雷布内尔的“文化圈”理论认为,同一区域内往往并存着不同文化圈,同一文化圈内的诸多文化元素又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广西的汉方言亦具有区域性与零星分散的特质,呈现出不同的“语言文化圈”这一复杂繁多局面的形成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观察广西语言地图,汉方言的分布与历史上汉族的迁徙路线有巨大的重合性。从中我们可以推算出广西各种语言出现的时间顺序,并梳理出其流动路线。

广西的语言接触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秦始皇平定岭南时开凿灵渠,连接湘江与漓水,汉族便自越城岭古道与萌渚岭隘口入桂。这部分早期入桂并定居的汉族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在与地方语言的接触中,逐步形成了保留有古汉语特征的平话。广西平话分为桂北平话与桂南平话。桂北平话以桂林为中心向周边辐射,远达湖南宁远地区。桂南平话集中于南宁郊区、宾阳、横州等地,其形成可追溯至宋代屯兵,一般认为与狄青带领的“平南军”军事屯戍有关^[4]。北宋将领狄青率领的部分军队留至广西,驻守邕州,部分军队再沿红水河向桂西迁徙,将操南宁平话的汉人带往使用壮语的左右江流域。至明代以前,平话是广西多地汉族的通用交际语言。

唐代以来,羁縻府州制度的推行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广西的治理。唐王朝重视广西的文化教育,推广汉字,进一步促进儒家思想的传播。明清时期,广西迎来了汉族移民的高潮,大批从军、流徙、经商、垦荒、避乱的汉族人口入桂。这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历史阶段,西南官话、湘方言、闽方言、客家话以及部分粤方言在此阶段传入广西。西南官话主要通行于以柳州、桂林为中心的桂中、桂北地区,俗称为“桂柳话”。明清时期西南官话作为官府通用语言,逐步代替桂北平话,在广西占据了强势地位。尽管广西官话的内部具有一致性。但由于与多种汉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仍存在一定差异性,呈现出与外省西南官话不同的语言风格。桂北平话虽失去强势地位,但语言仍具有延续性。桂北平话中最具代表性的桂林灵川三街平话,依然是今天当地人的日常用语,形成了桂北平话与西南官话通用的语言模式。

明清时期,广东人溯西江而上,从桂东南进入桂西、桂西北地区,沿水路在各地开设粤东会馆。粤商大批入桂,活跃在西江、珠江流域市场,甚至是“其时关市初通,贸迁未广”的桂西地区也占有一席之地^[5],如位于桂西的百色粤东会馆,是现今广西留存的最完好、占地面积最大的粤东会馆,也是百色起义的重要遗址。因此,广西粤方言中的广府片、邕浔片和钦廉片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代表方言较为相似。通过频繁的商业活动,粤商扎根广西各地,这也促成了粤方言在广西的广泛分布。随着这一路线的拓展,逐渐形成了汉族在桂东南密集、桂西稀疏的居住格局。粤方言进入广西后,渐渐替代了桂南平话在城市中的主导地位,平话逐步向城市边缘移动。

客家方言主要是在明清以后从广东传入的,其分布在陆川、博白、浦北、合浦、防城港、灵山、宾阳、昭平等地,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状态,较好地保留了客家的语言特征。湘方言则是湖南湘语在广西的延伸。就地区历史沿革来看,明代以前,桂北操湘方言的全州、兴安、灌阳、资源四县隶属湖南管辖,其语言特征与湘南一带十分接近,保存了湘方言的特征。清代,广西的湖南会馆亦不少见。今桂林靠近湖南的

全州、灌阳等县,仍有许多湖南籍人口选择入桂从事商业活动。闽方言自福建传入,由闽南人从南海与西江进入广西,其分布主要在玉林、贵港等地,较为零散,使用人口较少。

自秦始皇经略岭南以来,广西经历了多次移民浪潮。在此过程中,广西逐渐形成了多语并存的现实格局。广西汉语方言的分布与汉族的移动轨迹有较大关联,集中体现在桂北的西南官话区与桂东南的粤方言区。语言的差异性也成为区分人群的方式之一,如讲西南官话的称为“官人”,使用粤方言的称为“白话人”等,体现出语言对群体的分类功能。

(三)基于族际交往的语言文化互鉴

语言是理解社会的重要切入口之一,除了能够展现自身个性之外,也能直观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深度与广度。在汉族进入以前,广西的居民仍以较为原始的狩猎、农耕为主。汉族到来之后,逐渐发展出商品经济,并涌现出大量的新鲜事物。早期研究更多关注语言接触的单向影响,特别是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但少数民族语言底层词对汉语方言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不少学者也指出,汉语中存在不少壮侗语底层词。例如,粤语中的“栏”可能与壮语杆栏式的“房屋”同源;广西地名中大量的“墟/圩”字可能与壮语的“圩场”相关^[6]。这些底层词反映了壮侗语对汉语方言的影响。

语言接触的结果并非静态的“语言并存”,而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系统性的语言互鉴。同时,深度的语言接触必然伴随文化的相互浸润,如大量壮语山歌在传唱中吸收了汉语的韵律和题材,普通话演绎的民歌也融入了壮族山歌的曲调与意象。此外,在民间故事、谚语俗语等口头文学中,常常能看到不同民族文化元素的交融与重构,如一个故事可能在不同民族中有着相似的母题,但叙述语言和细节描绘又融入了各自民族的语言特色和文化心理。这些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经过语言转译与再创作,成为连接不同民族情感的无形纽带,如瑶族、苗族与汉族的“共祖”叙事,壮族、汉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民族洪水神话中的“同胞”叙事等^[7]。当不同民族成员使用这些共享的词汇、欣赏

融合的艺术形式时,其互动已经超越了日常交流,形成共同的地方性知识与审美经验。这种由语言接触催生的区域性共同文化,是连接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重要桥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二、语言兼用:语言的延续性与社会性

“语言兼用”指个体或群体在环境中,根据交际需要交替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现象。在广西,这种兼用不仅体现在日常交际中,更深入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形成了区域性的语言特征。目前,全区普遍存在一个民族使用多种语言与多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兼用现象。最常见的如“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方言+国家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国家通用语言”等语言组合模式。一般而言,语言兼用是少数民族语言社群出于实际交际需要而产生的适应性策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的弱式假说理论表明,语言对文化有影响作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反映了不同人群的思维、信念和态度等,其在影响思维的同时也会受到思维的反向塑造。有学者指出:“语言与民族情感相联系所构建的语言民族主义是不可低估的。”^[8]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进一步扩大了广西语言兼用群体的范围,语言关系与语言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调整与重塑。语言兼用不仅是语言能力的体现,还是使用者在特定条件下对另一种语言及其背后文化的接纳,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交融与民族交融逻辑,是观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微观视角。

(一)历史因素:民族交往的积淀与政策的推动

广西的语言兼用现象,首先植根于千百年的民族交往历史,并深受中央王朝边疆治理制度的影响,是族群互动的必然结果。秦始皇平定岭南,曾将大批汉族人口迁至岭南“与越人杂处”,开启了早期、大规模的语言接触。秦末南海尉任嚣与赵佗商议割据岭南时亦言,岭南地区“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说明广西地区很早就接触到了汉语言文化。明清时期,广东广府移民迁入桂东南壮族聚居区,当地的壮族群众为参与日益频繁的商贸活动逐渐掌握粤

语,而广府移民也因长期混居学会了部分壮语词汇,形成了壮语与粤语并用的“双语模式”。从秦汉的谪戍移民到明清的大规模族群迁徙,广西各民族始终处于动态交融之中。不同群体的混居打破了语言的原始地域壁垒,催生了对通用交际语以及双语、多语能力的社会需求。

历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大力推行文化教育或确立某种通用语言(如明清时期的西南官话),这些举措凸显了互通语言对国家治理、民族往来的重要性。这种制度性推动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矗立于南宁上林的唐碑《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就展现了当时壮族上层人士仿照汉字形貌创造“土俗字”来记录壮语语音和语义的做法,是汉字被借用以承载少数民族语言的早期证据。此外,苗族、瑶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也有用汉字译音的土俗字抄写经书、歌本、契约的传统,不少地区的师公唱本用汉字传抄,但在实际唱诵时仍使用本民族语言或采用本民族语言与汉语混杂的方式进行。明清时期官方为治理边疆而编纂的《华夷译语》中,采录了当时广西庆远府、镇安府、太平府属地的民族译语,并利用汉字对这些语言的词汇进行对音转写和释义,在当时的行政管理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汉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相互借用并作为标注符号,既是各民族语言文化历史交流的强有力物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语言关系上的历史延续性与内在凝聚力。

从历史纵深看,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规划为当代兼用模式奠定了基石。1957年,国务院批准《壮文方案》,这是国家以法律制度形式确立的、基于拉丁字母的壮族拼音文字方案。这不仅是对壮族语言文化权利的实质性保障,更在法律和行政层面确立了壮语文在教育、出版、广播等公共领域使用的合法性。广西在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的同时,强调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壮汉兼通”的双语社会建设目标铺平了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各民族语言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入,相关的语言政策与管理实践进一步制度化,各民族语言之间的互动向更深层次发展。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公布的第五批壮语规范词语中,审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gij eiqsik caezcaemh Cunghvaz Minzcuz)”“共同体理念(leixniemh gunghdoengzdae)”“休戚与共(fukhux doxcaemh)”“荣辱与共(ndeiyak doxcaemh)”“生死与共(dai lix doxcaemh)”“命运与共(minghyinh doxcaemh)”等一系列政治与社会学术语的标准壮语译法^⑨。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壮语能够准确表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概念,更推动了壮语通过不断吸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的新词汇,进而保持自身发展活力,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本民族语言的转译,更自然、更深入地内化为群体自身的观念。从历史经验看,深度的语言接触能显著增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随着语言共通要素的增多,民族间文化的共性也随之增强,语言和文化认同感亦不断提升。这生动诠释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社会因素: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驱动与理性选择

语言兼用的生命力源于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实用功能。广西的语言兼用现象在社会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呈现出普遍化、常态化的特征,语言的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重构。在当代广西,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获取教育、就业、信息和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通行证”;熟练使用本地方言或民族语言,用于城市和市镇日常交际,则是维系熟人社会网络、获取地方性知识与情感认同的“文化资本”。这类语言使用局面并非简单的层级固化,而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多层语言生态系统。

“国家通用语+汉语方言/民族语言”的双语或多语能力,成为个体实现社会流动与身份整合的理性选择和必备素养。这种社会需求在城镇化、市场化和基层治理中体现得尤为具体。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桂东南地区依托毗邻广东的区位优势,成为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承接区。普通话和粤语因其经济价值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商业用语,促使当地壮族、瑶族等民族群众积极学习。桂北地区作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桂柳话因覆盖多民族聚居区,成为区域内交流

的通用方言。南宁作为广西首府,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语言景观更趋多元,掌握“壮语+白话+普通话”乃至基础东南亚语种的能力,成为市民参与更高层次商贸活动的优势。个体往往根据不同社会场域(如学校、市场、家庭)进行语码转换。比如,生活在桂北地区的学生,在学校与家两种语境下通常会切换语言(在学校讲普通话,在家讲当地方言或本民族的语言)。其语言的转换受交际环境、角色关系、民族情感等多重因素影响。这种语言转码现象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更为明显,体现出语言对社会网络与角色身份的适应性。

(三)心理因素:从“双母语”意识到共同体情感凝聚

语言文字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具有建构性、情境性和动态性。语言兼用最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其对多民族身份认同的心理整合作用。其不仅关乎沟通效率,更是使用者基于情感归属、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做出的主动选择。在广西的语言实践中,个体并非在两种对立认同间取舍,而是在灵活的语言运用中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心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承载着国家整体的历史文化与价值观念。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对这种共享文化与价值观的接纳,从而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逐步形成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同。可以说,充分的、基于平等的语言互学,是消解隔阂、培育共同体情感的关键。当不同民族成员能够用对方的语言进行简单问候与交流时,就能极大消解“他者”的陌生感,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截至2020年底,广西普通话普及率达85.68%,在西部地区排名首位。从这一趋势上看,“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方言/民族语言”的双语模式成为广西语言主流。许多过去仅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成员,现已能熟练兼用汉语;部分原本使用“母语为主、汉语为辅”双语模式的人,其语言使用重心也可能向社会通用程度更高的汉语倾斜。广西多种语言的兼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根脉”与“社会适应”“情感归属”“发展需求”之间的平衡。其背后

不仅是语言能力的提升,更是各族群众在心理上对国家、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深层认同以及主动融入国家经济文化生活、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广西的语言兼用模式,是在国家制度顶层设计下,为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而建构起来的一套精密、动态的社会语言系统。它成功地将国家整合、社会发展与个人赋能结合起来,并通过“双母语”意识的培养和深度的族际交流,不断深化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共同情感。

三、基于广西语言场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考

当前,广西语言文字工作已形成“通用语言普及、民族语言保护、方言传承兼顾”的多元格局,但在语言资源整合、认同协同构建等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以语言为抓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立足广西多语言实际,统筹“语言多样性保护”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推动语言实践与共同体建设深度融合。

(一)持续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夯实共同体认同的语言基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其普及程度直接关系到各族群众的跨区域交往与国家认同,需进一步优化推广策略,实现“精准普及、提质增效”。要对广西的语言状况有整体性的认知,深入研判广西语言生活的历史演变与现实状况,把握好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间的关系。依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理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将共同体价值融入全民共有的认知空间。聚焦农村与边境地区的语言短板,推动政府、高校、培训机构多方形成合力,努力提升各族群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水平。同时,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融入基层教育、职业培训与公共服务全过程,提高各族群众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率,增强其认同感,在日用而不觉中实现语言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频共振。

(二)保护语言多样性,维系共同体认同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构建,并非以消解民族语言多样性为代价,而是要实现“多元一体”的和谐共生。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未确定以前,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肩负着联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使命。在广西,家庭和乡土社会仍是方言使用的主要场域,科学保护和利用地区方言有助于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益补充。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是从“小共同体”迈向“大共同体”的重要一步。但目前部分弱势语言,如毛南语、仡佬语、部分瑶语方言面临传承危机。要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避免出现因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导致少数民族语言功能萎缩甚至濒危的现象,实现“主体多样”和谐共享。开展系统性的语言资源普查,完善广西语言资源数据库,对各类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口头文学等进行数字化采集并存档。建立濒危语言保护机制,鼓励社区传承与家庭代际传播。依托高校科研力量,开展活态语料分析与语言复育实验,推动少数民族语言在教育、文化、传媒等领域的功能复苏。

(三)深化语言文化的交融互动,构建共同体认同的情感纽带

语言兼用的本质是文化交融,需通过语言文化的互动实践,促进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融发展,强化各族群众的情感联结,推动“语言互通”向“文化认同”转化。广西各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记忆,如壮语中保留的大量汉语借词,可追溯中原与岭南的商贸往来;桂南平话的语音特征印证了宋代屯兵的历史等,需要对这些记忆进行系统性挖掘与传播。发挥广西东邻广东,北连湖南,西靠云南、贵州的语言地理优势,扩大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的作用范围。一是助推广西粤语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广西和港澳地区语言文化交流合作,促进经济、文化深度融合;二是以桂北西南官话为主体向腹地延伸,加强广西与其他西南官话分布地区的联系;三是发挥少数民族语言优

势。广西瑶族中有勉语、布努语、拉珈语等语支,使用人群广泛分布于广西、贵州、湖南、云南、江西等地,大多数操西南官方与本民族语言两种语言。尽管瑶族居住分散,但他们可以在语言互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

(四)完善语言治理体系,健全共同体认同的长效机制

语言治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需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协同”的语言治理体系,实现语言工作与共同体建设统筹推进。首先,构建多部门协同机制,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体规划,建立教育、文旅、民宗、广电等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民族语言保护、语言文化传承等工作。例如,在制定民族地区发展规划时,明确语言工作的目标与任务;在评估县域共同体建设成效时,将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形成政策合力。

其次,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境语言服务与治理体系。广西毗连东南亚,边境有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京族、彝族等多民族聚居。中越双方边民在政治上从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但部分边民具有亲属关系。他们之间具有相似的语言和生活文化特征。边民之间的通婚、走访、经商、旅游等,对增进中越两国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活动为边民在跨国交往中自然习得邻国语言,开展民间外交提供了便利。广西边民日常使用的语言仍以壮语、瑶语、京语等民族语言为主,其次是普通话与粤方言,部分村屯还存在少量操平话、客家话、湘语、北方方言的人群^[10]。掌握其他国家语言的种类主要有英语、越南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等,其中以会越南语者最多。因此,相较于其他地区,广西边境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更为复杂,具有“民族语言+地方方言+国家通用语言+外国语”的多语言交叠使用特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家安全逐渐从传统的军事等安全延伸至经济、文化、网络、语言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传统安全不同,语言安全问题具有难以把握的隐性特征。语言

文字往往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作为进行文化渗透和煽动民族分裂的工具。跨境语言安全问题需重点防范语言渗透、话语权被剥夺、民族语言消失等风险。在多种语言夹杂使用的情况下,部分语言的安全性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威胁。为此,需要加强对跨境语言使用的监测与引导,建立边境地区语言生态数据库,动态跟踪语言使用变迁,防范外部语言文化渗透。同时,提升边民语言主权意识,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民族语言保护协同推进,在尊重多元基础上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

结语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民族精神的纽带。语言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基础,进而强化民族心理认同。语言的演变历程从各个角度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时特征和历时演变,反映出各民族间的情感和关系。广西的语言接触与兼用,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其“多元共存、互通互用”的语言格局,既维系了各民族的文化根脉,又构建了中华民族认同的语言纽带。从语言视角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非追求语言的单一化,而是要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语言成为文化交融的桥梁、情感联结的纽带、认同构建的载体,促进各民族在文化理解与身份认同上深度交融。

[参考文献]

- [1]王远新.论语言接触及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J].民族学刊,2025,16(10):1-8+151.
- [2]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广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2021-05-13)[2022-08-25].
<http://tjj.gxzf.gov.cn/tjsj/tjgb/qqgb/t8851512.shtml>.
- [3]李爱玲.广西民族民间古籍收集整理探析[M]//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博物馆文集:第11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430-436.
- [4]唐七元.广西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140.
- [5]重新鼎建百色粤东省馆碑记[Z].百色粤东会馆存,道光二十年.

[6]韦亮杰,黄家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文化向度:以广西乡村壮汉语言共生现象为例[J].民族论坛,2022(2):12-23.

[7]郝国强,诸葛成影.南岭走廊多民族的“共祖”“同胞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1):104-108.

[8]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89.

[9]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壮文规范词语发布公告[EB/OL].(2020-12-25)[2025-08-21].
<http://mzw.gxzf.gov.cn/gzyw/tzgg/t7445450.shtml>.

[10]黄南津,等.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9.

责任编辑:潘宏纹